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Yangtze IDEI

2016

长江产经圆桌会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南京大学）

简介

“长江产经圆桌会”是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根据网络信息时代学术交流和信息传播的特点，在全国首创的线上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政策研讨活动。它由院长刘志彪教授牵头，定期围绕政府重视、企业关注、民众涉及的重大经济事件和热点话题，以电子问卷的形式广邀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官员和企业家独立发表真知灼见。该圆桌会近年来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以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为出发点，以服务中国政府战略决策为宗旨，以引导社会舆情为己任，秉持“热情·专业·理性”的理念，寻求理论分析、政策阐释和应对策略。

收录本集的这些文章，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官方公众号“长江产经智库”推送，共获得了数十万点击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及良好的舆论效应。我们将以往的研讨内容按年度汇编成册，作为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成果之一，并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以飨读者。

目录

1 诈骗为什么会形成产业集聚?	1
2 发展高端产业等同于创新吗?	7
3 如何缓解资产荒?	12
4 实现东北振兴的关键在哪里?	23
5 精准扶贫: 路径与机制	27
6 新能源骗补现象产生原因与对策	34
7 苏北发展能否走生态经济新路? (上)	37
8 苏北发展能否走生态经济新路? (下)	43
9 房地产业作为“动力产业”的功能: 历史地位、现实窘境和未来展望	50
10 史上最严房地产调控: 走势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61
11 扬子江城市群如何协同发展?	71
12 如何“去杠杆”, 防范金融风险?	77
13 从“双顺差”到“一顺一逆”: 我国国际收支变化的动因、影响与对策	84
14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见底?	99
15 当下经济如何做到“以进促稳, 进中求好”?	113
16 当前产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对策(一)	128
17 当前产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对策(二)	134
18 产城融合创新: 江苏版特色小镇的建设方略	145

19 江苏聚焦富民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途径	163
20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土地流转问题	174
21 全球化逆境中的开放战略与建设制造强国	178

诈骗为什么会形成产业集聚？

2016年9月6日

山东准大学生徐王玉被骗学费后昏厥离世、清华教授被骗1760万卖房款……诈骗类新闻成为了近日的热点，也激起了全国人民对诈骗团伙的口诛笔伐。

新闻回顾 1：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女孩徐王玉，在今年的高考中以568分考入了南京邮电大学，然而本该准备踏上大学之旅的她却被2016年8月19日的一通诈骗电话彻底改变了命运。骗子以一笔2600元的助学金需要发放为由获取了这个涉世未深的女孩的信任，将全家人攒了大半年的9900元学费收入囊中，发现受骗后女孩伤心过度，在报案回家的路上心脏骤停，含恨离世。

新闻回顾 2：清华大学教授将自己位于北京的180平米的房子出售之后，就接到了冒充公检法的电话，对方称其交易手续涉嫌偷税漏税，取得当事人信任后骗取了其刚刚卖房所得的1760万元。

早在2013年，《中国新闻周刊》就报道：中国十大骗子产业，每年非法获利3000亿元以上；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接到诈骗信息的人数高达4.38亿，从事网络诈骗产业的人数至少有160万，“年产值”超过1100亿元，并且骗子们大多不是单独行动，其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诈骗团伙，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诈骗村”、“诈骗乡”。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出：面临同样的法律制裁环境，在一些地区，比如福建安溪，诈骗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产业？而在其他地区却没有大规模、成集群的发生这种行为？面对诈骗产业的集聚，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积极应对？

针对这些问题，长江产经智库的专家、学者们从经济学角度展开了激烈讨论。我们整理了大家的观点以供交流学习。

【诈骗形成产业集聚的原因】

陈爱贞：

诈骗集团多集中于比较偏僻的地方，如福建安溪，公安进入查案难度很大。由于涉及的面太大，村民们相互保护、通风报信，地方官也奈何不了。

黄繁华：

此次电信诈骗集中在泉州，这与泉州和台湾紧密的人文联系有关——当地人向台湾诈骗犯学习诈骗。虽然诈骗产业的形成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但是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只有具备特定的要素资源，才会使相关产业向该地域集聚。

姜彩楼：

诈骗产业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当地的羊群效应。

杨 锐：

诈骗是通过一系列非法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每个地方都或多或少存在诈骗现象，它既是社会现象也是经济现象。为什么常见的QQ诈骗、电信诈骗等诈骗主体通常源于特定地方呢？从诈骗这种“生产行为”的非法性质出发，获得预期非法收益的核心条件是降低机会成本。为此，需要一种高度凝聚的“组织形式”，以降低被法律制裁的高风险和实施迂回生产，增加施骗过程中的“被相信”的概率。要满足上述条件，需要主体之间存在超强关系和主体在地理上聚集（可能集聚在自己家乡，也可能不集聚在自己家乡）。于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未验证的推论，以解释诈骗的地理集聚现象：

在某一外部偶然因素的刺激下，宗亲关系较为密集之地滋生诈骗聚集行为的概率较高。

梁 琦：

偶然因素和区域条件（包括地理，传统，文化等）是诈骗行业产生和集聚的重要起因，其中偶然因素很重要，然后累积循环效应。一般产业要实现集聚需要政府政策支持，但诈骗产业为什么能集聚？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可能行骗”，地方政府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支持也不打击，诈骗产业就能很快集聚。

杜运苏、毛翠英：

诈骗产业发生集聚的重要原因应该是信息共享和技术溢出效应，而同一地域间的技术模仿相对容易。

岳中刚：

解释诈骗集聚需要用社会学的宗族网络，这种非法产业链大多是基于信任的亲戚或乡亲之间共同合作、分享隐性专业知识。我通过调查某村在北京通州的假酒产业链，销售假酒的渠道如超市、酒店必须有熟人引荐担保，大多是宗亲之间帮忙引荐，从而形成渠道、假酒、真包装、真防伪的产业链，而这些领域都存在壁垒，圈外人一般无法进入。

蒋乃华：

诈骗盛行的原因：

微观上，内部合作带来成本优势；区域上，治理弱化减少收益风险；文化上，信仰式微增加了示范影响。

孙 军：

出现诈骗产业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行骗的一般手段大家都比较了解，所以为了更好地行骗，只能通过分工、专业化，深挖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驱动诈骗产业升级。在美国也有大量的行骗活动，尤其是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界，庞氏游戏玩的不亦乐乎，里面复杂的隐性知识估计一般外人了解不了。

汪德华：

诈骗产业也需要很多专用知识，需要很多共用品做支撑，因此一般的产业集聚理论可以解释。我想强调的是，社会道德观在诈骗产业集聚过程中的作用：

一个人骗大家反感，大家都骗就无所谓了，这可能是诈骗产业较一般产业更容易集聚的原因。

曹玉平：

马歇尔解释产业集聚的三重分类法也许能够提供一种解释。诈骗产业一旦具备初步规模，也会形成区域品牌效应，相关人员、行业等趋之若鹜，产生路径依赖和滚雪球效应。现在解释集聚好于分散的理论很多了，但要解释为何在特定地域集聚，必须结合当地的区位特征优势以及服务关联成本状况，而这些信息对于诈骗行业十分隐蔽，外人难以了解，需要卧底调查。

陈长江：

外部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诈骗行为具有外部性——诈骗产生的社会成本不需要本地承担，而收益却在本地形成溢出效应，因此可能造成本地执法者睁一眼闭一眼，管理松懈，外部执法者进入该地区执法的成本又很高。

贾良定：

诈骗也许源于人性，但诈骗产业化源于国家机器。

徐宁：

诈骗成为产业集群，往小了说是政府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往大了说就是国家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邵军：

法律的责任追究不严厉和认知滞后是主要的原因，从犯罪故意来讲，骗子们对诈骗的严重后果是有预知的，因此是一种明知故犯，可以重判。

尹卫东：

文化示范、骗术分享、法不责众等因素都是诈骗产业得以集聚的原因。

谈镇：

福建诈骗产业化和积聚的形成主要是当地政府保护的结果——地方的公安分红和管理部门的奖金就是从此而来，另外底层部分好逸恶劳的法不责众心理也是原因。

田志刚：

诈骗产业形成原因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 (1) 某一阶段市场机制不足以弥补政府失效；
- (2) 某一阶段政府机制不足以弥补市场失灵；
- (3) 存在共同失败领域。

张月友：

我认为诈骗之所以能够形成产业主要是对这类犯罪的打击不够，立案率、破案率低，公安部门不作为。例如据法制晚报消息称：

2015年中国电信诈骗报案数59.9万起，破案4.4万起，破案率不足8%。其实当下社会中不但有电信诈骗、游医诈骗，中国科研领域也有诈骗存在，其产值肯定超过3000亿，而这种诈骗可能也存在集中现象，例如从高校角度看，科研奖励高、科研奖励目录认可度低、领导科研获奖级别低但次数多的高校，可能科研骗子就多；再比如从个人角度看，发表论文越多的个人，是骗子的概率越大。

李群：

诈骗产业产生和集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 (1) 行骗产业没什么技术含量，进入门槛低，所以一般出现在经济落后地区。又由于有

道德因素，所以一般是在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更容易出现；（2）当最早行骗者得手而未被抓获或抓获但未受严惩，可能导致其收益远大于成本，会有示范效应，周边了解内情者可能会跟随。如此往复，在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形成诈骗产业集群。发生集聚的后果可能有：

（1）如果不严力打击，这个产业经过内部洗牌就可能会出现领导者“企业”以及一大批跟随者“企业”，接着可能会出现黑社会，领导者“企业”成为黑老大；（2）黑老有了庞大资金后，为了获得社会地位，将采取各种手段洗白资金，甚至做一些慈善。

通过专家、学者们的讨论，我们认为：特定区位特征、地区文化背景、隐性知识传播特征、法律边界不明晰、惩罚力度不够、公安执法部门不作为等都是诈骗形成产业并实现集聚的原因。

【如何应对诈骗产业集聚？】

陈爱贞：

对于区域集中的诈骗团伙，一方面需要集中警力，一锅端；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舆论宣传。举个例子：

福建连江一个渔村在 80-90 年代时候出现整个村抢劫过往船只的现象，后来警方采取一锅端，之后就再没发生这种行为。

崔太煌：

诈骗产业如果聚集在本乡本土，打击难以有效，比如区域性考试作弊，需要交叉打击。

孙 军：

诈骗是个系统性工程，建立法治社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大前提。如果诈骗产业规模很大，不一定非要以打击的手段，可以考虑给他们条出路，诱导成为正规产业。以电信诈骗为例，运营商只是其中一环，银行、公众机构等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堵是无论如何也堵不住的。

黄永春：

构建法治社会非常必要，同时需要树立诚信标杆，构建诚信监督机制，强化诚信奖惩。

宋文阁：

针对电信诈骗，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对三大运营商管理，把诈骗次数、诈骗后果纳入考核。

崔卫东：

关于反电信诈骗业集群的对策，我认为可以由网信办牵头，宣传部、工信部和公安部参加，设立反电信诈骗工作办公室，借鉴舆情监督的办法，实行电信运营商首问负责制；地区级产业集群，市级分公司运营商负责；省级产业集群，由省公司运营商负责；国家级产业集群，由国资委运营商负责。发现诈骗信息集中在某些地区，运营商副总双规6个月；发现诈骗产业集聚犯罪的，运营商总经理移送司法机关，按产业集群管委会主任的待遇，量刑处罚；各移动总公司、省公司、分公司设置反电信诈骗客服中心，发现线索，报告公安机关，使用北斗、GPS等，对集群区域定位，一网打尽。

为了有效打击并防止诈骗产业集聚，我们认为：

需要通过加大对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建立法治社会、树立诚信标杆、对相关部门严格管理、完善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

发展高端产业等同于创新吗？

2016年9月10日

近日，江苏产业经济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就“创新与产业发展”展开了讨论。我们整理了来自政、企、学、研各界的观点，供大家交流学习。

什么是创新？

苏晓东：

创新是企业内生发展的驱动力，本质上是企业和市场的事，但政府需要提供和维护创新的土壤。

孙国民：

创新位于五大战略之首，是培育新动能、形成新产业、新业态的必然选择，是解决内生动力的唯一出路。创新的硬实力是科技创新，软实力是模式创新、体制创新。熊彼特说“创新是企业家之首要精神”，而企业家精神正在个体、企业、政府和社会层面都需要。

李剑兰：

原始创新、跟随创新和集成创新是一般意义上的三种创新模式。创新过程中，所谓市场起决定性因素，就是用市场供需曲线均衡点检验创新成果。所谓发挥政府作用，就是扶助创新，提振信心，增强预期。

如何界定高端产业？

陈雯：

衡量一个产业是否为高端产业，附加值、投资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率、资源投入效率等，可能都是考核指标。

陈 柳：

高端产业应该至少拥有技术、商业模式或品牌中的一个。

李剑兰：

谈论高端首先需要有一个标杆，而现在树立了很多：

一根科技竿、一根价值通量竿、一根价值密度竿、一根品牌竿、一根就业吸纳量竿、一根正外部性竿……。如果只说工业，国家的工业主管部门语境中，有工信部的工业强基工程，提出四基，包括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可以看做是高端的基点、起点、参照点。

岳中刚：

美国的高端产业的鉴定有两个标准：

一是产业中每个工人的研发支出超过 450 美元，这大于或等于全行业标准的 80%；二是产业中获得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位的人数必须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或者在本行业中所占份额高达 21%。

张 晔：

产业经济学的概念中通常把具有技术垄断力的产业认为是高端产业。

刘志彪：

经济的目的在于通过市场竞争力来盈利，从这个角度看附加值高的产业就是高端产业，诺奖获得者施蒂格勒曾经用“适者生存法”测试过高端产业，他认为在一个经济周期中，那些动态的附加价值比例最高的产业，就是竞争力最强的高端产业。

孙 军：

在排除国家垄断、保证行业可自由进入的前提下，使用产品附加值率及其变化可以用来区分高端产业和中低端产业。

方向阳：

高端产业的区分应从产业链角度看。当今“互联网+”使得产业组织形式变化，新业态层出不穷，哪个环节能实现高附加值变得更加难以区分。

张 健：

高端产业首先一定是指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产业，因此它的人力投入产出效率更高；其次是技术领先必须形成进入门槛，在市场竞争中能保持优势地位。

杜宇玮：

一般定义的高端产业：一是技术水平或技术密集度高，需要有先进技术支持；二是附加值高，需要有品牌和市场支撑；三是产业控制力和带动力强，需要有先进标准支撑。

曹玉平：

界定高端产业，还需要考虑：（1）其是否与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匹配，从而具有比较优势；（2）其是否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从而能形成规模经济。此外，在我国界定高端产业，基于结果导向的指标（如附加值高低，市场前景等）要好于基于投入的指标（如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

杨 锐：

中高端之官方说法源于总理报告里提及“传统产业要向中高端迈进”，这句话的语境与背景，主要是针对传统产业里企业生产的大多数产品，消费者对这些产品需求的相对下降而言的——消费者需要的是质量好、外观好、性能好等特征的产品。在这个背景下，中高端是从产品维度进行定义的。

发展高端产业等同于创新吗？

苏晓东：

创新的目的是产业升级，但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

颜银根：

高端产业应是技术含量高、复杂化、附加价值高、新兴发展有潜力的产业，因此它可能整体更注重研发。

任保全：

高端产业的高端化，可能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技术的高端化；二是满足需求市场的高端化；三是价值链的高端化，体现在附加值比较高；四是占据产业链的高端环节或者是核心

地位。而技术创新只是高端产业实现高端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刘建森：

有技术创新的不一定是高端产业，有些创新恰恰是颠覆高端产业。当然，一味追求高端产业（产品），也是不符合全球市场的真实需求的，应该以满足市场需求为产业发展的方向。一般而言，越高端，市场规模越小，失去中低端市场，就失去了产业发展的根，高端投入就难以为继。中国产业的韧性来自门类齐全的不同层次的产业结构，能够满足国内外不同市场的需求，因此不应该一味追求高端，要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划分层次，不能放弃规模最大的中低端市场。

张 健：

不管依靠技术还是依靠知识，产业是否高端的核心是人均产出能力，即创造财富的能力，因此高端产业和创新不能等同。

如何发展创新产业发展机制？

郑东雅：

创新产业发展机制：

（1）每一行业选择一个或几个重大技术瓶颈，通过重大项目投标来重点克服，因为这类问题很难通过某个企业做到；

（2）政府可以把科研机构、大学的实验室开放，让创新的要素给更多企业使用，有可能有更多创新的成果；

（3）政府可以每年选出一定数量的专家到各企业指导，进行技术援助；

（4）多层次创新项目补贴。比如一千项创新想法补贴 10 万，第二年有试用品的，再从中选择 100 项支持 30 万，第三年产品市场化，现在 30 项，支持 100 万。总之，政府把创新各要素的公共品和协调的工作做好。

陈长江：

前沿创新阶段中目标和路径都不确定，需要以试错法作为主要的创新模式。而试错法从国家层面的创新模式来看，一是需要数量大，二是需要灵活而且成本低。这一创新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大国比小国占优势，小企业比大企业占优势，但是关键是制度环境的提供。

杨 锐：

从政府政策看创新产业发展机制，最重要的是产业发展的决策机制与政策效果评估机制。

张月友：

从产业选择角度看创新产业发展机制，目前的正面清单管理弊端比较大，容易产生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可能导致供需结构失衡；二是可能导致产业发展低端化和区域间产业同构问题；三是过度投资。另外，我们的很多产业扶持政策并未区分各产业的不同生命周期进而区别对待。以江苏光伏产业来看，其产能目前全球第一，从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来看，我们国家发展的光伏产业产品可能已处于成熟阶段，但另一方面，光伏产业生产陷入低端环节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已经非常严重。

如何缓解资产荒？

2016年9月14日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指出：国内经济泡沫问题不解决，国际地位就不能保证。因此，此次长江产经智库的线上专题讨论围绕“资产荒”及其对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如何缓解“资产荒”这一议题展开。

本期推文我们整理了来自政、企、学、研各界的观点，供大家碰撞思想。

什么是“资产荒”？

刘志彪：

“资产荒”是指大量资金因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品而导致的资产价格膨胀，是一种最严重影响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疾病。

贾良定：

“资产荒”更应该被称为“剩钱”或“剩资产”。

徐宁：

金融“资产荒”是一种货币泛滥和资产短缺的相对关系：货币不过剩，优质资产也不显得那么短缺；优质资产充足，货币也不会显得那么过剩。

何雨：

“资产荒”在时间上，是资产的增速远远滞后于货币供给增速，前者是算术增长，后者是几何增长，不匹配。

邵军：

所谓“资产荒”，就是货币找不到投资方向，通俗地说就是没有好项目，货币变不成资产。所以，量化宽松的货币只能往泡沫大的地方去，恶性循环。

方向阳：

“资产荒”里的资产应该理解为投资的标的物，是为了获取收益而做的投资，包括实业房地产金融资产新业态等，荒的理解是对无风险收益过低甚至是负值或是低于通货膨胀水平的焦虑。

陈柳：

我感觉市场上“资产荒”的表现，主要指的是“低风险资产”相对于“流动性”的稀缺。我们的“资产荒”至少包括了资产供给、流动性和制度性的定价机制扭曲三个方面，哪个因素占比更大则不好说。

苏晓东：

我个人认为“资产荒”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市场上永远都不缺优质资产，缺的是发现优质资产的眼睛。

张健：

“资产荒”是急于扩张杠杆和规模的银行家创造的词汇。当他们无法保住资产规模和奖金收入的二位数增长时，就认为“资产荒”来了。

张月友：

众所周知，“资产荒”一词兴起于近3年，为“过剩经济”所特有。准确说，“资产荒”是机构投资者的风险厌恶，与个人的资产配置无关。反映的是特定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国家竞争优势的财富驱动冲动。因此，我认为，它既是国家发展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过程中，社会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遭遇金融抑制后的一种需求幻觉。

刘晓昶：

“资产荒”，除了货币因素外，还有产业周期因素。它是经济发展周期中某一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例如，在经济景气增长时，很多产业产品供不应求（如钢材价格高涨时），市场投资机会显得很多，大家继续投资这些产业（钢铁行业），一切都显得非常美好。然而经济一旦回落，这些产业产能过剩，市场难以消化，前述的投资机会就突然消失了。原先与这类投资机会匹配的增发货币，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便会形成“资产荒”。因此“资产荒”是经济发展中某一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

颜银根:

综合几家定义：资产荒，“资产配置荒”简称，有大量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品，出现了配置混乱的局面，“资产荒”本质是高收益资产的缺乏。

“资产荒”产生的原因

刘志彪:

从较长经济周期看，“资产荒”往往出现在两次重大技术变革的间隔期。在一项新的重大技术创新出现前，上次技术变革带动的繁荣和大量发行的流动性，因无法找到合适的产业投资方向，而被大量地吸引到虚拟经济领域，从而出现过度的资产泡沫。

孙 军:

在正常情形下，创新驱动是有间隔期的，间隔期经济下滑，央行就会逆市干预，发行货币，再加上上一波创新驱动高潮留下来的无所事事的货币，就会造成了“资产荒”。

郑焱:

在全球货币长期超发的大背景下，只要科技没有突破发展、消费没有新的突破，投资就难有突破，所谓的“资产荒”也将长期存在。

张慕濒:

“资产荒” = 大量资金积累 VS 稀缺投资机会。从资金积累的角度：一是短期政策推动，二是经济改革多年之后国内产业已经形成订单驱动下的垄断、过剩等问题，主动创新缺乏。而创新不够又导致利润累积难以转换为新的增长点，周而复始，利润积累与创新不足两极分化。一旦实体经济缺乏增长点，拥有资金的一方必然转而投向金融资产，这加剧了实体经济的资金短缺，进而优质项目更加稀缺。所以，“资产荒”就是现有产业格局 + 经济政策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要打破“资产荒”，必须打破两者相互作用的机制。

张 健:

“资产荒”的复杂性在于背后存在资产负债率，即杠杆率的影响因素，另外还有风险偏好，无风险收益水年变化的问题。增长率是影响“资产荒”的原因之一。和 10% 的 GDP 增长率相比，6% 的增长率下各类资产增长的速度肯定也会下降，何况还要降杠杆。

陈柳：

“资产荒”除了与资产或实体经济有关外，我认为更主要的是与高杠杆相关，大量货币通过高杠杆的方式攫取有限的低风险资产的收益，导致低风险资产收益率下降。与政府相关、国有企业相关的资产几乎等同于刚性兑付，导致大量货币以杠杆的方式追逐这些资产。创新驱动的相关资产如果没有匹配的风险定价机制，货币则根本不会投入其中。

孙军：

“资产荒”既有供给问题（优质资产目前主要表现为一二线城市的房产；股市等资本市场不健全，优质资产缺乏），又有需求问题（货币供给较多）。

姜德波：

“资产荒”与我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有关，过分关心 GDP 增速、忽视经济增长质量，难以形成高质量的资产。

姜彩楼：

“资产荒”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资源配置缺乏效率造成的。

谈镇：

“资产荒”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较稳定收益的领域没有真正向民间资本开放，被国有垄断，导致市场体系分割严重。

崔太煌：

“资产荒”通常出现在萧条期，或产能过剩期。此时，多数资产承受着大的贬值预期，只有个别种类资产有涨价预期。该类资产因少而难以寻找，交易成本剧增，于是就出现“资产荒”。

孙建波：

“资产荒”，是资金找不到高收益的资产，本质上是资金没有适应低收益时代。与此同时，各类刚性兑付扰乱了市场收益率预期，政府强行涉足竞争性领域扰乱了创新市场，导致资金直接放弃市场化导向，转向等待刚性兑付和政府合作项目，两者都实际上形成了“财政和货币”的被动扩张，直接保护了落后产能，扼杀了创新，市场化的高收益资产（匹配高风险）也就绝迹了。经济转型也就成了“制度和文件空转”。

方向阳:

“资产荒”的形成是两方面的不匹配：一是流动性过剩与实体经济发展滞后的不匹配，背后是跑不赢通胀的焦虑；二是高低收益和风险组合下的资产之间的不匹配，背后是金融泡沫高涨下的一夜暴富效应造成。反映的问题的本质还是经济的“脱实向虚”问题。

郑江淮:

“资产荒”形成的机制很简明：各类资产收益率严重不平衡，房地产类资产收益率奇高，自然导致收益率较低或正常的资产没有需求。造成超高收益率资产的需求之所以高，也是因为该类资产市场化过度，即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体制和动机、以及政府对公共保障房供给严重不足，使得房地产类资产需求畸形。其他类资产即使很正常，也吸引不到投资的需求。何况其他类型资产很多是实业投资，周期长，收益率有一定不确定性，即使有政府补贴等政策，也还是敌不过房地产投资。

任保全:

“资产荒”产生的原因：（1）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抑制了实体经济的投资热情；（2）优质资产和项目供给严重不足，而且收益率偏低；（3）短期投机性思维充斥着社会，再加上高杠杆，造成了过度投机；（4）实体经济产能过剩与资本相对过剩并存，导致具有投资属性的虚拟资产价格暴涨。而为何“资产荒”现在显得更加严重：（1）由于国际经济环境低迷，过剩的产能和过剩的资本，向国外大量快速的转移变得越发的困难；（2）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使得已经无法依赖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快速消化过剩的产能和过剩的资本；（3）国内短期内难以通过制度改革和优化，创新驱动和新技术的应用化解经济内部矛盾。

“资产荒”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

刘志彪:

“资产荒”会导致实体企业资金利率被拉高，无法赚取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使得一些企业纷纷主动选择退出市场去炒作资产（如从事地产金融等高收益行业），或选择破产倒闭。“资产荒”同样会使得企业和个人正在国内抢投优质资产，包括品牌资产、一线二线城市土地资产、保险资产；同时把眼光放到全球进行国际化资产配置，购买全球资产。“资产荒”导致的经济泡沫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合理疏导，并让其能量积聚起来冲击某个脆弱的经济环节。如果资本市场利用得好，反而可以引导和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策略。如2000年以来，美国以互联网泡沫带动全球网络经济成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其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机制，不断支持推出如iPad平板电脑、Facebook社交网络等新兴

产业，发挥了主导经济复苏的强大作用。事实充分说明，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体系对于经济转轨和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孙国民：

“资产荒”会带来资产价格泡沫化，从供求关系来分析，居民手里的钱要寻求投资渠道，主要是保值增值，银行等传统投资渠道收益有限，甚至不及抵消通胀；国债及理财产品也只是比银行利息稍高一点，吸引力不够；股市在牛市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大多数情况下，个体投资者承担了巨大风险，也不是最佳投资品。由于市场用于投资的供给品有限，又不能满足个体投资需求，最后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到投资房地产，这一行为也成为了投资者拿捏国家两难问题不得其解而采取的相机决策行为。优质资产成为稀缺资源或者集中于房地产的时候，资本套利性将货币带入地产，造成房地产需求陡增，带动房价升高。与此同时，经济不景气，需求不足，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也使得一些企业逐利地产，脱离主业，造成实体经济不实，实体经济空心化，阻滞了企业创新，延缓了经济转型升级的进程。

崔卫东：

“资产荒”是优质资产稀缺、资产质量下降的表观结果，主要因素是科技创新能力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成果转化效率下降。一是科技投入比重下降。科技支出占一般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由 1984 年的 5.61%，下降到 2014 年的 3.46%。财政科技支出增长率长期低于社保、医疗、教育支出的增长率。二是每百元人工成本的增加值下降。三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2015 年全国技术交易总额为 9835 亿元（不足 1 万亿元），2015 年技术交易总额为全社会研发支出的 68.78%。四是科技服务业没有形成产业门类。

任保全：

“资产荒”的危害：

（1）虚拟资产价格的暴涨，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暴涨虚高，将抑制内需，扩大贫富差距，阻碍城市化进程；（2）抑制投资者投资实体经济的热情，导致更多企业家将目光由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3）实体企业的投资成本大幅增加，利润降低，尤其不利于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4）增加了中国本土企业实现国内价值链构建和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升级成本，不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5）大幅度增加了产业内迁的成本，而产业外移的风险进一步加大。这些都将阻碍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不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

杨 锐：

“资产荒”反映当前在我国存在的企业投资行为。这种行为，一方面会加剧非生产性领域资金集聚所可能导致的资产泡沫，另一方面，也会抑制生产性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

企业创新能力的更新。无论现代产业体系呈现何种形态，上述经济事实都不利于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如何缓解“资产荒”？

刘志彪：

现在正是利用“资产荒”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时候。关键是引导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由资本市场支持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否则会出大问题。能否让实体经济获取社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让从事技术创新的杰出企业获取超额经济报酬，是社会可以获得更多的优质金融资产的关键和基础。在金融学上，这种实体企业的“底层资产回报率”，直接决定了在此基础上通过打包创设的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郑江淮：

“资产荒”其实是假象。房地产作为第一大资产配置，挤出了所有其他资产配置空间，这是由中国现行土地和房地产投融资体制决定，短中期是改变不了的。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或缩小之后，“资产荒”就自然没有了，而这过程中，政府应当从引导转变为服务，从指挥转变为认清市场，自觉服务于市场内在需求。

郑焱：

其实，“资产荒”存在的时期正是变革分配方式的好时机。过多研究转变发展方式并没太大意义，因为发展的事情自有市场配置，政府只是引导而已，想的太多未必有用。

邵军：

化解“资产荒”的根本出路是创新。但是，目前没有出现颠覆性的技术革命。例如我最近考察的石墨烯，发现这个新材料的性能并能够制备，但是如何运用、产业化，还不明确，另外比如量子技术，产业化也还很遥远。

孙国民：

国家层面要引导创业创新，提高企业科技硬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引导企业投资实业，积极拓宽个人投资渠道，比如：

众筹、天使投资等，分散投资规模，避免投资模式单一化。

程俊杰：

“资产荒”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很难说究竟是“资产荒”还是流动性过剩，而且测度还存在争议。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实体经济衰退，表现为资产形成能力较差。这其实与生产率增速不断下降的原因是一样的，根本的解决还是要消除扭曲，加强竞争，通过竞争让企业达到技术或创新的前沿面。

孙 军：

经济转型期，“资产荒”很正常，美国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也导致了其后的房地产、股市泡沫，资产价格飞涨，并且房地产泡沫最终破灭。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形，只不过投资的渠道更为单一，全部挤到了房地产上去了而已。下一步，一是大量发展股票、债市等资本市场，二是加快市场化改革，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加快创新步伐。但要注意的问题有两点：（1）新一轮创新来的不能太迟，否则资产泡沫会提前破灭；（2）资产供给也不能太少，也就是仓库要大一点，容纳的货币多一点，为创新留出时间和空间。现在的问题创新被抑制了，要如何形成？创新的前提，必须国资、民企一视同仁，破除垄断，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企业家，尊重市场。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回报率低，也会有大量的民间资本从事于实体经济的。

巫 强：

从社会资金流动方向来看，“资产荒”显然意味着资金没有流入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动中，这对于现代产业体系建立显然是不利的。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与虚拟经济泡沫大有关，另一方面也证明实体经济中的创新活动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有难度。即企业创新风险大，挣不到钱，还不如去炒房。缓解“资产荒”，还是要从鼓励实体经济创新层面入手，只有创新成功产生丰厚的商业利润，“资产荒”自然得以解决。但这也取决于世界技术革命的周期性，如果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迟迟不来到，那中国实体经济创新就依然只能走模仿创新的道路。换句话说来说，现代产业体系真能建成，那自然就没有“资产荒”了。所以创新驱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才是解决“资产荒”的关键。

颜银根：

解决“资产荒”首先要对个人与企业进行区分：

个人资产回报率低，更有可能是挤压消费造成；企业资产回报率低，更多因为技术周期形成。对于个人“资产荒”的问题，市场自动调节促成消费可以解决。而对于企业“资产荒”问题，需要企业做长期发展规划，短视的企业将无法再适应未来经济发展。另外，资产市场也可能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创新需要长期规划，而市场却是短期快速获利，因而创新需要更多的保护（比如免息贷款等）。

刘晓昶:

缓解“资产荒”的几个方面：(1) 推动企业创新，尽量缩短两次重大技术变革的间隔期；(2) 发掘经济增长中的市场空隙和新需求(如优质教育等仍需排队的需求)，增加资产投资机会；(3) 引导调度富余资金，用国际化视野，寻求全球投资机会；(4) 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消费、引导消费升级，创造新的投资机会。

鲁明泓:

图1用供给和需求曲线描述了资产的均衡价格以及“资产荒”的形成。“资产荒”主要是由于资产的供给减少和需求增加造成的。

解决办法一：增加供给，如图2；

解决办法二：抑制需求，如图3；

解决办法三：走向国际市场，获取较低价格的国际资产，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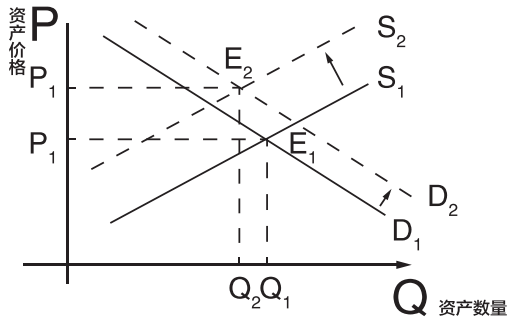


图1. 资产均衡价格及资产荒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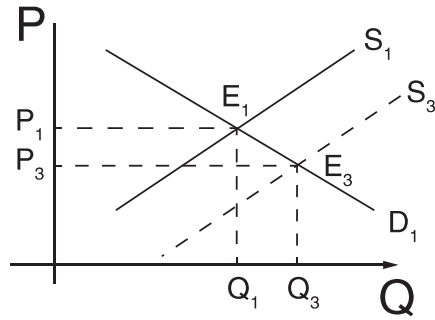


图2. 增加供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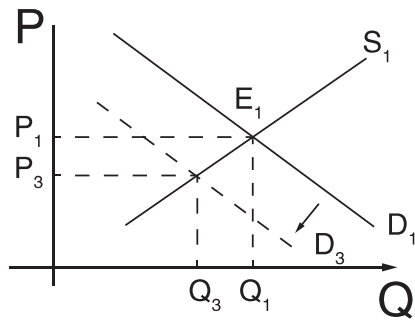


图3. 抑制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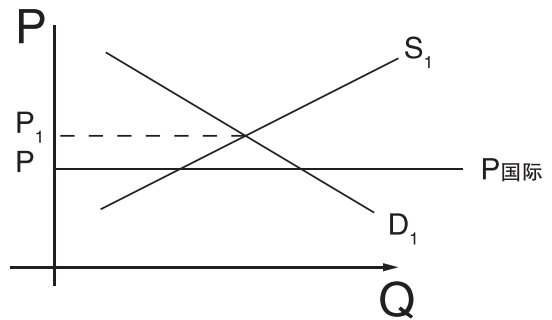


图4. 国际价格

谈 镇：

长期是要加大技术研发，强化专利保护，重拳整治社会诚信；短期加快政府改革，压缩规模，拆庙送神，出售国有资产，开放垄断领域。

方向阳：

“资产荒”解决的办法：一是抑制货币泛滥。二是破除各种垄断，降低准入门槛，提高对内开放水平。

孙国民：

缓解“资产荒”，一是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调整，将房地产建设贷款融资和个人住房贷款控制在一定的均衡水平上，特别是抑制过度投资性住房需求；二是避免炒作地王，地王的诞生必然带来房价的上涨，特别是要抑制住宅建设类的地王产生；三是既要营造氛围，又要增加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合理布局商圈服务圈和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减少学区房等炒作行为；四是增加投资替代品，降低房地产投资的资源稀缺性，如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对部分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五是降低甚至逐渐消除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可以在购房数量、购房面积、购房税收上进行一定的调控，抑制虚高泡沫化的资产价格。六是增强内生创新动力，提升企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进而提升金融产品的盈利能力，减少银行对地产信贷的规模和比重。

郑江淮：

只有消除房地产投融资体制扭曲或者坐等房地产泡沫不断吹大直至破裂，“资产荒”才会慢慢地得到解决。目前政府对非房地产类资产投资也乏善可陈：例如对权益类资产或者直接融资，采取堵住上游来水，不断从水池抽水的政策，然而权益类资产只有在活水中收益率才会得到提高的，并抵消房地产奇高收益率。事实上，只有权益类资产有一定的泡沫，才能发挥权益类资产优势并更多地注入到实体经济中。

陈爱贞：

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百分之三十多是进入房地产业，助推资产往房地产集中。这既有投机的因素，也有中国服务业不够开放的原因。因此，需要进一步开放服务业。

崔卫东：

用三个 10%，缓解“资产荒”：国家和地方本级财政科技支出占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0%，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占企业营业收入的 10%，科技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地方地区生产总值）的 10%。突破性的增加科技成果供给，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构建“631”研发投入

人的优质资产形成机制，政府分担研发风险，社会分享研发收益。未来产业的产业化政府研发投入 60%、企业研发投入 40%。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化政府研发投入 30%、企业研发投入 70%。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研发投入由企业承担。构建创新型资产交易机制。在全国各省会城市建立开放的以知识产权交易、创新型资产交易为主的交易机构，打破三地科技金融交易垄断制度。全国工业增加值率近 10 年来在 25%，没有显著提升。2015 年个别地级市的工业增加值率创记录的回落到 10% 以下。

陈柳:

定价机制也很重要，政府平台一直是刚性兑付，只有打破这种扭曲的定价机制，才能够把资金吸引到创新活动中来，才能够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

张月友:

解决所谓的“资产荒”的当务之急是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以防止因商务成本增长过快导致城市和产业空心化。重要着力点应该放到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快实现经济的新旧动力转换，确保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具体说：

(1)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扩大金融开放，鼓励金融创新；(2) 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鼓励企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全球范围整合和配置优秀资源；(3) 发挥自身制造业的开放、大规模和具有复杂生产能力的优势，积极对接世界前沿科技，加快制造业升级，使我国制造业成为全球创新环境中不可替代的一环。

任保全:

“资产荒”可能的解决办法：(1) 疏通资金的“堰塞湖”，培育更多的优质实体经济投资项目，引导过剩资产投向优质的实体资产和项目；(2) 抑制虚高的虚拟资产价格泡沫，降低其利润率；(3)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一是，推动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避免出现追求短期利益的过度投资行为；二是，培育消费者的绿色消费理念，引导资金流向资源节约、生态环保和创新发展的产业，扩充更多的优质绿色环保实体经济发展项目；(4) 发挥股市的重要融资功能，引导资金从虚高的房地产进入股市，为实体经济企业破解低成本融资困局。从而最终引导过剩资本投向更多的优质实体经济中。

实现东北振兴的关键在哪里？

2016年9月19日

“振兴东北”一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近日印发的《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分年度明确了137项重点工作和127项重大项目，估算总投资有1万多亿元，包括企业自筹资金、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和国家补助资金，涉及民生领域和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项目，国家将给予适当补贴。为此，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了一场针对东北产业振兴问题的线上讨论。我们整理了来自政、企、学、研各界的观点供大家交流，以期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

东北经济现存问题及产生原因

市场化程度不高、人才优势欠缺、价值链参与度不够、缺乏契约意识、体制制度落后等原因，使得东北产业结构调整未跟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姜德波：

东北经济问题从根本上看，还是产业结构问题，老工业基地未能抓住机遇调整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导致竞争力衰退。

张 健：

东北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政府指导，但更需市场化机制，淘汰落后产业，吸引各种要素发展新兴产业都要市场化。当然从国家和区域角度看，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能否成功，最终还是看能否形成比较优势，这本身就需要市场化机制来发现和聚集。封闭市场和全球开放市场情景下，比较优势的转换造成东北经济上一轮的沉沦，但这次东北大滑坡是在中国经济更加内敛化情景下发生的，为什么呢？还是应该从中国产业结构更替，和东北产业更新能力不足上找原因：

一方面东北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对市场化资源的聚集和创新能力不足，形成不了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东北高层级人口外流就是例证，使东北丧失了人才优势。

宋文阁：

东北问题最严重的在于落后的官僚干部人事制度。我认为主要是缺人才，尤其是产业领军

人才，而这主要在于制度的执行力度。

张金华：

人才确实是东北发展的关键，就像大部分竞争性国企人才流失一样，东北的人才流失也会导致地区竞争力下降。

张 晔：

东北制度落后是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起来的根源。

刘志彪：

我提出一个设想：东北经济衰落可能与原来封闭条件下国内价值链的打破有关。90年代之前，东北产业与内地产业之间是国内价值链循环。1992年之后，沿海面向全球市场采取出口导向战略，整个国家被纳入全球价值链的代工环节，进口国外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出口产成品，这样内陆沿海经济就与东北的国内价值链脱钩了。

刘建森：

东北发展的关键是要强化契约意识，不能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万事大吉；酒席一散，均是扯淡！这种江湖气息，缺乏诚信、缺乏规则、缺乏契约精神，没有人敢去投资，这才是东北发展的最大制约！除了机制和意识问题，客观上，资源价格下跌和需求不足是东北发展的不可抗力，冲击也很大。

杜宇玮：

富饶的自然资源、良好的农业和重工业基础导致东北人比较缺乏勤奋的干劲、创新的精神、创业的文化，崇尚貌似豪爽的“江湖义气”。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障碍”让本地企业和居民要么安于现状，要么纷纷外迁，同时让外来投资者望而却步，外来当政者水土不服，从而导致东北经济陷入低水平增长的恶性循环。

陈长江：

东北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不尊重私有产权；第二，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第三，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第四，国企对资源的过度霸占；第五，政府过度干预和政府缺位特别严重。

孙国民：

东北是老工业基地，重工业基础好，是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但如今经济为什么不行。分析起来有几个方面：一是国企比重高，体制机制不够活，市场交易成本高，阻滞了创新的活力；二是人才外流比较严重，东北地区的重点大学不少，人才培养总量在全国都比较靠前，但不是人才创新创业的目的地，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吸引了东北大量的人才；三是文化基因中更多的具有创意文化的成分，而不同于硬实力的科技创新文化；四是开放度不够，东北地区曾是国防建设的重点，在经济开放方面相对要滞后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

东北产业振兴对策

市场化改革、产业结构调整、融入价值链、制定人才吸引战略、构筑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等措施可以有效改善东北问题，振兴东北经济。

崔卫东：

全球化的中国高端东北经济 = 东北产业基础 + 沿海企业家（收购兼并）+ 主导性国际金融 + 国际工程市场（如一带一路），可以运用近 10 年发展的优势产业基础（如重大装备、飞机等航空装备、高铁装备、海工装备），与东南部地区的资金和人才结合，结合中国主导的金融机构资金，打造全球重大装备制造业高地。

张 健：

也许应该学习当年深圳改革，把东北作为大特区，社会、经济甚至政治上敢闯敢试，才能杀出一条血路。市场化和全球化意味着资源在国内和全球的可自由流动，一个地方是无法小富即安的。在东北，如果人都留不住，其他资源怎么向东北聚集？从全球看一个城市的发展一定要靠新人口聚集，把辽东半岛大特区化，同时打通烟大海底隧道，与东部高铁直联是唯一出路。

伊道科：

中央派专家和地方共同制定东北区域发展战略规划，要结合自身的产业和各地方城市的资源，不能一个东北城市一个产业，而是要差异化错位发展，根据各地方城市的战略发展规划，制定出发展路径，给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吸引南方发达地区的人才、资金，政府重在政策引导，只要政府有决心，东北还是有经济基础的！

刘志彪：

如果东北经济衰落与未参与全球价值链密切相关，那么重新构建东北产业的价值链是最重

要的，可以考虑东北产业振兴与一带一路构建 GVC 同步推进。

孙 军：

市场化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都重要，但是应该有主次和重点之分。没有市场机制和国企改革，就没有市场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东北必须首先建立市场化机制，进行国企改革，在市场化建立和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政府再根据东北各区域的比较优势，给予一定的引导（例如与一带一路战略相结合），构建全球产业链，东北的比较优势产业一定会重新崛起的。

徐 宁：

过去东北经济的特征是：资源型、重工业、国有化，接下来需要让东北经济融入到当今中国经济的新型价值链中来（如创新价值链中的重工业基础、一带一路的资源提供和制造环节等）。

邵 军：

东北老工业基地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改革开放后，东北已失去工业基地的优势，交通不如沿海（大连除外），气候不利于劳动力转移，除少数较好企业外，东北已不宜作为工业基地。当下的东北应根据现有条件，重构经济，例如黑龙江可以发展大农业等。

杜宇玮：

东北的文化障碍需要制度重建，可以利用开放倒逼改革，经济开放和文化开放并举，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并重。开放，需要基础设施先行，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是东北总体（即使哈尔滨、长春这样的省会城市）的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机场都比较落后。

孙国民：

建议：一是嫁接东部地区的资本，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端装备制造业；二是培育“双创”文化，加强创业人才和领军人才的引进培育，推动创业创新；三是深入探索体制机制改革，包括对一些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扩大资本规模，提升管理水平，提升竞争力；四是深入推进开放包容的战略，借力“一带一路”实施“北承南接”大开放战略；五是学习苏州新加坡工业园模式，力争在东北地区建设类似新加坡工业园的德国工业园，示范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精准扶贫：路径与机制

2016年9月20日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公平共享，增进更多民众福祉，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精准帮扶力度。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本期讨论就围绕“精准扶贫的路径与机制”展开。

观点

刘志彪：

权利和机会选择权，才是最重要的“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我理解就是扶贫工作要“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精准扶贫”是对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短板所进行的精准化、高强度的治理，是社会治理精准化的最重要表现，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现在讲“精准扶贫”，往往讲扶贫的对象要精准，扶贫的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等等。不可否认，从具体的扶贫工作来看，这些都是必要的方法和措施，而且有些工作的地位还相当重要，如要做到“扶贫的对象要精准”，就必须在按户核实贫困人口的基础上，为他们建卡立账，只有这些基础信息完整了、充分了，我们的扶贫工作的决策和部署才能真正精准。但是仅仅采取这些措施，难道就够了吗？

中国7千多万贫困人口主要是农民。这些贫困的农民曾经为共和国的昨天付出过巨大的牺牲，为国家工业化辛勤地劳动。他们为什么仍然贫困？原因可以说出千万条，但是最根本、最精准的一条是这些贫困的农民缺乏自己应有的权利和机会选择权。也就是说，农民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权利贫困，在于他们选择机会的贫困，如土地财产权利的贫困，迁徙权利和就业机会的贫困，享受公共福利如教育、养老、住宅和医疗权利和机会的贫困，等等。我认为，改善贫困人口这些制度性的权利和机会选择权，才是最重要的“精准扶贫”。

赵顺群：

贫穷还是因为基本权利的缺失，如基本的教育、物质资源等。

孙建波：

扶贫要用发展的理念办法去解决，根本在于教育。首先要废除户籍制度，对每个公民都给

予社会保障，废除针对超生的惩罚条款。目前，计划生育条例并未取消对过往超生的惩罚措施，虽然户籍放开了，但超生的人并不敢去上户口，害怕上了户口被算账。没有户口，也就没有社会保障，没有教育保障，没有生存权。

林乐芬：

这个话题很有现实意义。最近我去新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两市调研，既和自治区农办主任进行了座谈，也走进了维族农户，和维族农民盘膝交谈进行调研，对国家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政策有星星点点的了解。甘肃农妇事件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一事件至少引发两方面的制度设计和运行问题：

一是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扶贫政策更倾斜少数民族，汉族相应要少很多也严厉很多。比如生育孩子，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可以多生孩子，而汉族就必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多生育。二是政府的扶贫政策具体落实到村和农户时，常常是村组织和村领导说了算，即使貌似采取集体投票表决的方式，也只不过是给强势家庭获得更多扶贫政策资源的合法化增加了筹码的一种制度设计，并不利于弱势家庭。扶贫问题在我国将长期存在，变化的只是“贫困的标准”，过去的低保侧重收入扶贫，现在的精准扶贫理论上不仅包括收入扶贫，还包括资金融资扶贫、生产技术指导扶贫等多维扶贫，但问题在于各地实施差异很大。

蔡汉东：

贫富永远是相对的，因而扶贫问题也将永远存在。我参加过扶贫工作组，体会到物质扶贫是最低层次的，更多的扶贫工作，应侧重于精神扶贫、文化扶贫、技能扶贫。

陈长江：

基层组织的腐败和脆弱性使得扶贫很难很好执行。村级组织在扶贫款分配和获得上权力太大。举个例子：

甘肃一些地方，村镇都要求，老人和子女的户口必须分开，然后村镇将老人做成低保户、贫困户的形式去领取扶贫保障，因此农民和村镇之间都会来分配这部分扶贫款，导致农民实际分得很少部分。

张 健：

我们在云南扶贫，研究过英国传教士 19 世纪在西南的做法：

没有多少物质上的扶贫，更多的是精神、卫生、互助、教育和勤俭节约等对村民的帮助教育，效果很好。

陈爱贞：

除了政府扶贫，还应该通过民间或第三方组织进行一对一扶贫。首先，现在不少富人、中产阶层有慈善意愿，一对一不但能进行经济扶持，更有精神扶持，中间组织则起到信息收集、沟通作用，这一点台湾慈济就做的很好，现在厦门有很多志愿者，他们的信仰就是环保、爱心，他们会对困难群体进行心灵抚慰。另外，我认为扶贫、慈善，可以从身边的熟人、亲戚做起。其次，我认为民间慈善组织可以对官方扶贫是否尽职起监督作用：包括监督扶贫是否到位、是否精准，政府机构则可以着力在经济方面提供资助。

蒋乃华：

解决贫困问题的外力有：

市场、社区、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精准扶贫似乎强调了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其它外力的作用也应该关注。

孙 军：

目前乡镇以及村一级的领导与贫穷老百姓之间是一个什么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慈善机构、志愿者很难解决的内生机制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贫困人口总体上减少是必然的，但下一步我国面临着经济下滑，增速放缓的现实，在这种背景下，减贫实际上变得比以前难了。

方向阳：

从这个甘肃家庭的情况看，基本上处于绝对贫困化的状态，毫无疑问是当地政府没有尽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近一二十年，总体上国家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应启动问责机制。

孙国民：

扶贫要从健全制度和制度创新方面入手，形成激励相容机制，推动全社会积极参与，解决持久扶贫有效扶贫的动力机制问题。精准扶贫，贵在精准：

一是如何做到精准识别扶贫对象。二是如何做到精准扶贫，就是要找到贫困的主因，为下一阶段采取什么样的扶贫方式打基础。三是采取什么方式扶贫。前面基础情况摸清楚，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平台，落实分类扶贫的方案。比如：

疾病致贫的，采取医疗救助加医保社保加一定的月度金钱补贴，疾病好了之后，引导其自力更生，这时候又要转换扶贫模式，改为技能培训加就地工作安置等。所以总的情况应该是，输血是手段，造血是目的，通过输血带动和促进造血，形成精准扶贫内生动力良性循环机制，

同时监督和核查机制都要跟上。贫困标准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基本生活保障，基本教育权，基本生存权要让他们享受到。另外，为了将来减少或者不出现贫穷的代际传递，需要给贫困家庭培养出一个能够脱贫的中坚力量，很大程度上是把他们的子女培养出来。

梁凯：

解决扶贫问题不能局限于一个地区一个家庭来看，贫困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要靠政府保障解决，解决相对贫困则是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力量参与。所谓提升造血功能就是个伪命题，两个人打工养一个孩子，和养四五个孩子，家庭经济状况差别是巨大的。

郑江淮：

当前的贫困和扶贫问题已经说明现有的扶贫体制的扶贫效果已经达到极致了，难以再有更大的效果。其根源在于现在的体制是政府强、社会弱的体制。政府基本上主导了社会功能，但是行政组织规模远远没有能力解决广泛的、分散的贫困人口，需要扶贫的不简单是少数贫困县，而且包括我们生活周围的贫困。只有发展社会组织，让多数人能够便利地实施慈善，才能起到效果。精准扶贫是现有体制下的选择，作用很有限，并且容易产生误导，以为贫困已经很少了。但是发动社会组织来扶贫又与现行政治体制不容。

张少军：

现在的货币超发，对贫穷人口的伤害也很大。

寇宗来：

扶贫，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善教育和移民。我本身是从西部来的，没发现扶贫能够产生自我造血功能的。西部绝大多数地方的人口承载能力很差，尽管地广，但按承载力来说却不是人稀。要扶贫，就应该放开户籍，让人们自由移民。现在的扶贫政策本质上就是，给你点东西，让你呆在无法自我发展的地方，别给富裕的地方添乱就行。而且，根据小时候的记忆，扶贫也不是最终到了最该被扶贫的对象手中。其次，最大的问题就是会产生扶贫依赖症。

姜彩楼：

农村有些群体缺乏劳动能力，这超分人应该纳入救济范围。有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也许要适度移民、集中。

王洪飞：

正如解决农民问题在于减少农民一样，根本解决贫困问题在于减少贫困地区人口，让他们

迁出难于生存更不用说发展的地区。分清贫困产生的原因，分类解决而不一概而论：如果能通过帮扶形成其自身造血功能则不需要迁出，如果任何办法解决不了造血功能则迁出是唯一出路。

尹卫东：

迁出、移民需要考虑生态、水、人力资源等因素，尤其是前两样不可移置或移置成本极高。

刘建森：

扶贫仅有执行，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建议加强制度安排，比如，异地执行扶贫任务、邻村互换裁定扶贫对象、邻乡互换扶贫领导制度、审计跟踪调查等。

毛翠英：

我认为村民交叉裁定、扶贫领导互换的作用不及加强审计跟踪机制的威慑作用强，对扶贫工作的监督主要还是得靠审查和事后问效，但这又取决于高一级别的政府和部门、人员对于腐败的态度。

曹玉平：

扶贫事关公平，但也要遵循效率原则，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针对贫困地区企业开辟金融绿色通道种种做法能否起到精准扶贫的作用面临下列问题：

(1) 这样做本身是否具有经济效率，能不能把蛋糕做大，而不使这些企业成为新的吸血鬼企业？(2) 即使这样做有效率，贫困地区的企业发展很好，是否就一定能精准惠及到贫困户？像尤努斯在《穷人的银行家》里介绍的，很多贫困援助基金都被一些国际机构和政府部门贪污了或被富人赚走了，落到穷人手里的很少。此外，让贫困户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弄懂国家、地方的扶贫政策，这样才能明白自己能够得到什么，遭遇不公正对待时必须要有能够影响大众舆论、上级政府、社会组织等的较顺畅通道，发出声音。

杨向阳：

根据个人的一些直观观察，农户缺少必要的扶贫政策信息获取方式方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是时有发生，甚至不是小概率事件，乡村特别是村级干部欺上瞒下，挪用占用私分扶贫资金并不是个案，遇到部分知情农户特别是被认为难缠之人时，往往会补一部分来化解，对农户而言，目前也缺少有效渠道保障原本可以且应该获得的权益。因此，可以考虑：

(1) 加强扶贫政策宣传，特别是宣传的方式方法，要考虑到农户的文化素质和认知方式；(2) 在一定行政区域内的扶贫政策，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尽量具体化条款，增加替代性内容，体现覆盖面；(3) 重视扶贫资金的跟踪审计，加大对违规特别是占用挪用私分等情况的追责和处罚力度，这在经济落后地区尤为必要。

闫浩:

再好的扶贫政策措施都要靠人来落实,如果基层干部素质不够或者缺乏激励,扶贫效果就差了。江苏的五方挂钩模式比较好,由省级机关、科研院所、大企业和苏南县区共同组成扶贫工作队与贫困地区挂钩扶贫,工作人员住在贫困村,具体操作,派出单位予以财力支持。效果比较好。

高传胜:

扶贫其实需要针对不同情况,从三个层面进行:

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教育卫生提高可行能力和创造发展条件与机会。这也是所谓的包容性创新的思路。有的人就是要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可以无偿给付;对于绝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人,不能给,只能借,借还可以有不同形式的借,要还本的不要付息的;同时要还本付息的,付息还可以有优惠和正常利息水平的。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银行,就是完全针对穷人的,不是给,而是借。贫困治理现在不缺资源,缺的是可靠有效的机制。

毛丰付:

贫困是动态概念,精准扶贫要搞清楚贫困的类型和成因。有丧失劳动和生活能力的因伤病致贫,有区域环境恶劣产生的贫困,有社会治理环境恶劣产生的贫困,有失去教育权利和工作权利不能获得足够收入致贫。第一类是社会保障的问题,第二类是移民或者改善区域环境的问题,第三类是治吏的问题,最后一类才是创造市场机会给予扶持的合适对象。贫困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多是个社会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官员由于任职期限、考核目标和治理机制的原因不能很好完成扶贫任务。政府提供支持让社会组织在扶贫问题上唱主角是最可行的。

张月友:

扶贫政策定位要清楚,到底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救济政策,还是发展政策?如果说之前的“粗放扶贫”有发展的性质,现在的“精准扶贫”就带有明显的救济性质,是对中国仍在实施的低保政策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过去发展性质的粗放扶贫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不患穷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的粗放扶贫实施,基本上与生产力标准相悖。精准扶贫会成功吗?可能会,前提是认准救济属性。路径上建议复制孤儿院和敬老院方式,在欠发达地区大力发展“扶贫院”/“低保院”,这是克服低保挂户、低保贴保,特别是中国城乡普遍存在的低保不保和低保腐败的有效办法。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期证监会把资本市场办成扶贫市场的思路,实质还是产业扶贫的思路。我担心最后扶贫没扶好,反导致中国的上市公司更加不重视成长性。

杜运苏：

证券市场的扶贫从长期影响看，是破坏规则。

刘志彪：

证券市场扶贫不是不可以，而是不能用现在这种办法。比如，可以对慈善捐款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或上市企业，实行优先支持；或者上市公司对落后贫穷地区税后捐款达到一定比例，可以减征税、优先安排融资等。而对贫困地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新三板挂牌、发行债券、并购重组等开辟绿色通道无异于是扶劣抑强，违反资本市场的本性。

单豪杰：

如果对扶贫地区企业不降低标准进行融资，只是在时间上优先，还是可以予以考虑的。

叶 蓁：

任何利用现代金融市场实现普惠金融或扶贫最后都会因盈利压力而出现使命漂移，这一点与现在的城商行跨省，农商行进城类似。讨论金融扶贫政策时，扶贫办的思路还是以前老思路，与当下的金融规律不协调。

新能源骗补现象产生原因与对策

2016年9月23日

编者按：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阶段性问题，如个别企业打政策“擦边球”，存在“骗补”企图等。2016年2月，财政部委托专员办对26个省市、90家企业进行深入调查，并对河北、上海等15个省市进行实地督查。新能源汽车骗补问题引发了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专家学者们对新能源发展现状的思考。本次长江产经智库的线上专题讨论正是围绕“新能源骗补现象产生的原因与对策”展开。

新能源骗补现象产生原因

产业政策导向的方法不对、腐败、诚信缺失、法律意识淡薄等都可能成为新能源出现骗补现象的原因。

刘志彪：

据可靠消息：

政府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刺激出近300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可全世界正儿八经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只有20多家。产业还未兴起却已经骗走政府千亿资金，究其原因可能是产业政策导向的方法不对，留下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储胜金：

当下的科技创新补贴骗补尤其严重，是不当的产业政策导向扭曲了资源配置，放大了寻租空间，这在新能源领域、机器人领域、智能制造领域，可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刘建森：

骗补产生的原因可能归结为腐败、诚信缺失和法律意识淡薄。

蔡汉东：

有补贴的地方，就有变相的骗取。补贴与否？补贴多少？怎么补？需要一个完整的机制以及完善的法律去约束。

郑江淮：

新能源汽车补贴没有错，问题出在执行过程。

张月友：

新能源汽车出现骗补现象是新兴产业大跃进运动的必然后果，没有需求，靠补贴创造需求一定会出问题。

陈长江：

骗补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的原因，现行政绩考核标准可能是推动合谋的元凶，例如科技局的重要政绩是获得的科技补贴，各个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比较。

夏杰长：

骗补、骗税情况不是个例，以青岛即墨一家服装企业为例，他们坦言如果没有增值税的出口退税，企业会严重亏损，实体经济的这个困境也迫使企业假出口真骗税。造成类似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大环境和体制方面的原因。

新能源骗补现象解决对策

通过转变补贴方式、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发挥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优势，可以有效缓解新能源骗补问题。

刘志彪：

从直接补贴生产者转向直接补贴消费者个人可以有效降低骗补现象。

孙 军：

如何补贴实际上涉及需求价格弹性问题：

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时候，补贴生产者有利（例如农业，直接补贴农民）；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时候，补贴消费者有利（例如新能源汽车等）。但制度不完善仍会产生五花八门的合谋，补贴等政府行为一定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事前要做好设计，事中发挥媒体等各种监督的力量，做好监督。

苏晓东：

欧洲普遍是给消费者进行补贴，而不是生产端。自今年7月1日起，德国颁布最新的电动车补贴计划，截止目前已经近2000位申请者，其中宝马车主占多数。为了促进电动车等环保车型的普及，德国为每位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提供40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5万元）的补贴，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补贴为3000欧元（约合人民币2.2万元）。就我曾经研究过的德国、美国、日本的光伏产业补贴政策，德国是直接补贴给消费者，美国对生产端和消费端都有补贴，但侧重在消费端，日本跟美国类似。总的来讲，为消费端进行补贴对于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张宸：

德国之所以能顺利采用消费端补贴的方式，主要源于其严格的监督惩罚机制，企业如果被曝光骗补后果将非常严重，而在中国，政府监督的成本高、质量差，但又不愿意放手让群众监督，因此如果选择消费端补贴可能会出现生产厂家冒充消费者来骗补贴，政府也无法控制。

周晓艳：

需要建立企业信用档案，使用信用负面清单来约束企业行为。

邵军：

新能源是人类的理性选择，与基于逐利的经济学原理是背离的，所以只能政府引导。新能源只有到传统能源无法支撑时才会进入市场经济。

郑江淮：

补贴是一种常见的经济政策，并不都是不好的，理论上也不能全盘否定其作用。如果将补贴过程全部公开披露，第三方参与，发挥媒体作用，谁敢骗补！政府要发挥社会中介作用，当前政府强、社会弱是很多问题执行能力差的原因。

苏北发展能否走生态经济新路？（上）

2016年9月28日

编者按：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出：“苏北（或落后地区）能否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是走出一条生态经济发展的新路？”对此长江产经智库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线上讨论。我们整理了来自政、企、学、研各界专家、学者的观点供大家交流。

观点

苏北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与新型工业化道路

刘志彪：

什么是传统工业化道路？一种说法重工业化是必由之路，一种说法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谈 镇：

传统发展道路包括：

（1）遵循消费品工业－资本品工业－重化工业路径；（2）遵循先污染后治理；（3）遵循劳动密集型技能提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创新路径。

闫 浩：

传统工业化道路应该是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对应的概念。十六大报告对新型工业化的定义是：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苏北当然应该避免传统工业化道路，但是不能跨越工业化的阶段，江苏在中国的区域分工里，应该是先进制造业基地，这个基地当然包括苏北。

姜彩楼：

传统工业化道路，应该是指从轻工业向重工业，从小工业向大工业发展的道路。从历史经验来看，苏北部分地区受到水患灾害的影响比较大，在区域经济格局中仍存在一定的烙印。苏

北现代化交通与苏南比差距非常大，内部要素流通、区域市场融合并不顺畅。这些因素制约了苏北前期发展。

李国强：

苏北这类地区也是要走工业化道路的，但不是走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而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生态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相结合，要坚决的限制传统的工业化做法。

毛翠英：

工业化道路过程中，不论新型路线还是传统路线，我觉得是否在规划时也应适度考虑一下规模性问题，尽量不过于分散，尤其是号称产业群、产业集聚等。

杜运苏：

如果不走工业化老路，苏北特色农业和旅游是重要抓手。新兴产业做大做强受到的制约因素很多，很难短期内突破。典型例子是泰州医药高新区，举全市之力，投入上千亿，核心竞争力很难培育，目前为止园区内上市公司几乎没有。

沈志强：

我 2005-2007 在宿迁工作两年，那个时候宿迁还号称绿肺，我也曾在市政府微博发言，希望能保持青山绿水。作为一名金融工作者，我曾建议宿迁政府，一是争取政策，让更多的企业上市，这相当于把全国的无息资金引到宿迁；二是给出政策，吸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落地宿迁；三是做大政府小贷担保机构，引导辖内中小企业发展。回到南京工作近 10 年，再回过头看看 10 年前的宿迁，比比现在的宿迁，还是很有感触。首先，已经不再是绿肺；其次，产业转移初具规模；第三，洋河上市了，但把销售总部搬到了南京。宿迁作为苏北五市里经济最不发达的地级市，经过十年发展，经济总量与连云港不分伯仲，但也仅此而已，我觉得可以看作是苏北发展的一个缩影。为什么一个想要青山绿水的城市最后还是回到了产业转移、工业化的老路？我认为苏北的发展问题就是缺钱、缺政策、留不住人才。这样的背景下，除了产业转移、工业化，别无他路。

陈建军：

苏北的发展要有新思路，不要复制苏南或浙江模式，苏北的差距是在前工业化时代落下的。从产业角度讲，苏北要走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路子，如第六产业、智能制造、二三产业融合等，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的发展环境下，要有新思路。

赵顺群：

“苏北（或落后地区）能否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是走出一条生态经济发展的新路”是否可以还有一条路径，就是不走工业化道路，而是保持或者改善生态的情况下，用工业化、信息化的方法发展农业和旅游业，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提高地区的发展水平。

苏北的机遇与挑战

刘志彪：

我的核心观点：

1、对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能源重化工躲不过，但是一个区域可以利用产品分工避开；2、能源重化工代表一个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水平，它不是污染的代名词；3、长江流域岸线应该少配置能源重化工业，应该集中在中国沿海地区配置，同时要求最严苛的环境保护措施。然而当前的环境保护工作仍受到三个因素的强烈约束：

一是转轨时期增长主义导向的经济体制和地方政府职能。在以发展业绩论英雄的政治晋升制度下，重点发展那些投资大、产值大、利税高、发展带动效应强的能源重化工业，尤其是前向关联度高的石化产业，既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政治利益，也有利于形成以大企业集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和发展极。二是生态补偿机制并不完善的现实。像水资源交易补偿、基于单位 GDP 的能源消耗和排放的交易补偿机制，都是买断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开发、维系绿水青山的必要代价。否则，好像我们也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要求这些地区不发展，或者要求这些地区的人民固守贫困状态。在现阶段，仅仅依靠少量的财政转移支付，无法实现富民强市的目标。因此地方政府主动去搞那些可能影响环境保护的重化工业大项目，就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体制行为。三是与地方政府职能相关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税收分权体制模式。即使地方政府的职能已经由发展主义转向了专注于公共事务，转向了调节区域内的民生、进步和公正，但是如果如果没有相应的解决与承担公共事务相匹配的财政收入机制，地方政府就必须继续主动推进各种可能影响环境保护的重化工业大项目。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是与中央财政分成中拿到的仅占 1/4 的产业活动的增值税，二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这种激励机制结构决定了地方政府专注于房地产市场的热情，决定了它们必须大力扶持发展那些可能影响环境保护的重化工业大项目。如果哪一天，中国地方政府可以从辖区内居民财产的保有、继承中征税，可以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那么它们就自然会弱化强烈的发展重化工大项目的动机，而把营造区域内安全、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作为重要任务，以吸引广大市民前来居住，以及增大财产的税基。

邵 军:

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以目前的条件，苏北是我国新型工业化布局最适宜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苏北沿海。过去受制于长江阻隔和沿海滩涂开发难度大。现在这两个劣势都转化为优势，加上平原和不断生长的滩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温带气候等因素，适宜布局大工业，苏北沿海的若干已有港口可做成产业港，大进大出，当然，同时保护好生态。搞工业不等于不是新路，但某些新产业对运力要求降低为交通不便地区带来机遇，有了超越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可能。江苏资源缺乏，最大特点是人多地平，制造业的优势永远不能丢。

刘晓昶:

历史上水运时代，水运交通枢纽（扬州）意义重大。现在工业化时代拥有高铁、航空、金融枢纽（上海）意义重大。未来信息化时代，成为信息收集、处理、运用枢纽意义重大。江苏可以致力于打造全国信息流枢纽，苏北也可以提前布局。

石 奇:

即将建成的苏北高铁，将使苏北真正融入长三角经济圈，形成苏北与发达城市的“同城效应”，产业转移和发展衔接水到渠成。所以，在不久以后苏北发展战略问题将不再是问题。“同城效应”一旦发挥作用，苏北就不需要把传统工业化再从头走一遍，其发展会与长三角同步。

黄永春:

苏北特色农业无法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总量的提升，苏北虽然具有一定的旅游资源，但是无法与旅游胜地相比，所以还是要依托资源发展新兴产业，生态经济的建设需要工业的支撑。工业经济和生态经济我觉得需要两手抓，两种可以相互促进，并不矛盾。因为生态经济需要工业经济的支撑，并且只有工业经济才能保证社会就业、经济稳健发展；同时生态经济，不仅可以造福社会福利，也可以促进工业经济的良性发展。

刘 勇:

落后地区生态经济的发展需要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生产方式的有效转变。从传统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低碳绿色的生产方式，需要对企业行为进行分析。特别是针对目前企业面对的低碳绿色生产障碍进行跨越，包括体制障碍、文化障碍、企业内部机制障碍、宏观环境障碍。

陈 柳:

苏北跨越传统工业阶段，首先要考虑省委提出的“慢不得，也急不得”的理念，考虑苏北发展“快与慢”的关系。不能要求苏北既要快速全面小康，甚至现代化，还要跨越传统工业模式。

因为要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不仅是中国东部地区，其他大部分国家的制造业都是从传统工业的阶段升级发展而来，特例不多，新西兰是一类、以色列是一类，但他们的资源和科技我们并不具备。那么，苏北必定要走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道路，这条路不管能不能成，但起码快不起来。

张月友：

我的看法是，不能孤立谈苏北发展问题，而要将其放到江苏工业化转型，乃至中国经济转型大背景中去认识。（1）金融危机以来，伴随全球发达国家战略调整和中国用工成本提高，中国过去的那种要求为低工资就业创造机会的时代一去不返，生产作为出口手段的经济模式也无法再持续，迫切要求中国生产向满足国内消费的新经济模式转变。这意味着中国消费和服务业生产必将崛起，传统制造业生产规模必须适度收缩，中国必将迎来真正的服务经济时代。目前，中国从人才结构、收入及储蓄水平和消费升级，乃至供给侧改革战略等方面都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接下来，中国迈入服务经济新时代，以江苏迈入服务经济时代为前提。（2）江苏区域发展的均衡度相对较高，但苏南与苏北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其中，苏南制造业和教育发达，城镇化率高，外来人口持续净流入，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密集度高。而苏北恰恰相反，苏北城镇化率低于江苏平均水平，大约为 60% 左右，苏北五市三次产业均衡分布，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人口与农业人口规模相当，苏北每年因教育升学和外出务工，向苏南乃至全国输出大量人才和人口。可以说，江苏苏北是苏南发展的重要粮食生产和劳工输出基地。但与此同时，苏北相对苏南，地广人稀，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

何雨：

苏北新型工业化我支持选择宿迁破局，理由：

1. 官气可用。宿迁官场生态要优于其他地方。官员也想干事。
2. 民心可用。宿迁民众对城市发展的期望与信心要强于其他地方。现代化的民众基础值得期待。
3. 转型基础良好。宿迁在转型升级上已经有了积累，也形成了方向。
4. 鲶鱼效应。一旦宿迁率先破局，必定具有强大示范效应。
5. 盘子较小，便于集中力量扶持。

周斌：

苏北的经济相对于苏南是落后的，但从近几年京沪高速通车、高铁逐步建设、较高质量的公路建设、与发达地区的对接以及产业转移，使苏北近几年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讨论苏北经济的发展应该不能以看落后的地区去看它，而是如何利用现有基础，成本优势，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而考虑。

王洪飞:

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差距是永远存在的这一客观现实。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存在这一差异。苏北在江苏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现状这么多年客观上支撑了苏南的高速发展。大量苏北优秀人才以及产业工人甚至农业能手移居苏南，强烈推动了苏南同时也带动了苏北逐步脱离了贫困。苏北的发展必须基于其自身的资源条件顺势而为，这也是我理解的“慢不得，急不得”。

单豪杰:

苏北发展面临三面夹击之势，郑州的河西区域、济南日照的鲁西南区域、苏中苏南区域，从势的角度看，所有促进增长的要素均不占优势，要形成势能，赞成重点发展徐州，我的建议是要打造徐州成为区域中心城市，淮安、连云港的次中心城市，成为各种高端要素的聚集地，吸引各种资源向苏北集聚，沿海一带则通过高铁连通发展与海洋生态优势相关的产业。

孙建波:

苏北地区要 GDP，就绕不开生态问题。能够支撑大规模 GDP 的绿色产业，对技术、人才、市场服务等社会基础要求都较高，这些又恰恰是苏北所不具备的。为此，苏北地区，要积极设计产业引导政策，规划产业形态，为产业营造基础环境。否则，追求 GDP 就必然只能走污染的老路。

闫浩:

苏北发展战略问题是把苏北当做一个整体看待的，问题是苏北的内部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1、徐州是苏鲁皖豫四省交界处的中心城市和中国高铁网络的枢纽，中心城市服务业和物流业是其区位优势决定的，工程机械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则构成徐州的产业框架。未来如果有个淮海省，它是当仁不让的省会城市。

2、连云港的欧亚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地位是与生俱来的，只是在青岛日照等港口的冲击下，地位日渐尴尬。除了用临港产业撑起城市的骨架，用改革重振港口雄风外已无退路（学习重庆的经验）。

3、盐城（与南通）在苏通和沪通过江通道建成之后已经成为接受上海和苏南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成为江苏工业经济增速最快的地方。

4、淮安与宿迁是江苏境内不靠海不靠江目前还不靠高铁的地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曾经提过沿运河产业带和沿运河文化旅游产业带，都没有成气候。高速公路网以及未来的高铁网将加速江苏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毕竟，江苏的区域差异都是长江造成的，一旦长江过江通道被大规模建成后，江苏将成为全国区域差异最小的省区。

苏北发展能否走生态经济新路？（下）

2016年9月29日

编者按：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出：“苏北（或落后地区）能否不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是走出一条生态经济发展的新路？”对此长江产经智库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线上讨论。我们整理了来自政、企、学、研各界专家、学者的观点供大家交流。如果你希望对文中的观点进行补充或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苏北发展路径

王辉龙：

苏北要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一是经济发展中要有环境刚性约束；二是要有制造业对苏南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土地空间等；三是考核苏北干部要有“速度耐心”、“生态决心”。

蒋青云：

我个人觉得苏北应该重点发展为沪宁线配套的物流运营等生产性服务产业，既可以发挥苏北腹地优势，又可以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还可以保护环境。

沈志强：

对比全省，苏南已经是城乡一体化，苏中、苏北城镇化率较低。目前地方官员对城镇化的着眼点更多的在城市，但城市的发展需要太多的资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现在的特色小镇发展方向对苏北比较实用。一是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一镇一策，逐步做起来；二是符合苏北民众的意愿，先把家园建好；三是可以培育相关产业。绿色发展，最终体现在人的居住环境，体现在可持续发展层面。

刘建森：

我同意刘老师的意见，能源重化工产业是中国经济的必需品，不能因噎废食，自废武功。我建议重化工应该放在沿海人烟稀少的区域，比如岛上，或者填海造地，与人口稠密的城市隔离，从而减少民众的对立情绪。同时，加大环保投入，提高环保标准。我们可以学习新加坡裕廊重化工基地，它因为环保做的到位，虽然距城市仅10公里也没有民怨。

颜银根:

苏北欠发达地区能不能跳出传统工业发展之路，至少需要三方的协调：

苏北，苏南以及布局者。理论上说，苏北有跨越发展的机会。但是，现在这个机会可能已经丧失，因为苏南已经开始规模化产业升级。在苏南产业发展的中期，苏北可以导入一批新的产业，但是现在苏南已经开始升级了，苏北想要跨越式发展面临苏南巨大的竞争，想要发展，就看能不能和苏南形成互补产业了。

熊宇:

还可以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考虑欠发达地区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即当地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地缘等禀赋的比较优势，到底是在于生态经济，还是在于工业经济。如果山水更美，那就靠山靠水，发展生态经济；如果人、智、财更兴旺，那就创新升级，迈向中高端。

姜德波:

从一个国家或大的区域看，工业化道路是不能跨越的，但是具体到某一市县，要看资源禀赋。从现实看，苏北的人才资源、资金资源、交通条件相对而言都较困难，要走新型工业化就必须集中精力选择本地区具有一定基础的产业构建产业链核心环节，如果每个地区都能选择一两个产业，苏北产业也就能逐步升级了。

孙军:

苏北的发展，一方面是接受苏南、上海产业转移；二是苏南的科研实力与苏北对接，利用快速发展的高铁网络强化产学研合作能力，共同发展；三是，苏北的发展方向不应该仅仅是瞄准苏南和长三角，而更应做的是，以徐连高铁为依托，以徐连城市一体化为支撑，沿东陇海线，打造与中心部互动的经济高地，我认为这是更重要的；四是做好特色产业，例如旅游、生态农业等，打造特色小镇。

孙国民:

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要做到资源、人口和环境生态相互协调。将苏北地区以镇域经济体为基本单元，划分为四类区域：

一类是整合提升区；第二类重点开发区；第三类是生态经济区；第四类是生态保护区。分类开发，分类引导和推进发展，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苏北地区，创造美丽苏北和美好生活。

李国强:

苏北发展具有明显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地利和产业互补优势，现代农业也是与信息化、工业

化紧密相关的，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因此应重视长三角城市对优质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发展现代农业在苏北要给予高度重视，以高质量的农副产品满足长三角大城市的需要。

杨 锐：

（1）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切入点：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背景下，要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我认为，政策体系的着力点不在产业、不在“概念标签”，而在企业家创业吸收能力、落后城市间的相互合作、治理制度的变革。落后地区是个“大帽子”，有必要区分其类型。从企业构成角度，落后地区可分为两种类型：

民营企业主导的落后地区和国有企业主导的落后地区。

（2）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着力点：

第一，着力推进落后城市之间的相互合作。无论是民营企业主导还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落后地区，其城市需要与其他更落后的城市之间在产品（最终产品和中间投入品）、技术、资本、劳动力流动和产业转移五个方面建立城市层面的联系和合作机制。据此，可以促进城市内部的自我创新行为。第二，民营企业主导的落后地区，着力提高民营企业家创业吸收能力。把政策着力点由产业转向企业家，通过系统的能力培训行动计划，影响企业家认知、提高企业家能力、拓展企业家视野。第三，国有企业主导的落后地区，着力考虑突破性的一揽子制度变革框架。比如，在国有企业空间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可以考虑试点“国企改革与创新区”。没有公司层面与空间层面体制机制的彻底变革，很难有突破性发展。第四，着力推进地方政府转向创新制度环境建设者的角色。一是生产过程监管。无论企业从事什么行业，政府严格对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管理、监督，以确保其生产的环境友好；二是科技创新资金聚焦于产业关键性技术突破和创新服务共享支撑体系。简单说，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当企业遇到人才、资金、技术等问题时，政策的职能是协助企业寻求系统解决方案。

石 奇：

（1）全省统筹，继续加强苏北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逐步接近苏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2）充分发挥苏北高铁网带来的同城效应，联通苏南苏北的生产要素市场，促使苏北发展自然纳入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之中，在市场化过程中自动解决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问题；（3）执行最严格的环保标准，保证重化工业在苏北的发展不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周 斌：

谈谈我的个人看法：

（1）从跨越式发展考虑。一是以地市为基础，区县的联动；二是与苏北周边城市的联动，

比如徐州、宿迁和盐城等；三与苏州等发达区域的联动。联动过程需要重点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规划和顶层的设计，这个省层面要统一考虑，怎么联动，需要什么资源，怎么共享，获取什么政策，是否争取类似国家级新区等的联动；第二，继续加快各种交通的完善，高标准，高要求；第三，信息高速公路的搭建，甚至可以国内最高标准，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全国第一，首先试验 5G；第四，虚拟产业集聚，开展智慧城市建设，首先实现虚拟的同城一体化，各项资源共享。

(2) 从特色和突破口考虑，我觉得主要有两点，一是解决重点问题，例如人才问题；二是每个城市，甚至到区县、到镇，都应该分析出自己的特色，找到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即使大部分一样，也要找到自己能真正发挥现有最大资源的方向。综上所述：

我对苏北经济的发展如果处理好是很有信心的，最近五年，苏北其实已经在逐步发展，一定程度上苏北发展甚至对苏南有积极的作用。

夏网生：

苏北不宜走苏南开放的模式，即大量引进加工贸易。所以，也就不能简单促进苏南加工贸易向苏北转移。苏南主要靠外源式发展，不过是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上，或者叫乡镇经济 + 开放型经济。苏北就没有乡镇企业的雄厚基础，发展路径可以是开放型经济 + 民营经济。既要在开放中引进，不是简单地引入加工贸易，要把引进与创新结合起来，而且要注重培育内生型经济。只有这样才能超越苏南发展的一些阶段，在创新和民营经济发展上形成内生力量。

崔卫东：

尽快解决苏北发展的原始资本问题，可以通过金融生态引领开发区（特色小镇、贫困县县城）发展。设立 15 支苏北产业投资基金。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每支基金规模 30 亿元，计 450 亿元。5 支投资区位优势好的 5 县的开发区，5 支投资 5 个特色小镇，5 支投资经济落后县的 5 个县城经济。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投资部分，由省财政或省国有企业（如国信）拿，计 150 亿元，不要苏北县市配套。以省级平台设立投资 15 支苏北产业投资基金，委托 3-5 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社会融资分两步走，第一步融资 150 亿元，分别注入 15 支基金公司。第二步融资 150 亿元，再次注入 15 支基金公司。省里出台鼓励年营业收入 100 亿元以上大企业投资苏北产业投资基金的优惠政策。开发区（特色小镇、贫困县县城）的产业投资基金，实施三明治管理模式。

王宇：

苏北要想不走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首先的问题是到底区域的发展定位是什么，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如果要给政策给资源，你到底想依托什么产业来发展自身。从前面各位的讨论来看，目前中短期来看从操作层面来看较为可行的好像有两条路：

第一就是打造物流和信息流中心，苏北独特的区位优势决定了这里发展成为物流中心大有

可为，现在网络经济的发展决定了物流本身和信息流就是高度重合的，同时建立物流中心和信息流中心是可以实现高度互补的，并且上述两个中心仅仅对于资本需求较高，反而对于高端人才的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短期之内不至于形成太大的发展瓶颈，只要政策和资本投入足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另一个就是沿着刘老师的想法引申出去，关于大化工产业。但是问题在于，上马化工，近期看来舆论压力太大，地方政府有顾虑，老百姓很难理解支持，信息流中心没有地域限制，但是物流中心有，如果两者可以合二为一，不是效果更好吗？物流中心我觉得是最符合筑巢引凤模式的，对于政府来说可操作性最强，短期内还可以通过基建拉动 GDP，徐州现在基本上已经具备打造物流中心的基础，完全可以作为了解华北和华东的中心枢纽。

范化理：

苏北的发展不可能越过工业化阶段，事实上苏北各地都在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原本苏北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观念与意识方面，安于现状的现象较为严重，近些年已大为改观，苏北各市的经济增速基本都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加之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苏北地区只要抓住机会就存在弯道超车的可能。如京东计划将其呼叫中心迁至宿迁，将会新增数万人就业。

张月友：

希尔说过，提供就业并非经济目的，经济的目的是不断提高生产力。但是，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特别在当前的江苏，外贸出口受阻，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的目的既要不断提高生产力，也要为能稳定就业服务。因此，江苏在改变为了保持制造业大省地位所保留的无效率的劳动力和资本使用方式同时，必须在就业和效率之间进行新的权衡，找到一条既能促进我省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又能稳定我省就业的创新驱动发展新道路。这要求苏南地区率先服务化：减少制造业生产，减少储蓄，扩大消费。当前，相比国内其他“落后”地区，苏北崛起具有省级财政实力雄厚、基础设施发展迅速和苏南制造业发达的独特优势。因势利导，苏北的发展路径可以主要归为以下四点：

（1）江苏转型的抓手在苏南，江苏发展的潜力在苏北，因此，省级财政统筹要向苏北地区适度倾斜，继续扩大对苏北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国有投资；（2）注重发挥苏北比较优势，鼓励并引导社会资本优先进入苏北的特产农业、物流业和旅游业；（3）省内做好协调联动，产业升级与稳定就业同步，苏南腾笼换鸟的同时，优先苏北有选择地承接苏南产业转移；（4）因城施策，营造我省“落后地区”房价上涨预期，帮助苏北去库存，并继续推进苏北地区农民工市民化工程和实施人才战略，吸引国内工商资本和当地户籍人口回流。

杨向阳：

（1）在省级政府层面，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官员考核与晋升，可以考虑给予更加多样化和

更具弹性的标准及导向，这将是引导和鼓励地方政府考虑并采取更为生态化发展思路的有力工具。在当下环境，江苏应该有比较充分的行政基础来采取这种做法，包括争取国家支持。（2）在对待工业化问题上，赞同刘老师说的，并非苏北地区每个地方都要大而全，比如宿迁，完全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符合生态化发展的产业部门，这也更符合有限地理范围和资源禀赋的实际。（3）在发展路径上，赞同颜银根提到的从产业入手，这应该是地方政府很需要的。现在尽管地方政府都在做，可能也很积极，但总体上是主观性强，科学性差，表面文章多，实际效果小，可以考虑设立大学科技园区，与江苏现有高校科研院所广泛合作，以开放多元化的形式吸收智力支持，有效缓解短期内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的困境，为地方发展注入持续活力。

储胜金：

我个人的观点：

（1）苏北发展要切实转变方式，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苏北腹地有不少区域在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入限制开发区，要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关停改造污染型企业，还苏北一片净土，大力建设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基地，建立可追溯的优质农产品质量体系，为周边城市群、为全国、全世界提供有机食品、绿色食品。（2）苏北发展要有效改变布局。苏南乡镇工业分散布局始于短缺经济时代，那样的历史机会苏北已经失去了，同时苏北也不必承担苏南分散的农村工业化那样的资源环境成本。可以学习靖江经验，一个县集中规划发展一到两个开发区（一个开发区、一个高新区），在集聚中赢得效益、强化合作、培育三产、转移人口、遏制污染，也为创新发展提供产业、人才、市场和制度等支撑。苏北工业发展要向东陇海、沿海、沿运河等主要城镇轴集聚。（3）苏北发展要改变动力来源。外来移植型经济，消耗要素资源、留下环境污染，带走利润税收（税收优惠期一结束就撤资的不在少数），所谓只长骨头不长肉。苏北可以借鉴浙商的做法，采取特殊政策吸引苏北籍在外的企业家、科技人才和大学生回乡创业创新。（4）苏北发展要以新型城市化为依托。苏北小城镇基础比苏南差，因此要走集中型城镇化路子，把人口城镇化的重心放在重点中心镇、县城和省辖市，以较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较低的人均建设成本，支撑人口的集聚，支撑新型工业化发展。

王洪飞：

苏北发展不是要不要走传统工业化道路而是能不能走的通的问题。现在传统行业普遍面临产能过剩，怎么发展？其次，发展高端制造业或高科技行业，人才及配套能否满足？空中楼阁难于盖。因此，我认为苏北的发展只能在现有的环境资源条件下，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资源优势顺势而为！另外，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解决老百姓致富问题，则道路就更宽广了。第一，让土地集中流转，让种田能手与资本结合产生规模效益。第二，发展生态农业，让大家在吃到绿色食品的同时，增加农业收入。第三，与发达地区对接，提供特色

服务及配套服务。

黄金龙：

苏北的发展不是不要工业化，但不能再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环境的巨量投入，走规模扩张、粗放发展，甚至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路子，否则必然是越走越窄，最后“死路一条”，必须要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绿色化融合发展之路。这其中，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几条：

一是富民优先，这是苏北全面小康短板所在，也是苏北发展的主攻方向。苏北现在指望像过去苏南那样，依靠招商引资搞大范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不现实的，这么多年实践证明也是不可靠的，还是要实事求是，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手抓“打工经济”，一手发展“家门口经济”，让本地富余的劳动力有活干、有钱赚，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生活富起来，才是可取之道。二是立足实际，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发展特色经济，不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比如，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现在苏南在搞，苏中在搞，苏北也在搞，这是不行的，苏北还是要根据自身资源、产业优势，瞄准几个有基础、有优势的方向，攥紧拳头、集中发力。三是依靠科技，尽可能插上信息化、互联网的“翅膀”实现跨越腾飞。说白了，人家早已坐上“高铁”飞速奔驰，你总不能还在慢腾腾的“绿皮车”上晃悠。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戴上“高科技”这个装备，苏北是可以实现弯道超越、后发赶超的。四是突出生态，不能“家家点火”“村村冒烟”。苏北最大的优势是生态，最大的资本是环境，如果把这个优势丢了，把这个资本扔了，肯定得不偿失，将来也会后悔莫及的。这里面，我们的考核导向也要作必要的调整，对苏北地区要减轻经济考核的压力，适度增加生态环保权重，甚至对一些生态脆弱、以农为主的地方，完全可以不设经济指标类考核。当然，苏北的发展主要靠自己，但也离不开必要的外界支持，特别是在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合作、技术人才等方面，还需要一如既往地给予更大力度支持。

房地产业作为“动力产业”的功能： 历史地位、现实窘境和未来展望

2016年10月7日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给出了本次线上讨论的议题：

“房地产业作为‘动力产业’的功能：历史地位、现实窘境和未来展望”，并率先给出了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发达国家“房地产业”的相关背景作为分析参考，引导长江产经智库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一场线上专题讨论。本期的推文我们整理了来自政、企、学、研各界专家、学者的观点供大家交流。

发达国家背景：

美国：

虽然也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但是总体上并不把土地和房产作为财富保值和增值的手段。统计发现，在过去一百年内，美国股票的年均收益率每年达到9%；而土地的价值在1900-2000年的100年里，只上升了大约24%（扣除通货膨胀因素）。

德国：

政府强调制造业强国的无可替代地位和功能，强调房地产市场的社会福利性质，因此不把住房作为可以自由交易的资产，以防止纯粹市场化后人们对房地产进行不适当的炒作。1997年-2007年，德国房价每年平均上涨1%，而同期物价水平却每年平均上涨2%，这说明德国的房价实际上在以每年1%的速度缩水，没有保值增值功能。

日本：

1985年前的模式与德国相同，1985年后，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和日元不断升值，日本政府开始允许房地产成为可以自由交易的金融资产，股票市场也逐步发展和活跃起来。由此资金纷纷流向不断涨价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随着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步入漫长的衰退期。

观点

刘志彪：

房地产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与家用电器、小汽车一样，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但是众所周知，主导产业是会随发展水平和程度提高而发生轮换更替的。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出发，论证它的历史作用、主导产业势能的持续性、以及可能分化发展的趋向。没有足够的需求基础，任何人为选择的主导产业，必将彻底失败。

其实从城镇化率看房地产需求，是一种大周期理论。但是房价问题复杂，不仅受城镇化率影响，也受国家的房地产制度、房地产供应量、货币发行、人口结构、经济增长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因此我们不能说，城镇化率不到 75% 或 85%，房价就一直会有强大的需求，就一定只涨不跌，因为在大周期阶段，房价价值逻辑可能脱离基本面，有严重泡沫化的可能，这可能使得城镇化的大周期提前到达终点，支柱产业地位提前塌陷。

房地产业作为“动力产业”的功能，很少有人从它作为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机制来考虑。其实，中国地方政府过去一直没有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机制，基础设施建设全靠银行借贷；分税制改革之后只留给地方政府百分之二十五的增值税，与其职能日益扩大发生根本性冲突。因此其历史地位、现实窘境和未来发展的展望，离不开这个重大的体制条件和框架。

陈柳：

关于房地产业作为“动力产业”的问题，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如何与国际比较？老牌西方国家城镇化的年代比较早，与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国际化的阶段可比性不一定强，另外一个重要的不同是土地制度完全不同，所以德国这样的国家好像一直没有将房地产作为动力，日本的也未必是政府要将房地产作为发展动力。我国或许更多的可以借鉴韩国、台湾的经验。第二，中国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房地产作为发展动力，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没有 1998 年以后的房地产市场化，不论是城市经营中的基础设施，还是居民居住条件改善都做不到。第三，现实看，2010 年之前房地产价格上涨都是普涨，可见需求基本面强劲；而本轮上涨是冰火两重天，作为普遍性的动力引擎的作用在减弱。

邵军：

住房制度改革本来应是一个很成功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存在三个问题才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一是税制改革把卖地收入全给地方，导致土地财政，地价高才是房价高的根本；二是民间投资渠道不畅，对民营经济限制太多，把民间投资挤向房地产；三是货币宽松推波助澜，使住宅脱离实用功能成为投资品。

翟太煌:

房地产的历史功绩:

(1) 将中国经济推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 将央行超发的货币逐步而客观地吸收进来, 稳定了整体物价; (3) 为突破户籍制度的束缚, 进而开启城市化过程, 同时在最大限度内, 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传统梦想。

刘根荣:

房地产行业由于其强大的产业关联效应成为中国经济近 20 年发展的强大动力, 其历史与现实作用不可抹杀。但随着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深入, 社会已达成普遍的共识:

房地产经济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形成了现实的伤害, 房地产的产品特性不再是满足功能性需求, 而逐渐演化为金融产品, 其风险集聚效应日渐凸显。无论是学者、官员、普通民众以及房地产业界本身都意识到这其中的风险。但为何会出现集体行动的非理性? 深究起来, 不外乎四个原因:

一是地方财政在日益严重的经济下行过程中, 财政的困难使得政府容易依靠提高土地价格的方式取得地方财政收入; 二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公共产品区域性分布不均衡, 导致大量人口流入少数城市, 需求推动房价上涨; 三是有效投资渠道有限, 在股市大跌的背景下, 民间资本大量进入房地产领域, 可以获得低成本的杠杆融资; 四是目前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期间缺乏新的产业支撑, 房地产行业又被地方政府有意或无意作为主导产业。因此, 房地产业区域性过热, 实质是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 是动力切换过程中的一种动力补偿行为。

孙 军:

房地产的基本功能就是居住功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就是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满足该功能。当然由于房价比较高, 中低收入阶层买不起, 因此政府要做的就是市场之外, 运用政府之手, 通过廉租房、公租房等来保障这些人群的基本需求。

房地产业能够发展起来的前提, 一是市场化, 二是有大量购买能力和改善需求的购买者, 而后者是建立在经济曾经增长过、居民有储蓄这个基础之上的。因此, 房地产在经济增长中的真正功能是, 当经济发展动力消退时, 房地产来接棒, 拉动经济增长, 进而满足消费者欲望。也就是说, 房地产是个过渡性的动力产业(原因在于房地产不可能形成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而如果形成了房地产依赖症, 那就是舍本逐末, 必将扭曲经济, 歪曲事实。

王洪飞:

房地产业这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对城市面貌改善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客观讲, 这几年各地方的市政建设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土地出让金。

方向阳：

房价收入比应是一个判断“房价高不高”的基本指标，当然各地有差异。但是看整个房屋组成，建筑安装成本占比不大，特别是鸽子笼式的居民房基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为什么能成功的使价格远远偏离价值：

第一，公共资源——土地的垄断伴随着住房供给的垄断；第二，必需品的基本保障的缺位，住房本应该归于一个现代人的基本权利和生活必需品，是政府应该保障的范围，但目前的保障房体制存在保障严重不足问题，大量刚需者一方面被高房价碾压，另一方面也是高房价的支撑者；第三，在必需品的供求博弈上，供给端居于天然的优势地位，这个在民生行业都有类似的现象；第四，中国人口多，畸形的大城市化造成人口集聚、消费者权益保障不力。其实，解决的办法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就有：

一是级差地租归公；二是征收暴利税；三是保障好每个人的基本的居住权利；四是剩下的交给市场；五是良知和决心。

巫强：

谈一谈我的一些看法：

（1）房地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这个判断的理由在于：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在继续；地方政府利用房地产作为融资工具这种格局难以改变；目前似乎还找不到其他行业代替房地产对国民经济起到同等的拉动作用。

（2）房地产业的服务化趋势。房地产属于建筑业，但是当大量房地产存量产生后，如何完善和提升现有存量房地产所附带的服务水平，这会成为未来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其中也蕴含了生活服务业大量的商机，延伸出养老地产、健康医疗等多种新业态。

（3）房地产的资产证券化趋势。房地产与金融业结合紧密，其开发、建设、购买、消费等多个环节中都和金融业结合在一起。以往是商业银行以贷款方式参与房地产行业的开发、建设和购买环节，是间接金融的体现；未来可能是以存量房地产的持续收益为基础资产，开发衍生金融产品，是直接金融的体现。当然，这可能又会产生新的风险，所以如何应对房地产的资产证券化趋势中的风险，应该成为政府需要提前考虑的问题。

（4）房地产业的差异分化趋势。一是房地产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绩效分化，例如房地产开发建筑环节的业绩可能会下滑，而房地产消费环节的相关服务业会逐步兴起。二是房地产产业链上同一环节内部的绩效分化，以开发建筑环节为例，央企背景的房地产企业凭借信贷资源优势，可以巩固其市场优势地位，而中小房地产企业无地可拿，无房可卖，会逐步退出房地产行业。三是不同等级城市的房地产行业绩效分化。人口向一线二线城市集中，在缺乏投资渠道的前提下，资金也向一线二线城市集中，一、二线城市房价依然会有保持上涨趋势，这些城市在房地产调控背景下，房价缓涨或不涨（不排除局部有下跌的可能性），伴随交易量下降将是常态。特别要提出的是，期待一、二线城市的全线大跌不太现实，这也是所有理性的城市居

民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而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房地产行业去库存难度较大，在这类城市中个别城市出现房地产危机的概率可能会加大。

孙国民：

财政权的下放，有利于地方降低土地财政的冲动，也有利于降低地产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的支撑性作用。

(1) 产业的生命周期发端于新兴技术，而房地产实质上不是一个单一产业，缺乏具体产业的明显技术主导升级路线图，可视为综合性的最终产业，且技术含量总体不高，某种程度说明，该产业带动增长尚可，带动升级发展作用有限。从上述生命周期情况看，本人认为可判定房地产产业目前仍为中国十大支柱产业之一，只是在前十名排序中位次有所下降。

(2) 假定房地产进入衰退阶段，经济增长继续保持7%左右的稳定增幅，那么经济体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可替代的产业，或者其他支柱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有色金属产业、汽车产业、钢铁产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纺织业、船舶制造业、石化工业、房地产业、轻工业等十大支柱产业中，表现特别好的产业不是很多，有一半的支柱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寻找新动力，除了需要在材料工业、信息通讯、新能源产业、高端装备领域产生质性技术外，还要在生命健康产业、居家养老服务、大数据产业等新兴信息产业、军民融合产业中寻找新动能。

(3) 从新旧动能分化及培育情况看，虽然新旧动能在转换，但尚未形成完全替代关系，新兴产业走完这个替代过程，需要相当时日。

(4) 从产业链条看，房地产链条长，涉及面广，既涉及制造业，又涉及生活服务业，波及面广，带动效应大，乘数效应好，给去化功能带来很大难度，特别是它深度融入了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函数中，很难找到新的可以替代的发展变量。

郑江淮：

房地产业作为“动力产业”的提法比较模糊，但是从地方政府投融资角度看，其含义不是线性的，在城镇化不同阶段上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呈现一种倒U型特征。在城镇化率很低阶段时（可能是20%时），可用于工业或城市发展的土地供给相对过剩时，房地产投资中的土地财政功能比较有限，地方政府更多地依赖于其他手段来促进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业应算不上“动力产业”。当城镇化率上升到一定的水平时（可能是40%—50%时），用于发展的土地供给变得相对稀缺，土地财政收入预期明显上升，此时为地方政府投资或其他公共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要强于其他途径，对产业发展来说，土地价格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标，促进产业空间优化配置，此阶段房地产作为“动力产业”表现比较突出。当城镇化率达到较高水平时（可能是50%—70%时），可用于发展的土地更为稀缺，此时房地产业对地方政府来说看上去可能还是“动力产业”，其实不然，原因是当土地价格被扭曲地推高，失去了产业优化

再配置的指向功能，使得资金、高技能劳动力过度地集中于对土地价格承受能力较强的行业，限制了已有的产业体系向分工深化、可贸易程度更高的方向演变，结果牺牲了整体经济增长潜力。此阶段房地产不是“动力产业”，而是“不相容性分利产业”，此阶段，政府应该限制房地产业泡沫化发展。当前各地政府如果有勇气的话，尤其是库存比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可以把库存房地产全部限价买下来，作为廉住房，以此来救赎自己。

闫浩：

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和食品、药品等提供基础生活资料的产业类似，也应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趋向社会平均利润率，必要时政府之手也要拨弄一下。

中国房地产的“罪过”在于，它的投机性和阶段暴利性对其它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产生抽血效应，严重阻碍了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让中国得了“荷兰病”。

李锋：

别的行业也想投机和暴利，但却实现不了。房地产之所以成为暴利行业，其原因：

一是地方财政对土地收益的依赖；二是钱多形成的优质资产荒，中心城市的房产无论在银行还是老百姓眼中绝对是优质资产；三是房地产相对于股票市场来说较难变现，手续繁杂，股票持有者对股票市场的调控会有连续激烈反应，而住房持有者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一般选择观望，市场会以连续交易缩量消化利空，不会有明显的跌幅，随即就会在地方政府耐不住的情况下再次上涨，所以房产价格十多年来基本单边上涨。

陈建军：

本次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和价格的上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要素自由流动的加速，也反映了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的深化，由此产生社会资金向热点地区快速集中的可能，推高了局部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扬，进而拉大了不同城市、不同地区间房地产价格的差距，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出现的新问题。

张晔：

为什么需要去库存的区域没去掉库存，反而是一线中心城市的房价暴涨。实际上背后只有4个字：

大城市化。

房地产业的风险不在一线和少数二线，而在三四线，人口流失、需求减少，地方政府只能依靠卖地获取财政收入，使得房子越来越多却没有人买，这个才是危险的。

王思彤：

房地产业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发展壮大由弱到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趋势，虽然它可能不是经济的发动机，但它对经济、金融和百姓生活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我认为，控制房价的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区域人口的过快增长。

姜德波：

在过去的 10-15 年，房地产、汽车、旅游等，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这是满足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结果。其中，房地产因具有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双重特点且契合政府财政来源的特征，其主导产业地位尤其突出。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下一阶段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升级转向，可能的方向是以提升生活质量的服务产业（包括休闲娱乐、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养老护理等），可是，这样的产业对政府即期收入的正向作用不显著，地方政府难以投入全力去扶持和引导，因此，在今后的 5-10 年，房地产业的主导地位仍然难以撼动。

张鹏远：

后发国家，衣食住行无疑是最大的支柱产业，之后才是医疗卫生、教育、健康、文化、娱乐等产业。大约 1985 年到 2005 年，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也就是衣食问题；2006 年之后是在解决住行问题。现在国内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又遇上世界经济不景气，出口不旺，过剩的流动性，导致房地产业一枝独秀。

林乐芬：

房地产业的作用：

1999 年国家因为推出住房按揭抵押贷款这一金融产品，使得住房市场化快速推进并成功成为我们国家持续三个五年计划的支柱产业，其贡献是，一是解决了我国建国以来半个世纪都未能解决的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困扰；二是诞生了一批财产性收入群体，过去中国家庭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甚至不知道这个概念。当然，房地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应该是阶段性的，自 2008 年以后已经基本完成历史使命。

但是最值得反思的，不是房地产业为什么至今还是很多城市 GDP 的主要贡献产业，而是为什么自 2005 年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来，各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没有诞生？还不能替代房地产业？我个人认为，目前国家为了激励企业回归实体经济进行创新，应该采用财税激励政策，就像 90 年代末期招商引资鼓励外企来中国的所得税财税政策：

“前三年所得税全免，后两年减半征收”，切实达到“三去一补一降”中的“一降”任务。

姜彩楼：

房地产业历史地位：

随着经济不断增长，国内市场开始发育，服装、家电和房地产等消费型产业出现了快速发展。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蔓延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动力逐渐衰弱。发展房地产一方面是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要求，也符合我国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而且产业带动力强，有助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房地产发展客观上调动了社会力量改善住房条件，对解决住房问题，改善城市面貌有积极作用，同时对财政贡献较大，为我国引进科技人才、建设科技创新基础设施提供了保障。

房地产业现实窘境：

我国房地产本身是一个低技术行业，难以带动自身和相关产业创新升级，但是房地产又长期保持高利润，破坏了市场作为产业创新动力的正常反馈机制。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还拉高了社会生产成本，掠夺了其他行业的利润空间。由于房地产价格长期上升，超过经济增长的合理预期，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容易引起社会问题。

房地产业未来出路：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合理的定价机制，通过价格机制驱动生产要素流向其他行业，保持合理利润，通过财政手段协调房地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培育新兴产业。同时要重视社会对住房的刚需部分，增强房地产的社会保障功能。

张月友：

房地产业历史地位：

客观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启动之初的几年，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对引导消费和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改善城市居民生活条件，加强廉政建设，乃至对启动市场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也一度对于中国保就业和促增长等发挥了良好的救急作用。可以说，整体上，近20年来，房地产业对中国的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保稳定等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的。

房地产业现实窘境：

但是，始于2013年左右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分化，使得房地产市场发展开始偏离让其发挥居住功能初衷，沦为少数富人阶级投机的工具。当前，“一边是大量房屋空置，一边是大多数人无房可居”的奇观开始成为中国城市新常态。特别地，自“三去一降一补”成为中央经济2016年五大任务以来，中国政府本轮启动一、二线核心城市房价上涨，通过“挤出效应”带动周边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努力有目共睹。然而，现在看来，这个初衷并没有成功实现，相反，不仅增加了三四线去库存难度，而且侵蚀了中国多年来由二元经济努力向一元经济转变的成果。中国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对我国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乃至对城市居民宜居宜业和创新创业等都开始产生不利影响。抑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房地产业未来展望：

(1) 限制个别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并不意味着中国楼市要崩盘。中国房地产不会崩盘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本轮一线、核心二线和部分卫星城市房价上涨，是楼市分化的产物；第二，楼市分化的另一面是一线和核心二线城市房价暴涨，但这些少数地区有人口和精英群体的强购买力支撑。(2) 中国房地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房地产问题从空间上讲是城市化问题。中国城市化的现实是土地城市化快过人口城市化。2015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落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达16个百分点（前者为39.9%，后者为56.1%）。

周 斌：

房地产业历史地位：

房地产业在商品房改革后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起到了很大的发展作用：

第一，它自身就能带动整个产业链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第二，因为分税制的存在以及地方政府可选择财权的有限，土地财政给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所需的资金；第三，房价一定程度的走高对居民的存款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同时也激励创造更大的价值。

房地产业现实窘境：

随着房地产业快速发展，从居住功能到投资功能，再到投机功能，使得房价越来越高，这让前期所起的积极作用，逐步出现了减缓甚至是拐点，从而出现了负面影响，对实体经济、人才都产生了挤出效应。

房地产业未来展望：

要努力引导其向健康发展：第一，保留居住和投资的功能，必须减少和消除投机作用；第二，土地财政的有效利用，必须让城市发展和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土地财政的红利，解决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第三，房地产业必须考虑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不能仅是住宅，城市要考虑产城融合，提高土地的单位贡献，农村要深入考虑房地产业与农业、旅游业以及文化产业的有效结合，发挥1+1大于2的效果。

任保全：

房地产业历史地位：由于房地产业的前后关联度很强，不仅为经济社会发展供给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房地产始终都是中国的重要支柱性产业。

房地产业现实窘境：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还不够成熟：一是，伴随着“资产荒”所呈现的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商品房价格暴涨；二是，部分城市的房地产面临着较大的去库存压力；三是，与住宅市场火爆相反的是商业地产却十分惨淡，这也暴露出房地产内部结构性问题。显然，中国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匹配存在不适应性问题。

房地产业未来展望：（1）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房地产业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仍大有作为，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然是重要的支柱产业。但是，在推进城镇化和实施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要大胆主动地对房地产进行强有力的引导和调控，挤出投机性需求，让房地产业平稳回到合理的发展轨道上来，使房地产业对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2）由于房地产业是产业链前后关联度非常高的产业，所以在关注房地产业本身的成长性问题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房地产业上下游产业链的持续成长性。通过前期的产业干预和引导，逐步降低和熨平房地产上下游产业受房地产业波动的冲击力，将极大降低经济发展中的房地产业的风险性，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具体来说：对于房地产业的上游产业链，可以通过大力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等绿色节能新型建筑材料，并提高国家建筑质量标准，从而增加房地产业的附加值，推动相关上游产业发展，抵消未来可能出现的房地产业下滑而对上游关联产业的冲击；对于房地产业的下游产业链，可以通过基于互联网+的家装O2O平台的建设，降低家装的交易成本，消除家装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打造超大规模的家装集聚产业；进一步延伸房地产业链条，推动房地产业与养老、教育、健康、文体和医疗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拓展产业范围，通过产业间的融合发展，降低房地产业的风险性，推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3）优化房地产业发展内部结构，即扭转住宅市场火爆，而商业地产惨淡的现状。可以在推进城镇化背景下，通过产城融合的合理规划，盘活空置率高的商业地产，并且通过鼓励O2O商业模式，以及大力发展受电商冲击小的特色产业，从而推进商业地产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鲁明泓：

（1）房地产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长寿的产业。中国经济中的绝大多数行业的寿命是比较短的，少则二三年（如早期的VCD、DVD等），长则七八年，而像房地产行业这样已有近二十年的寿命，而且至少还能延续三五年的主导行业恐怕只有这一家了。为什么其它行业的寿命比较短呢？一是迅速扩张的产能，即使是世界级的需求也能满足；二是可以快速掌握已有技术，但往往不能突破技术瓶颈（如光伏等）；三是那些行业满足的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房地产在上述几个方面有其特别之处。一是土地供给的有限性；二是房地产是个低技术行业，不会碰到技术瓶颈；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不仅是消费品，还是中国百姓最合适的投资品（这个特点有关房地产的未来定位，后有论述）。这么长的寿命使得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觉得它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第二功臣（第一功臣是为中国出口创汇作出贡献的外向型行业）。

（2）房地产未来的定位是中国家庭最主要的资产。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资产主要有房产、股票、现金、国债、企业债券、土地、专利和特许权、工厂和机器、黄金、珠宝、艺术品等。就中国普通民众来说，既能跑赢通胀又比较现实的资产有：房产、股票、黄金，其中房产最合适。在中国的股市里，散户或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尚未得到有效保护。黄金的流动性比较差，而且深度和广度都不够。只有房产既有深度和广度，流动性也适中。

（3）假如我们将房地产的发展锚定为未来中国普通民众最重要的家庭资产，那么如何应

付当前的泡沫呢？可以通过松绑商业地产，使涌向住宅地产的资金分流到商业地产。目前商业地产的价格只有住宅地产的一半到 1/3。具体措施有：将商业地产的使用权年限从 50 年延长到 70 年，允许将商业地产转成住宅地产（当然要缴费，纽约曼哈顿很多），大幅减少转商业地产的税费（约占转让价格的 30-50%。这里瞎扯一句，都说房地产有泡沫，但是商业地产就没有；都说无法控制泡沫，事实上，商业地产的泡沫控制的很好！）对房地产开发商征收更高的税费，并收缴一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补贴其它行业。可以考虑像出口行业退税那样，对亏损行业或要鼓励的行业减免增值税。就许家印那个案例，如果国家对房地产征收更多的税，对粮油水以及其它制造业减免增值税，情况可能就不同了。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增加土地供给，提供廉租房，提供住房补贴等民生措施。

史上最严房地产调控：走势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2016年10月10日

从9月30日到10月6日，限购新政就相继在北京、天津、郑州、无锡、济南、合肥、武汉、苏州、南京、深圳、广州、珠海、东莞等十余个城市落地。9月30日，北京市要求首套首付比例不低于35%、二套最高70%。10月5日，南京市出台的调控政策规定，非该市户籍居民家庭在南京购买首套住房需提供1年及以上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城镇社会保险）缴纳证明，该市户籍成年单身人士（含离异）限购1套住房。通知要求在保持居民首套首次最低首付不低于30%的基础上，有一套住房没有贷款和有购房贷款记录已结清的居民家庭再购房首付不低于50%，有一套住房且贷款未结清的家庭再购房首付比例不得低于80%，并对有两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停发住房贷款。由此，2016年“国庆”成为史上房地产调控政策最为密集的假期。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认为此次各地密集发布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史上最严房地产调控，并引导群内专家针对房地产市场下一步的走势、调控政策出台对经济运行的复杂影响以及对策建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期推文我们整理了各方观点以供交流。

观点

刘志彪：

我说这次调控是史无前例的严厉，主要依据是：除了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外，中央还认为9个省和16个城市房地产情况，影响的不仅是本市，更是全国；影响的不仅是经济，更是政治。稳定住了这些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对国家是重大贡献，如果稳定不住就是失职。由此启动督办会、内部约谈、国务院领导公开约谈，直至启动问责。这次调控以尽快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为目标，保证房价环比不增长，逐步有回落，努力回归到合理区间。动用的办法包括限购、限贷、确保土地和新房供应，遏制各种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等手段。

根据“有买必有卖、收支必相等”的原则，套住一部分高位买房者，必然会有相应的卖房者资金成功出逃（并不是如流行所说，炒房资金全部被套）。这些已经从房市出来的资金肯定要寻求出处。这些资金选择去哪里，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运行态势。（1）如果看空人民币，它就会选择换外汇避险，从而对我国外汇储备产生极大的影响。（2）目前态势下，如果股市继续萎靡不振，确实很难吸引这些从楼市出来的资金。策略上，可以选择人民币迅速大幅度一

次性贬值，以堵住这些外流资金；也可以选择启动股市的办法吸引资金留在国内。前者应该不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最优选择；而且，按现在美国经济的状况，可能也不会同意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后者我觉得是一个较好的招术，它可以通过股市的特殊传输机制，把这些资金吸收到实体经济中去，用于支持实体企业的创新。

此次调控会议也明确提出了“加快房产税立法工作”的办法，在市场收紧的环境下，房地产税因为是对存量持有人收税，如果税率高一些且房价上涨预期小，一定会把巨大的存量房挤出来，从而导致房价下跌。现阶段房价下跌并非政府目标，而是尽快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所以此次中央调控会议虽明确提出了“加快房产税立法工作”的办法，但我认为政府仍会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实在控制不住，才会决定用这个杀手锏。

陈志龙、张 晔：

不从顶层设计（土地制度）上改变，目前的楼市困局无解。过去几天七手八脚棍棒齐下，市场从极度亢奋到“心跳骤停”，风险也很大，不少人担心类似去年的“异常波动”会重演。土地和房地产是过去二十年来经济体的流动性之源，没有流动性的市场是恐怖的，价值体系被摧毁，所有的价格都没有意义。

王辉龙：

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抗生素效应”已经形成：撤掉，没有其他能立即见效的替代品；持续使用，依赖会越来越大，甚至出现无药可用的局面——其他制造业产业都无法成为新的增长点。但从经济肌体长期健康的角度出发，必须忍受短期的疼痛，破除抗生素依赖。这次没有“国”字头的文件，以“因城施策”的方式推出调控方案，一方面说明当前房地产问题的城市差异较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不同以往的“药方”改变。这次力度空前，南京甚至短时间内再次加码，说明问题严峻、复杂、紧迫。投资投机者会根据后续政策跟进情况及其效果，判断政府的决心有多大。政府会根据市场反应，判断下一步该怎么走。误伤改善性需求在所难免，但这次政府决心之大不容怀疑。

陈长江：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第一，前期的房价快速上涨虽然短期拉动了经济增长、缓解了地方政府债务，但是有显著迹象表明，房价过快上升对当前中国的核心任务——经济转型造成了负面影响，房价快速上涨通过吸血效应、结构扭曲效应，对企业投资实体、投资技术改造、投资创新造成了影响，不仅仅是抗生素，而是鸦片。鸦片缓解短期头疼，但是造成的扭曲和增长幻觉，患处极大。其次，当前的控制政策虽然过猛、过严，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大城市的要素自由流动和要素活力，但是不足以对今年以及后几年的稳增长目标造成影响，因此不需要过于担心。第三，造成当前困局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增长新动力、发展新支撑并没有建立起来，

主要是某些关键性的改革进一退二，共识和决心不足，导致了目前必须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东筹西措、应接不暇的补漏补缺。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不过是当前“两难困境”的被动选择。当前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推动产业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如果还按照当前的技术和生产率趋势，所有的折腾无论宽严最终结果都是徒增悲伤。

张月友：

本轮房地产政策调控最大特点是因城施策，精准施策。新政的出台，是“增量抑制，存量放开”，对抑制新房成交有效，二手房去库存也会有效（即新房成交下降，二手房成交可能不会下降），看近期数据也是符合的。各城市根据自身功能定位、土地储备、开发和房屋库存情况出台调控措施，即使是前期房价涨幅大的重点城市间，政策调控着力点和力度的差别也很大。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区域，政策也是有压有稳也有保。当然，这种调控特点由本轮房地产市场发展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矛盾特点决定。体现了管理者的房地产政策调控是本着实事求是原则，思路是清晰深明的，力度是循序渐进的，也拥有运筹帷幄的大局观。但由于目前的政策着力点并不直接增加持有者的持有成本，且不同于股市，房地产市场不具有做空功能，本轮热点城市的房地产政策拐点可能并不意味着市场拐点的到来。预期“观望”和“量跌价稳”会成为这些城市未来一年的市场主体走势特征。然而，必须要认识到的是，解决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只是临时缓解了房地产市场结构性矛盾的一方面，中国绝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去库存问题能否有效解决，将决定本轮政策调控是否真正成功。整体上，个人对本轮调控以及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乐观。原因是：（1）产能部分消化了，储蓄消费了，内需扩大了，中国经济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迈进了；（2）有效预防了人民币市场化贬值可能带来的资本出逃压力和金融风险；（3）政府、银行和国有地产商下一步进军精准扶贫、落后地区补基建短板、三四线去库存、地铁大跃进和城镇化，又可以“满血复活”了。

王思彤：

此次房地产调控，至少有一个经验一个教训值得汲取。一个经验就是决策不一刀切，而是针对全国房地产表现分化明显的特点，因地制宜，一地一策，赋予各地灵活的处置权，从而保证了短期内非正常迅猛上涨的十几个大城市的房价得到有效抑制，同时又不影响房价不温不火的地区继续去库存。一个教训就是前期的去库存政策被简单化地应用到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包括那些房价已经很高，商品房存量并不太大的大城市，不恰当地出台了放开住房限购的政策，诱发了新一轮的房价上涨，不得不迅速出台急转直下的限购令，导致百姓对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忽上忽下的政策产生非议。

杜运芬：

调控之后，难点在于如何引导资金流向，短时间内进入实体经济不是很现实，可以引入股市，

抓住机会深化股市改革，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营造赚钱效应。如果资金进入汇市，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外储进一步下降，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张 晔：

过于强调城镇化导致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大量增加，而同时一、二线城市住房供应短缺。由于中国人口不断涌向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一、二线大城市，故大城市化应该会慢慢成为社会共识，这也是我在2009年就提出的观点，随后合肥、南京、杭州等二线城市房价的大涨，也印证了这一点。在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还很低的情况下，从整体而言，房价大幅下跌的可能不存在。至少从世界各国出现泡沫的情况看，大多是在局部出现了人口的下降或城镇化率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下出现的，中国还没到那个时候。

陈 柳：

中国靠农产品的剪刀差的原始积累搞工业化，靠土地拍卖的土地财政模式完成原始积累搞城镇化，这两种模式在历史上都有它的合理性，但都要转型。

陈建军：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应该还会继续发展，房地产价格总体上来讲，还会稳步上升。探讨房地产价格的走向，以及讨论高层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标，从大处讲，需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角度来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说到底主要就是二点，第一点是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第二点是官企合作，房地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中国案例，它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大程度的整合了官产民三方精英利益的契合点，以及中央-地方关系稳定之锚，承担了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责任的各级地方政府，正是通过房地产业发展，获得了他们发展地方经济和城市经济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而房地产商通过和政府的合作获得了巨额利益和成长前景，房地产业的发展还受广大购房者们的支撑，这些购房者的多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和既得利益者，由此形成一个稳固的官企民铁三角，这种利益格局是发展其他任何产业所难以替代的。直到现在它还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只是这样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制度架构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否可持续依旧不确定。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今后的问题，也是在这两个方面：第一是如何在目前国际分工体系中，实现从打工仔向主导者地位转变；第二是如何改变传统官企合作的发展模式，实现官商清晰的市场关系，这一点目前其实应该还是无解，这不是从经济学教科书中搬抄一下就能解决的。而新的制度模式没有出现之前，房地产业作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和官企民三方利益的压舱石的重要作用依旧不会弱化。任志强也就是因为看透这一点，所以他一再预言房地产价格不会下跌，因为只有稳步上升的房地产价格，才能推动房地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才能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及关联企业，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带来了稳定的收益，也为现

存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权益安排提供持续稳定的基础。

王 丰：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独特生态和居民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这是一个不充分竞争的卖方市场，这与经过充分市场竞争的很多行业有本质不同；不充分竞争的卖方市场导致房价长期持续单边上涨，在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上对其他实体产业有明显的挤压效应；房地产行业的类金融属性与中国传统金融体系的陈旧畸形，决定了它在占有金融资源方面对其他实体产业有明显的挤压效应。

何 雨：

国有，是中国土地市场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基本国情之一。现在大家都在批土地财政，但如果土地不进行市场化定价，又能有什么好的定价方式呢？政府控制土地转让节奏，亦不过是政府运用市场规则，谋求利益最大化。现在为了控房价，对土地又设置涨停价，相当程度体现政府诚意。可我们只提出要毁灭土地财政，却不考虑土地财政是不可能毁灭的，因为土地国有，只要市场化定价，必然形成土地财政，充其量，又是像分税制改革一样，再次把这块盘子与中央分成，可如此必然加剧集权，让地方丧失自主性与积极性。因此我十分迷茫与困惑的问题是：

土地财政妖魔化，究竟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如果是真问题，如何改革土地出让制度？能否把土地与财政进行切割与脱钩？

调控政策一方面是安抚民意；另一方面，也是控风险，因而是短期行为，寿命不会长。以南京的调控政策为例，几乎冻结了楼市流动性。在这个两年左右的调控期内，时间非常宝贵：一是要点燃实体经济以稳增长；二是货币政策要转向，收缩流动性，减轻汇市压力；三是要为资金寻找替代性栖身之所。这一时间窗口利用好的话，经济可能化危为安。否则，会形成多重危机叠加。

加杠杆与去库存不可兼得。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去库存是房地产业的优先目标。为了去库存，在居民端启动了加杠杆。现在风向已变，降杠杆成为优先目标。

岳中刚：

即使调控，房地产市场也不容易下跌，可能会横盘一段时间。房市不同于股市，一方面由于房市流动性较差，大多炒房者加的杠杆在承受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上涨的动力没有消除，炒房者短期以租养房，长期观望态势。

王洪亮：

住房需求可以分为刚需型、改善型和投机型。前两种需求者对住房的需求是长期的，不会短期通过买卖来扰动市场。而第三路需求者完全是投机，而且往往是大规模炒作来推动房价飙

升，这种投机资金往往快进快出，对市场有很大扰动。2007年和2016年都是典型年份。房价在短期内飙升，会对企业和居民的生活构成重要影响，使企业的用地成本上升，经济预期改变，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这次严厉的调控是必须的和恰当的。

这次调控的影响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二线楼市可能会“速冻”，成交量萎缩，价格可能存在粘性，暂时不会回落，交易者处于观望状态，在成交量连续下降6个月-12月后，价格应该会自然缓慢回落。三、四线楼市仍会出现大量库存难以消化，经济疲软可能性增大。

（2）从2015年的“去库存”到2016年的“最严限购”政策，政策转向太大，企业预期被修改和扰动，企业投资意愿下降。企业观望实体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确认经济较活跃后，在用地成本下降时，增加投资。（3）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老路走不通，需要为经济寻求新的增长点，这可能是现代服务业，可能是传统行业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形成的新业态。（4）经济疲软倒逼制度改革，只有制度改革才能释放持久的健康的经济活力，化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

张建华：

这些措施属于增量调整，不是存量调整，短期内的功效是抑制房价，估计被套者也不会担心，不会急于套现；长期影响可能仍然取决于经济走势，因为转型比较难。

如果这次禁令维持时间长，会有套现行为。套出的资金可能有3个流向：

出国，入股市，进入其他产业。如果限制出国，我估计会有后续政策出台，引导资金流向股市和其他产业，如果是这样，将有利于经济转型。当转型出现明朗趋势时，正是房产税推出之日，所以，在这之前，估计不会推出房产税。

田志刚：

房产税的出台只是时间的问题，政府至少会从三个方面考量：（1）出台的时间节点。这取决于调控后房价的稳定程度、财政收入的需要（涉及到地方政府财力问题）及税率等因素；（2）出台后的力度。房产税出台后，存量房的持有成本会增加，一方面会迫使一些投机者抛出房子，但更重要的是彻底打击了房价上涨的预期。政府对房地产税的效应可以通过税收要素设计来控制，如纳税人、税率、征税范围等设计，也许是温柔如绵羊的房地产税，也许是如恶狼般的房地产税，这取决于很多因素；（3）房地产税可能会涉及到地方税体系调整问题，特别是与土地有关的其他税种是否要重新布局。

孙军：

房地产行业是目前中国经济系统中的最重要一环之一，涉及（1）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债务问题，（2）资本去处问题，（3）中央-地方的分税制改革问题。理论上，这次调整是史上最严调控，房价不应该下不去。但是要明白，调控非常规性手段，时间长了又会造成供不应求、投机的问题。

若房价降或稳住，地方政府的债务如何偿还，资本将向何处去？按说分税制改革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但在经济下行、税收减少、老龄化、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等的情况下，新的税制改革恐怕地方政府获益也不会太多。不过地方政府债务短期可以由中央兜底，因此收入减少短期并不可怕。真正的问题在于，资金向何处去？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若资金无新的领域可去，一是会造成汇率贬值，二是房价起死回生，三是经济崩盘。因此，目前与降房价同等重要的是，为资金寻找出口。

我认为出口，一是继续在房地产上打转，一、二线房产增收房产税，引导资金进入三、四线城市；二是改革股票市场、教育、医疗以及国有企业等，这几个是改革可以快速推进的点。

沈志强：

首先，我不赞同刘老师所谓“有买必有卖，收支必相等”的原则，这是把房地产完全等同于投资品。从购买者的结构来看，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刚需，当下仍然是消费品。而且，从交易过程来看，买房者普遍使用杠杆，从金融层面反映为货币创造，而卖房者、开发商获得现金。开发商的利润流入股市概率（比例）不会大，而获得现金的卖房者有再投资的需求。我认为没必要把调控楼市与解决市场资金出路一起来谈。前面提到房市存在大量的杠杆，一部分资金使用了杠杆进入楼市投机炒楼，导致房价虚高。那么降杠杆就是了，或者定向加息（对非刚需的房地产贷款利率提高），这都是针对性的政策。这一轮调控，我觉得是高层最关注的房地产调控，而非史上最严厉的调控，因为那些调控手段之前都用过。为什么之前的调控效果不好，原因在于货币超发，而带来的通胀，因此，即使在这样的政策下，房地产价格也不会大幅回落，因为货币还在超发。

骆祖春：

1. 日本（1980—1990年代）和中国台湾（1980年代末—2000年）相继经历“货币升值—生产成本上涨—产业空心化—股市房市暴涨—股市房市暴跌”过程，中国发展也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路径，2015年6月已经发生股市暴跌，只差了房市暴跌这一个环节就完成了全流程闭环，一旦发生，后果相当严重，至少是10年以上萧条恢复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期承担不了这个代价。中央必须调控，否则要犯关键性错误。

2. 吸取以往调控“一刀切”的问题，采取了分类调控方法，且对重点地区进行重点防范。但目前的调控方法，较以前并没有什么变化，无非是限贷、限购、限地价办法，带有短期性特征，没有改变房地产升值的社会预期。鉴于一、二线城市在全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火车头”作用，必须实现该类地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必须保证它们的整体及产业竞争力，根本性措施在于实施有选择性“房地产空置税”，将空置住宅由投资品转为租赁住房及市场上出售的次新房。有关该税种设置，前几年有大范围、深入探讨。避免新税种的立法局限性，可在现行的房产税下设置空置房税目，便于尽快实施。此外，稳妥推进一、二线库存商业地产转化

为居民住宅进程，增加住宅供给，有效化解库存。

3. 房价走势可能三种前景（任泽平观点）：

第一种是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稳健，加强对贷款杠杆和土地投机的监管，2014年底启动的这一轮房价上涨周期接近尾声，未来横盘消化；第二种是继续实施衰退式货币宽松，货币超发和低利率，则房价可能不断创新高；第三种无论是主动的收紧货币（比如基于对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担忧）还是被动的收紧货币（比如美联储超预期加息，汇率贬值和资本流出压力增加），利率上升，房价面临调整压力。

4. 一、二线城市在本轮房地产价格暴涨中，获得了最大收益，有效地缓解了政府债务压力。保持城市的整体及产业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和执政的一个底限，在这一点上与中央期望相吻合，这是本轮宏观调控一个重要共识基础。为此，中央与省市要将此类地区发展压力减一减，减少这类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释放其债务压力，创造一个休养生息的“窗口期”，是对中国长远发展有利的现实选择。

毛丰付：

中国房地产目前主要有三个功能：社会功能、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在不同的时期，每项功能在政治决策权衡中的权重不同。从高层看这次调控强调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特别是后者，应该与担心汇率稳定有关。历次调控已表明这种调控是治标不治本，这次与以往会不同吗，要看后续配套制度能否跟上。

高德鸿：

这次房地产调控，一、二线房产投资短期内必然降温，甚至速冻，社会资本必然要找出路，有领导希望搞活三、四线房地产，问题是三、四线人口不增长，每家都有住房，房子已经过剩，搞活只能是吸引投资和投机资金进入，解放开发商，如果开发商再盖房子，房子又过剩，并且这只能拉动过剩的钢铁水泥，对经济结构改革没好处，不利于去产能，把资金引导到股市有利于国家经济结构改革，但是要坚决控制场外加杠杆，只需要引导自有资金和国家可控的透明的杠杆资金进入，从而产生结构型慢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刘根荣：

从房地产行业史无前例的严厉调控措施，至少可以做如下的判断与推测：

一是中央对一线以及少数二线城市房价的暴涨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并从政治稳定的大局要求坚决遏制房价过快增长趋势。二是通过放风 IMF 亚洲部建议出台房地产税可以看出，中央随时会使出备用杀手锏。三是中央对地方官员直接采取与房价增速有关的升迁绩效考核机制，遏制地方财政扩张冲动下的地价暴涨机制。

对调控政策的预期：可以短期内迅速抑制房价上涨趋势，遏制房产投机需求；但若调控政

策持续作用时间长，就可能带来房地产行业的整体萎缩，进入行业萧条期。原因在于：房地产行业原本在三、四线城市已呈现疲软、过剩态势，原本准备进入一、二线城市的资金恐怕并不会在调控政策出台后进入三、四线城市，这样会可能导致房地产行业整体性下滑。从现实角度讲，这并非中央政府本意，因此可预见，调控政策不会超过两年。

伊道科：

政府建了那么多的保障房、廉租房、安置房，大量空置，如何把这部分存量房源，引入居住市场，解决刚需居住问题，慢慢引导由单纯的买房向买房和租房并存的合理居住模式过渡。

孙国民：

房地产税需要抑制转嫁功能，二手房市场也需要配套政策出台。一是需要增加房地产持有成本，对需要抛售的第二套或者第三套以上的住房，增加惩罚性增值税。二是第二套或者第三套房如果不卖，以后拆迁等按照原购买价补偿，不按市场价补偿。三是第三套以上的住房必须挂售全国统一的房地产交易平台作为房源售卖；四是对过高二手房收益进行干预，限价销售，否则抑制不住。

张金华：

关于房地产提一点想法，抛砖引玉：房地产市场是受政府高度管制的。如果政府不希望房价下跌，极端情况可以采取不允许 10 年内的二手房卖出的政策，未来 5 年不挂牌住房用地等方式。与股市不同，政府调控房市能力相当强。同样不希望房价上涨也可以采取极端政策，如最近出台的调控。

房地产泡沫，最终从长周期来看其实就是房价的波动，建议房地产管理部门和研究部门做好下列工作：

(1) 基于未来 5-10 年城市人口总量以及城市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分布，要有对未来 5-10 年后房地产套数和面积的合理预计，包含老龄化的影响等。这样可以倒算政府可以增加挂牌的土地数量，以及土地财政收入等。这种工作中央和地方都要测算。

(2) 对 10 年后房价的合理预计，也就是到底什么样范围的房价是合理的。房价收入比是重要指标，真实收入的统计，以及外来人口数量和收入的统计、未来房价水平对实体的拉动和阻碍作用有多大、这种影响会传导到哪些方面。

(3) 目前的房价波动多少社会可以承受，尤其是向下波动。例如对超额货币的吸纳、对银行经营的影响。

刘晓昶：

在本次房地产调控后，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一段时间的空档期，在此空档期中，国人需要做

些什么，来为中国经济重新启动做准备？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价值创造理念，学习人家怎么以长期回报理念做农业、做制造业和进行科研创新的。从日本德国的案例可以看到，高端的有机蔬菜需要多年的土壤保持，精密的机械仪器来自于严苛的规范要求，诺贝尔奖的获得也需要不断积累后的厚积薄发。未来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启动内需、发展国内市场，更多的依然需要深度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在国际市场发挥作用。

扬子江城市群如何协同发展？

2016年10月22日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给出本次线上讨论的议题：“苏南苏中沿江城市群（简称扬子江城市群）如何协同发展？”并引导群内专家、学者们重点讨论了协同发展的范围或者对象、协同发展的具体内容以及如何实现协同发展（包括困难在哪里）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本期的推文我们整理了来自政、企、学、研各界专家、学者的观点供大家交流。

观点

刘志彪：

所谓协同，就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协同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

扬子江城市群协同发展，应该是功能分工协作基础上的合作和一体化，我定义为：为了实现江苏率先基本现代化的目标，通过规划和建设，使扬子江内各城市之间形成定位准确、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城市群落的过程或能力。如果仅把扬子江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浙江和上海来定位，不进行内部定位，是没有操作意义的。

现阶段扬子江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头号障碍是行政边界利益问题。

城市群是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发展的载体和参与全球竞争的空间单元。扬子江城市群是未来主导江苏社会经济发展主要力量。未来扬子江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其主要特征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功能体系，二是组织体系。其中功能体系的协同主要有二：

一是中心城市的发展要处于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主要体现在其要有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枢纽”功能和创新的“孵化器”功能。二是城市间要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各城市基于资源优势形成了互补分工与合作，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与效益的最大化。扬子江城市群的组织体系，要随着信息网络技术、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使过去城市群所呈现的那种“自上而下”的塔尖式结构，转化为“扁平化”的多中心网络结构。

扬子江城市群协同战略的主要内容，应该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战略，要在竞争的基础上形成明确的城市产业定位，形成中心城市服务业高度化+周围城市先进制造业的空间布局格局；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战略的协调，主要包括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硬件方面如高速铁路，节能、低碳的交通运输系统、能源规划、水资源利用等等；软件基础设施如教育资源、卫生健康机构、社会保障体系的配置等。三是环境保护和利用的协调。如农业和林业资源、

重要的开放空间、水资源的保护和协调等。

夏网生：

江苏的强政府导致跨行政区域的资源整合、产业协同很难，因此产业雷同更甚于浙江，打破这种格局，必须依靠跨区域的体制机制，今后的强政府更应体现在跨区域协同上。

孙军：

协同要体现在各自利用自身比较优势的互动发展上面，在这个基础上研究政策如何支持。

协同发展我认为目前有三个层面的动力：一是基础设施一体化，这一点比较容易；二是建立地方领导者的激励机制，驱动教育、医疗、养老甚至就业等一体化，目前看很难，需要省层面专门的领导协调；三是市场化创新驱动、分工合作机制，需要做的就是，让苏南的创新源与需求者互动，其中的关键在于把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能力市场化，让科研人员能够真正走出去，省政策做好支持、配套和衔接等。

孙国民：

扬子江城市群，首先是城市群落的概念，以后逐渐向一小时都市区方向发展，比如以南京为中心，以高铁为交通工具，形成一小时都市区。

扬子江城市群协同发展，需要从几个方面考虑：

（1）交通共连。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和一体化建设，城际铁路、高速公路、水运航运等形成陆、海、空交通网。

（2）产业共兴。城市间要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定位，如南京要以高端装备和高端服务业为主导，周边城市形成中高端产业承接的产业带，既形成产业梯度，又形成产业互补和差异化发展的道路，在城市群内形成富有创造力和弹性度大的产业生态系统和产业群落。

（3）环境共护。城市群内的天蓝、水绿、气新，要靠城市圈所有城市的共同努力，加强联合环境执法，推动“五水共治”和“五气共治”。

（4）市场共建。要形成统一的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人才市场、产权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等。

（5）城市群保障同城化。要推进城市群社会保障的同城化，推进城市群广大群众的市民化，共享同城一体化待遇。

（6）体制机制互通。创新机制，破除城市群之间的体制机制藩篱，如取消城际高速路收费、取消城市群之间差异化通信收费、推动异地注册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等。

从财税关系以及县治上看（如：郡县治，天下安），城市群所在的城市，特别是后进或者后发城市，财税要向县和镇一级倾斜，县域经济是我国城市化及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平台和重要节点，这里就涉及进一步理顺和优化财税体制，特别是企业所得税、房地产相关税种以及

税收返还等，同时还要考虑到县镇层面的扩权，赋予地级市层面的权限，重点在于财政权、人事权、执法权等制度安排。

陈 雯：

扬子江城市群是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北翼部分，其协同发展我认为有四个方面问题：

第一，协同有内部和外部的关系问题；第二，与上海分工关系问题；第三，与苏南和苏中关系；第四，跨江三角空间的重组问题。

协调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三个方面：第一，要素市场统筹，促进产业合作。第二，公共服务共享，促进福利均衡。第三，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区域合作。

闫 浩：

中外的差异在于：国外的行政边界不会影响要素流通，而中国的行政边界往往就成为市场的边界。因此，如果行政区划比较合理的话，在中国调整行政区划有时就成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高春亮：

城市群协同的核心是总部及生产性服务业起资源配置功能，决定网络等级关系。协同的关键是5市权限上收到省里，在省层面做分工和协同决策。全球化地方化概念配合城市网络，形成世界性城市与支撑世界性城市的次级城市。相当于上海门户，参与全球竞争，长三角其他城市配合，也可以认为是产业链环节的空间映射。如果上述说法成立，协同方向及微观动力机制可得到产业组织理论支持。多数高端生产服务业直接向总部负责，所以总部集中高端服务业集中，总部透过市场营销物流决定制造业布局。

何 雨：

协同发展，是个呼吁已久的话题，但一直收效甚微。《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使得江苏沿江八市的扬子江城市群建设，呼之欲出，这也让城市群之间的协同发展重新成为当下政策取向的紧迫而重大的问题。

在推动扬子江城市群协同发展上，我认为，应该吸取之前收效甚微的教训，主要有：一是应根据最新的国家城市定位，按照城市规模与等级，确立群内中心城市，作为整合、协调的权力中心。从现状看，当下城市群内呈现两大都市圈的竞合对峙。一个是苏锡常都市圈，二个是宁镇扬都市圈。目前看，苏锡常都市圈已经较为成熟，内部分工也相对成型。比较难的是宁镇扬都市圈。圈内龙头南京，总是向西看，试图整合马鞍山、滁州等近邻，而对向东看的省内兄弟城市，如镇江、扬州等，基本没有实质性整合动作，导致该城市圈内部缺乏凝聚力、向心力。此外，随着南通向上海的快速靠拢，传统的苏中沿江城市，在扬子江城市群中，究竟该如何定位，

非常困难，也亟需厘清。二是在发挥政府主导协同发展的同时，应充分注意自身的能力边界。尽管省政府可以进行不同城市跨行政区划间的协同布局，但是也无法以行政指导的方式进行推进。三是市场在协同发展中的基础性功能应该得到尊重。政府在协同发展的目标下，对产业布局进行引导，但是不能取代市场做出决策。四是在推动协同发展的同时，不应该打击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应预留群内城市之间的合理竞争，允许地方政府展开适度同质化竞争，并让市场做出自己的选择。适度的同质，有利于规模效应，甚至会导致质变，如美国的硅谷。

协同，控制好节奏与尺度，可能会有不错的结果；但是，如果掌控失当，反而可能会削足适履，损害既有城市的竞争力，限制相关城市未来的发展潜力。如果没有一个为沿江八市共同认可的中心城市，使其他城市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其靠拢，协同，恐怕又要沦为行政协同，最终还是无功而返。因此协同不仅要考虑相近水平不同产业的横向协同，还应考虑价值链上产业价值的梯度协同。

徐琴：

都市圈的行成需要三个要件：一是有个龙头城市；二是较大的城市化区域；三是内部合作要大于竞争。个人以为，只要不是政府直接投资和强拉硬扯的，产业同质化应该属于正常的市场表现和经济现象；并且是一个地区某个优势产业形成的发端、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形成的基础。无政府干预的、无数个同类企业的集聚才有了硅谷。

黄建忠：

所谓协同发展，个人认为应是国家层面的概念，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区域协同，没有内地农民工何来沿海的发展？没有农业省如何支撑工业大省？小区域的协同是地方利益小团体或者说是人为的行政割据。其次，区域协同必然是有重点有次要，用多数的牺牲换取少数的先富。再次，区域协同讲究的是行政驱动，往往导致人为的要素价格与市场的扭曲，造成资源错配。最后，互联网等新经济从根本上否定了区域协同。

谈镇：

第一是南京到南通沿江城市，第二是产业协调（布局，主导，支柱，积聚，集成），公共服务均等，要素流动无障碍；第三首先规划引领，率先打破户籍，选择生态、化工为协同突破口。

姜彩楼：

扬子江城市协同的落脚点应该在城市层面。首先要解决群内城市功能的定位和分工问题。基础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公共服务这些需要进行分工和规划，会发挥引导作用。在产业层面，要素流动应该更加自由，市场效率也应该更高，这应该是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

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产业体系和全球创新资源配置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长三角是我国

科技和产业最发达的区域，是承接全球产业和科技资源转移的前哨。目前，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符合国际大环境发展的需要，也是自身向更高端发展的需要。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要面向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需要，进行长远谋划。由于长期处于追赶状态，长三角城市群一方面大力引进传统产业资本，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大力培育新兴产业，产业体系中新旧产业的二元问题长期存在，如何协同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区域创新是实施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组织形式，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资源丰富，要聚合不同城市的优势创新资源，发挥协同创新优势，并转化为产业优势，形成推动长三角区域转型的新动能。

唐启国：

实现扬子江城市群协同发展需要树立共享理念，一是共享扬子江城市群区位和资源优势；二是共享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等设施；三是共享成本优势，协同发展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四是共享协同发展成果，实现共享，达到 1+1>2 的效果。

伊道科：

各地市找准自己的定位，提炼出自身的特色产业，根据定位和特色产业制订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根据各地的战略规划进行论证，论证通过后，可以协调各方面的资源，并明确路径和分工，最重要的是战略规划要上升到相应的高度，要有延续性，不能一任领导一个思路。

陈柳：

中国区域发展总体上是竞争机制。比方说，产业协同不可能要求一市做什么产业、另一市不做什么产业，所以，协同需要：（1）高一级的行政指导和管理，主要体现在对各区域之间交通的互联、民生社保互通、生态环保的治理、地方经济准入壁垒的降低。（2）高一级行政机构对各市的产业分工、定位宜粗不宜细，产业分工主要依靠市场形成。事实上，南京各个区之间对项目都在进行激烈争夺，何况各市之间，不可避免。

周小虎：

协同的核心可以放在共享经济下考虑，不仅是发展管理的协同布局，还要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解决共性技术，推进合作研发，实现开放创新都需要共享协同。共享在医疗领域已有成功实践，但在经济领域缺乏普遍的协调机制。

杜运苏：

扬子江城市群协同有两个建议：一是抓住长江经济带建设机遇，加快北沿江高铁和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城市群内部流动；二是可以选择一些产业推进协同，由点及面，

积累经验，比如江苏沿江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集群，目前有所进展，各个城市也有一定的差异化。

马步洋：

昨天参观 Airbus 在法国 Toulouse 的总装厂，现场目睹 A380 和 A350 组装的惊人效率，探寻其背后产业协同的成功因素：Airbus 充分发挥各国、各地原有产业分工优势，形成以主力航空飞行器产业平台为核心载体的协同配套体系，产业链分布各地，变竞争为合作、合众力以成就，成为高端制造业的成功典范，对整个欧盟区涵盖多国范围的广大区域的多个产业领域产生了协同联动、共聚合创效应，按照航空制造业远超汽车制造业的联动影响系数，其创新引领与经济支撑作用巨大。以此为例，除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等，城市群协同发展应落在关键产业选择、引领与培育之上，不应继续原有的城市间同质竞争为主的模式，改以合作协同为主旨，依据市场化原则进行分工选择，发挥各城市原有产业基础或技术优势，这将是这样的后进工业国在高端制造业追赶的路径之一，即以关键产业为载体发展城市群相互协同发展的可能途径。

陈建军：

都市圈的构成基础也应从四个方面考虑：经济发展、社会文化、时空距离、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的连续性、社会文化的连续性、时空距离的连续性和要素资源的互补性是都市圈的基础条件和内在动力。

（1）经济发展水平的连续性。一个成功的都市圈，需要共同的经济基础，都市圈内部各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性，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的类似，都是都市圈形成的经济基础，也是使得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分工、市场的整合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

（2）社会文化的连续性。都市圈的形成和运行不但需要共同的经济基础，而且需要共同的社会文化基础，即组成都市圈的各城市和地区的社会文化和传统习俗等应该具有高度的同一性或可融性，由此在都市圈内部形成绵密的社会网络。这种主要由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内生出来的社会文化网络，对促进都市圈的社会经济的一体化，以及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达成都市圈的和谐发展和共识决策有着关键的意义。

（3）时空距离的连续性。都市圈内部各城市和地区在空间上的互相邻接，是都市圈形成的空间基础条件，这种距离的连续性有助于降低都市圈内部信息、资源、要素和产品流动的成本，优化都市圈的空间结构，提升都市圈的整体竞争力，时空距离的连续性是一个动态因素，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助于优化这一条件。

（4）要素资源的互补性。据比较优势原理，只要在相关地区和城市间存在差异性，在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合作与竞争过程中就会形成分工，而分工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素资源的互补性，这种要素（指劳动力、资本和创新因素以及其他资源条件等）的互补性也是促进都市圈发展的基础条件。

如何“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

2016年11月4日

2016年10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此次政治局会议的“货币政策”部分只字未提“稳增长”，只强调了“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注重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江苏银监局披露，2016年6月末，江苏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达1255亿元，不良贷款率1.41%。此前，在2013年上半年，江苏省新增不良贷款排全国第一，规模达182亿元；2014年，据江苏省监管人士透露，煤炭、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这六大严重产能过剩行业，江苏占了四个，信贷结构亟待调整。

针对上述现状，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给出了本次线上讨论的议题：

“经济走势继续分化的情况下，如何坚定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并引导群内专家、学者们进行了讨论。本期的推文我们整理了来自政、企、学、研各界专家、学者的观点供大家交流。

观点

刘志彪：

我们要围绕去产能坚定地去杠杆，同时根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降低企业负债水平。僵尸企业绝大多数都是靠高信贷杠杆维持存在的，因此去产能就是去杠杆，去杠杆就是加速去产能，就是降低系统性、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应该看到，我国实体企业的杠杆率普遍比较高，融资难、融资贵是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实际问题。按照国际经验，系统地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最佳途径，是加速发展以公司债和股票为主的直接融资，尤其是债券融资。因为有抵押担保，债券融资对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完善性的要求远低于股票融资，是适合国情、风险较小且有待开发的直接融资方式。同时股市要立足于恢复市场融资功能，给实体经济去杠杆。为了使我国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逐步正常化，必须把对投资者权益的充分保护放到首要位置，否则股票融资在我国很难有好的前途。

(1) 地方政府总体上应该是去杠杆。杠杆率高以及杠杆结构的不合理，已经严重影响地方政府的边际投资能力，也是“稳增长”的主要障碍。未来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可率先试行去土地财政化、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资产证券化等改革措施。

(2) 中国企业负债率在全世界都属于较高水平的。原因不是中国企业借债多到什么程度，

而是我们的企业长期依赖于商业银行融资，缺少长期资本来源渠道。未来企业去杠杆，主要应该利用“十三五”期间国家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机遇，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建设长期资本来源的可靠机制。

(3) 江苏经济基本面好，发展质量高，资产质量上乘，同等杠杆率但投资安全性高一些，融资的硬约束也小一些，所以江苏对“好的杠杆”可多用一些。例如，同样面积的土地资产，在江苏可能要价值更高一些，流动性更强一些，因而资产安全度更高。

(4) 江苏重资产行业多，与服务业相比，杠杆率运用也会高一些。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江苏重资产行业应逐步向重人力、知识、技术资本行业调整，使产业结构尽快地软化。这一点在江苏可操作的空间大，只要把产业结构尽快软化一些，宏观上的杠杆率就会迅速的降低。

去杠杆主要是宏观上的一种政策取向。不妨摘录一段中央权威人士讲话：

“当前，确实存在一些‘两难’或‘多难’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一方面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高杠杆，如果急于克服下行压力，杠杆率就会进一步提高，怎么办？那就要具体分析问题的性质，看看哪个问题更是要害。我国劳动力总量逐年减少，产业结构在优化调整，即使经济出现较大幅度下行，社会就业也能保持总体稳定，何况我国经济也下行不到哪里去！所以中央一直强调不以增速论英雄。但是，杠杆问题就不一样了。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那就要命了。这么一比较，就知道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儿，就知道不能也没必要用加杠杆的办法硬推经济增长，‘两难’也就成了‘一难’。最危险的，是不切实际地追求‘两全其美’，盼着甘蔗两头甜，不敢果断做抉择。比如，一些国家曾长期实施刺激政策，积累了很大泡沫，结果在政策选择上，要么维持银根宽松任由物价飞涨，要么收紧银根使泡沫破裂，那才是真正的‘两难’。”

其含义非常明显，即加杠杆追求增长要不得！中国就业所要求的增长不会有太大问题，没有必要加杠杆硬推增长速度，这样会出金融危机风险！

总量去杠杆是大势，精准化结构去杠杆政府很难做到，但政府可以针对地方政府债务或者一部分僵尸国有企业采取行动。去杠杆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不能搞成去杠杆而去出金融危机来。

叶 蓁：

杠杆是现代经济大规模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利器，但不是一定带来风险，关键是看是否存在错配。一味强调宏观整体去杠杆是一种误区，要准确区分不同部门、区域特征下杠杆的作用，才能讨论是否存在杠杆过高或是否要去杠杆。

孙 军：

信用经济的崛起弱化了经济周期，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结构，引领了金融业的崛起和经济

的金融化、虚拟化。在全球经济仍然萎缩，低利率环境仍将持续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做的不仅是去杠杆，而是如何更有效地运用资金。

对于杠杆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是市场化的杠杆要通过市场化约束机制的建立去去，绝不应该由政府有形之手强行去；

二是对于国有企业的加杠杆行为，政府应该严格控制，全力去杠杆，并与国有企业改革相配合；

三是以商业银行信用创造为核心的各行为主体的去杠杆行为要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相匹配，债券市场可以适度加杠杆；

四是坚决抑制房地产等投机行为，推行股票市场注册制，强化监管，引导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五是建立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市场氛围，全方位的支持创新、创业活动，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产学研有效对接、落地；

六是不断加快资源配置机制市场化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放宽对医疗、教育、文化、养老等行业管制，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与量质提升，提高投资收益率，降低加杠杆的风险。

实际上去杠杆过程是复杂的，目前的政策及其实施过程存在着不少问题也是正常的，利用行政之手强制去杠杆问题诸多，需要使用堵、疏和改造相结合的方式。

产能过剩、库存过多全怪政府肯定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把责任全往政府身上推，想当年的资本主义危机，农场主将牛奶往河里倒，那也是生产过剩、收入分配不均造成的。当前，去全球化、经济萎缩带来的影响不可不察（这是所谓的周期性问题），这些要通过市场化约束手段去杠杆，不应强制；当然结构性问题同样突出，这部分就要通过行政手段和疏通相结合去杠杆。这其中实际上涉及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的问题。

我的一个看法是：通过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平衡掉通过商业银行信用创造所形成的畸形、扭曲且极其危险的债务模式，通过负债结构的再平衡最大可能地消除金融风险。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去杠杆。目前直接推PPP，由地方平台和民企直接做是非常合适的事情，一是提高投资效益，二是降低风险。主要是，如何激发民资的积极性。

沈志强：

（1）去杠杆对应的企业应是财务效益不佳、未来预期不好的企业。比如，僵尸企业、亏损企业等。

（2）去杠杆对应的企业应是资产负债率高、财务成本高企、融资成本与收益不匹配的企业。

从江苏的现状来看，债务率较高的是轻资产的建安类企业、重资产的是地方政府土地流转类政府平台等，制造业企业相对债务率不高。但由于建安类企业主要承担政府工程、房地产项目，政府平台背后有财政支持，所以日子还算好过。相反制造业企业在经济下行、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三角债、融资难等问题往往把企业拖跨了。

我觉得当下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

(1) 债转股。对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大的不能倒的企业，加快实施债转股，减轻企业财务成本负担，争取救活救好。如建行今年 100 亿元武钢债转股项目，50 亿元云锡债转股项目。

(2) 行政与市场手段两手用，破产兼并重组。经济下行期，好企业与坏企业可谓泥沙俱下，其实，一些企业基本面是不错的，可能只是临时的资金困难导致的经营危机，这些企业容易被社会资本盯上，愿意注资重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出现了 52 起私募基金参与国企增资的案例，其中 10 亿元以上的有 11 起。当然还有一些企业确实无可救药，我觉得这也符合经济规律，符合企业生命周期。对上述两类企业，基于中国国情，地方政府可出台相关政策，推一把、送一把。所谓推一把，对于社会资本参与地方实体企业重组的，可给予相关政策支持。所谓送一把，政府可以设立企业兼并重组引导基金，适当采取行政手段，协调债权人（主要是银行），加快企业破产兼并。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同时市场诚信体系不够完善，有时候有形的手、无形的手一起使用才能有效率。

(3) 去杠杆的目的是提升企业活力，进而提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非简单的去产能。发债等直接融资手段不能降低企业负债率，只有股权投资可以降低企业负债率。

关于地方政府平台杠杆，群里有不少专家认为是坏杠杆。我并不认同。作为建信信托在江苏的负责人，这三年我在江苏投了 200 亿，全部是地方政府平台。在当前经济下行期，我注意到有些私营、联营企业帐上趴着大量现金，但是却不敢或者不想去投资，这符合经济规律，无可厚非。只有政府平台企业，在经济异常困难的时候，坚定的在干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相较民企，国企几乎所有的利润用来再投资，你可以说国企效率不高，但它资金使用效率是最高的。大家都知道百分之八的个人占有百分之八十的财富，这些财富所有者消费、投资的有多少呢？只会逐步沉淀、沉没。

实际上，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在强调政府要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混合所有制、PPP 就是新制度体系的体现。

郑江淮：

尊重杠杆化的市场规律，针对竞争性领域去非市场化形式的高杠杆：

在中国目前产业技术基础下，企业提升竞争力主要是增加资本设备投资和进行更新的资本设备投资，在产业组织理论中是作为竞争战略的产能投资原理，是市场竞争使然。中国产业升级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进入到依赖于知识密集型劳动力对资本的替代。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也经常使用产能投资作为竞争手段。如今政府强调“去杠杆”，如果是针对市场竞争出现的过多产能，那么就找错对象了，真正的问题是企业在进行产能投资竞争不得不采取较多的银行融资。从这个意义上讲，“去杠杆”实际上应是“去间接融资杠杆”，加“直接融资杠杆”。目前，有些行业通过居民加杠杆来“去杠杆”，实际上又强化了“间接融资杠杆”，是大错特错的行为。从不同类型的企业来看，需要真正“去杠杆”的企业应是那些处于竞争领域的享有非市场化特权获得融资的高杠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

刘昊：

我的理解：（1）大力发行地方债券是加杠杆，除非硬约束地方政府或平台不能银行融资，或者严控融资规模，这样债券才能发挥市场约束机制。（2）真实的资产证券化可以出表，但如果地方政府仅作为融资的手段，还是无法真正去杠杆。

地方政府去杠杆，可以在盘活资产存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公用事业上找出路，债券市场融资还是企业负债，自身不能去杠杆，如果债券市场发展不规范，反而更会积聚风险，还是应该发展股权融资等直接投资，直接融资降低成本一般没有争议。

去杠杆应该和产业政策协调使用，比如去落后产能，房地产调控，而非干涉企业微观融资活动。

去杠杆是必要的，股权融资直接去杠杆，同时债券市场要规范，发挥市场约束机制，否则信贷市场、债券市场合在一起就是加杠杆了，这要和地方债务管理结合起来。

汪德华：

去杠杆降低金融风险，此次主要是讨论企业债务问题，我从事实和政策两个方面谈谈。

（1）媒体报道的中国企业债务率高，是指企业债务/GDP快速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而非杠杆率。就工业企业而言，过去十余年间杠杆率是下降的，仅有少数大国企杠杆率是上升的。我想其他类实体企业也有类似现象。

（2）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债务率高，主要的原因是分母增长的速度比不上分子，即资本产出比（ K/Y ）、债务产出比（ B/Y ）在快速上升，表明经济效率在下降。从这个角度看，去杠杆和去产能、打僵尸是一回事，都是要把低效企业市场出清。在中国行政推动的体制背景下，让人担心的是会不会被出清的不是低效企业，而是中效企业。

（3）由以上引申而来的，去杠杆并非就降低了金融风险，而是在去杠杆的同时要防止金融风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低效企业市场出清，是确认了过去错误投资造成的损失，损失必然要有人买单，这个过程处理不当可能带来金融风险。

（4）去杠杆另外一个关键点是抑制金融空转，抑虚加实。中国企业债务率高企，背后的典型事实还不清楚，但金融链条过长过虚应是重要原因。这本身风险很高，且无助于提升实体经济效率，应是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马健：

（1）对于市场化企业，民营企业、高技术企业，不是要“去杠杆”，相反是需要增杠杆。“民营企业”，包括优质民营企业、高科技企业，他们融资何其艰难，其杠杆往往来自于民间借贷，现在金融机构再对他们去杠杆，其融资就更为艰难了；

（2）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肯定要去杠杆。目前许多地方过度融资，债务率超300%以上，其财力根本无法偿还债务，只有借新还旧，这样去杠杆只能是变相转债；

(3) 国企确实杠杆高企，国企效率低、成本高，占用大量资源，但国企的问题绝非杠杆带来的，需要解决的是改变根本的体制问题；

(4) 不太同意行政化手段一刀切的“去杠杆”。金融机构从专业性角度，会对企业的杠杆问题进行评估决定给多大杠杆，这个事由行政化方式做，不然又会瞎打瞎抓。我不是说不要研究、指导企业如何利用杠杆去发展，而是不能以行政化手段一刀切、一窝蜂的去搞什么“去杠杆”。这里有一个身边的案例供各位师兄姊妹们去思考：

我所尊敬的一位师兄，曾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几年前带着产业报国的志向，在盱眙买了几十亩地投了1000多万发展精细化加工，以工匠精神辛辛苦苦耕耘，现在为止不仅一无所获，而且现在迫切希望上一个高科技新产品扭转局面，可所有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不提供融资，沦为去找民间借贷都无门。这样下去试问：

还有谁敢冒天下之不韪去搞实业，中国未来还有谁去做企业家，创新的动力从何而来？

张月友：

年初以来的中央去杠杆有两点感受，可能不准确：

(1) 五大任务中，去产能和去杠杆任务进度可能超前了。(2) 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去杠杆，引导民资进入房地产领域，调整债务结构，去库存，消化通胀压力和债务风险，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但也确实是取得了成效的。

邵 军：

去产能是去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去杠杆应从属于这类去产能。特殊的房地产在消费侧加杠杆去产能，是利用口号搞歪了，这也说明经济政策不能口号化。实体经济贷款难的问题很严重，不属于去杠杆范围。

代中强：

产能过剩因行政化起，去产能和去杠杆也是行政化手段干预企业生产经营和信贷市场，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政府之手，所以去产能和去杠杆是表面现象，其背后的本质是政府干预太多。

陈 柳：

去杠杆当务之急是明确去谁的杠杆？不是用“非金融部门杠杆率过高”一句话就能解决的，非金融部门里面涵盖的部门多了。

(1) 住户杠杆虽然在这轮房地产牛市中增加了不少，但总体不高。

(2) 民营企业虽然近年来杠杆过高出事的不少，尤其是一些突出行业，但是，一来民营企业的风险是逐步暴露的，这几年一直都在去杠杆的过程中；二来作为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放杠杆一直是以市场决定，不存在高低之说。

(3) 国有企业杠杆，这里主要的是指产能过剩、经营不善的企业，简单降低杠杆就意味着关门破产。这是应该去杠杆的领域，但是方式要仔细考量。

(4) 政府平台杠杆，这个不多说了，这是最应该去杠杆的部门。地方债务债转股不得，破产不得，只有想办法少借点。因此与其说去非金融部门的杠杆，不如说要去非市场化部门的杠杆，这才是关键。

杜运苏：

首先，要搞清楚各类企业和部门杠杆情况，现在金融信息化程度这么高，很多数据可以搜集到。其次，杠杆高低的标准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也是有差别，应该交给商业银行决定，他们更具专业性，要避免行政化“一刀切”。长期看，真正降低杠杆还在于直接融资市场建设。由于国内资本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如果去杠杆操之过激，肯定会影响实体经济，要吸取去产能经验教训。

刘根荣：

中国当下杠杆率出现上升趋势，要从居民、政府两个部门杠杆率提升的不同原因来分析。

(1) 政府部门杠杆率的提升主要原因在于反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应用过度导致。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一方面造成经济增速与政府财政收入放缓，另一方面，唯 GDP 增长思维依然在各级政府官员中盛行，各级地方政府为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惜通过各类政府融资平台取得信贷资金，大大提高了政府债务率。

(2) 从居民部门来看，经济下滑，国内外需求乏力，导致许多企业经营困难，依靠内源性资本解决企业资金需求的能力下降，再加上股市出现波折，股权融资变得困难，因此企业通过信贷融资的比例上升。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中一些国有企业更是依靠信贷资金苟延残喘。另外，楼市上升导致许多家庭购房产生的房贷，也是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的一个原因。

(3) 降低杠杆率要实施区别实施原则。对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要设定红线；而对居民部门要优化信贷资金的投向，实施谨慎信贷政策。对居民部门提供的信贷资金大都有资产抵押，除非这些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否则挺安全的，风险不大。而政府平台融资以预期的未来政府财政收入为保证，若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出现较长的失速窗口期，就很可能出现风险。因此，杠杆风险的管理重点应当是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管理，设置红线！

孙建波：

去杠杆和去产能一样，要市场化为主。去杠杆是为了化解风险，但不是要为风险兜底。因此，要让一些坏杠杆直接爆破，这也是一种去杠杆。我们目前很多讨论都把去杠杆暗设了一个前提：不爆破风险。这是错误的，是对正确理性经营者的不公平。所以，我个人强调，一定要让坏杠杆直接爆破，切不可为其兜底。

从“双顺差”到“一顺一逆”：我国国际收支变化的动因、影响与对策

2016年11月11日

编者按：2016年10月29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2016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就中国汇率机制改革和资本流动发表演讲，指出：

中国的收支平衡由过去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双顺差”转变为了现在的经济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的情况。

针对这一现状，结合当下国内资本外流现象，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给出了本次线上讨论的议题：“中国国际收支从过去的双顺差，到现在的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今后有没有可能演化为双逆差？这些变化与中国产业竞争力变化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政策究竟应该怎么办？”，并引导群内专家、学者们进行了讨论。

从双顺差到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的原因及其影响

刘志彪：

分析人民币贬值的原因和趋势，其实可以直接分析引起当今中国资本外流、资本项目逆差的原因。大概有这么几个角度：

一是发展阶段决定论：

认为对外投资增加、资本项目逆差与人均 GNP 水平呈现直接的关系；

二是比较资产的报酬率：

如果国内资产报酬率高于国外，资本项目就呈现为顺差，否则就是逆差；

三是人均收入上升后的消费水平决定，对国外商品、服务需求的增加，如国外的教育、旅游等需求直线上升；

四是资本套利决定，预期国内人民币升值，热钱便会大幅度流入，而预期贬值就会流出；

五是预期国内投资环境恶化、产业竞争力降低，外资流入减少，同时内资向海外转移增加；

六是资本出于种种原因发生外逃；

七是为了化解产能过剩，配合增加出口战略，有意识贬值本币，加速了资本外流；

八是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外流形成自我强化的预期效应，现阶段 60 万亿人民币储蓄，如果有 1/5 要换成美元流出去，我们一半以上的外汇储备就没有了。

其实，人民币现阶段不存在长期大幅度贬值的基础。一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降低了许多，但是在全球还是属于高速的，有回旋余地、有后劲，这是人民币不会大幅度贬值的基础；二是纳入 SDR 后，国外的中央银行需按其外汇储备的 10.92% 配置人民币资产，估计大约有 7-8 万亿人民币的需求；三是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逐步国际化，尤其是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可能有直接使用人民币的需求。这些因素都会抵制人民币贬值甚至可能推动其升值。

张建华：

资本外流的可能原因：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利润空间窄，不愿意再投；新兴产业充满不确定，多数资金不敢投；房地产投资受限；由于经济增长的前景不确定，也不进入股市。目前看，政府的精力主要集中于新兴产业，缺少对传统产业改造的政策支持。

刘建森：

资本外流的原因分析：1、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低迷，中国资本寻求兼并收购的扩张之路，如对欧洲企业的收购，这些动辄几亿欧元的收购，对于资本流出的影响较大。2、除收购兼并之外，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意愿强烈，在全球寻找具有价值投资的项目，如房地产、酒店等；3、中国经济降速，市场预期由强变弱，在华外资企业抽调资金转移到其他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尼等地；4、中产阶级的海外投资移民、海外旅游、海外采购（代购），也可为涓涓细流，可成江海。5、外资投资减速、外贸出口失速，外汇收入增长乏力，也凸显了资本外流的程度。

林乐芬：

一带一路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导致资本外流、资本项目逆差，是主要因素之一。

邵 军：

前些天考察一个企业，它在八十年代是乡镇企业，九十年代改制成民营企业，前几年几十亿卖给外资企业（行业老大）改外籍。一笔钱在瑞士托管，一部分以外资形式回老家再投资一个新企业，转型升级还换了籍。外资在撤资，民资变外资——中企并购外企钱出去了，外企并购中企钱也出去了。

孙 军：

经常项目顺差表明我国人民币并没有被明显高估太多，而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可能表明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经常项目在将来可能会转负，我国传统产业竞争力减弱，越南、印度等崛起明显，因此人民币有预期贬值倾向；二是虽然人民币没有被明显高估，但是房地产价格过高，租金房价比过低，弱化了资产的价值，而可投资的渠道并不多，导致资金外逃，寻求

稳定现金流、低价投资标的物（可参见李嘉诚）；三是大量产能过剩背景下，中国也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虽然其中夹杂着资本外逃，但不能否认这其中的必然性。

从产业层面看，进口项中我国竞争力低的行业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从出口项来看，虽然我国制造业提升水平相对较快，但仍处于低端，而且还有印度越南等国的竞争和产业外移。再加上人民币贬值预期，资本也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因此出现双逆差属于正常。但若反过来，低端产业竞争力一直存在或者消失的速度很慢，而制造业升级（像华为在发达国家德国发布 mate9，价格超高）和现代服务业持续提升的话，长期来看，经常项目顺差仍会持续。这其中的关键仍是改革和取消相关行业的进入壁垒。

宋凌炎：

我以制造业谈谈资本外流的原因：1、国内劳动力成本（工资 + 社保 + 劳动法工伤过分保护）与东南亚及非洲国家差别太大，很多企业工厂转移，转移的同时带动贸易转移，导致中国外贸出口下降；2、美国、欧洲国家多年前走的产业转出到落后国家，近几年发现制造业才是经济根本，因为制造业的人会带动服务业及消费（美国的官员说的），从 2015 年开始已经转变思维，变成加大力度招商引资，各种优惠政策，加上中国正在去产能化的推动，资金猛流出到国外投资；3、股票市场机制的不确定因素，机构对股市的投资恐慌心理；4、国家提倡设备智能化升级改造，有些地方的条款之前规定所有设备不许改造框死企业，逼着企业另寻出路。

刘晓昶：

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1、人民币贬值。（1）国内经济增速下降，人民币汇率相对美元出现贬值压力。自 2007 年 GDP 达到最高 14.4% 的增速以后出现逐步回落，目前 GDP 增速回落至 6.70%。（2）货币超发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2008 年底四万亿投资以后，货币一度超发，广义货币量 M2 同比增速最高达到 29.74%。截止 2016 年 9 月 M2 达到 151.636 万亿元，是 2008 年 11 月“四万亿”投资前 45.86 万亿元的 3.3 倍。与此同时，2016 年第三季度 GDP 则是 2008 年第四季度的 1.65 倍。货币量增长远远超过 GDP 增长。中国为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允许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人民币贬值背景下，理性投资者具有加大海外资产配置、进行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包括购买海外房产、海外企业收购、购买海外保险、基金、理财产品等。

2、国内投资环境发生变化。传统出口制造业通过参加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微薄的利润。但是投资环境逐步发生转变，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包括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隐性成本）、土地成本和房价不断提高、人民币持续升值等，对传统出口制造行业造成较大打击。从 2005 年 7 月-2008 年 7 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 8.1 附近逐步升值到 6.8 附近；2010 年 6 月-2014 年 1 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 6.8 附近逐步升值到 6.1 附近。这两个主要升值阶段，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在 20% 以上。如果考虑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的因素，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升值幅度更大。这对依靠微薄毛利生存的传统出口制造行业是较为沉重的打击。对于在

中国投资设厂的外资企业，考虑到上述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也有将工厂转移至东南亚寻求更低成本的必要。

王宇：

经常项目顺差，浅显的说，我认为就是一国出口资源、产品或者服务来换取外汇资本。经常项目逆差，就是自己拿钱去其他国家来买资源、产品和服务。我国早期的经常项目顺差，本质的原因是由于我国低端产业竞争力很强，通过加工贸易，赚取了大量的外汇来发展经济。但是伴随着我国的经济转型、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加之东南亚国家的竞争，低端产业的竞争力大不如前，同时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尚未形成，我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很有可能经常项目的顺差会持续下降，除非制造业的竞争力再一次上升，那也意味着我国的经济转型部分成功。

至于资本项目的逆差，其实有两种完全截然相反的解释：从好的一面来看，是由于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政府也鼓励企业进行向外投资，同时人民富裕了之后大量出国旅行也需要大量换汇。与此同时，趁着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危机，一些技术领先的优势产业中部分企业经营困苦，我国很多企业财大气粗，用资本来买技术也成为一种非常时髦的行为。我个人觉得能用钱买到的技术都是非常划算的，这种行为应该鼓励，而且这种窗口期的机会说实话也不多。如果由于这种原因带来的资本外流就应该淡定。但是从坏的一面来说，那就比较可怕了，由于经济发展前景悲观，很多企业家，尤其是民企选择资本外逃。因此如果是这种原因资本项目持续逆差扩大，就必然会危及我国整体的产业竞争力，很有可能会导致经常项目也出现逆差并持续扩大。但是我个人觉得好的方面可能不是主要原因，毕竟领先的技术不是那么容易买得到的，并且我国企业资本出海经验不足，还在持续的交学费，并且总体来看即使是出于企业的生产和研发布局选择海外投资，但是投资带来的好处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被本国获得，反而是大多外溢给了当地。

夏网生：

(1) 目前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对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有影响。更加鼓励出口和对外投资，甚至出口方面的政策力度更大，有一定程度的效果。

(2) FDI 的内涵近两年发生了较大变化。服务业投资比例已超过制造业，服务业投资一般轻资产多，根植性也差，相对制造业更易外逃！另外近两年出台引进总部经济，包括销售中心（开票中心）、研发机构的政策，也使引资规模下降，相对也比一般制造业更易转移。

所以引资政策的导向还应聚焦制造业的高端环节，引进脱离制造环节的生产服务业是不够稳定的！

方向阳：

就在两三年之前，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理由是中国对美经常项目（主要是货物贸易）顺

差过大，当时我们的主要说辞：

一是贸易统计数据有问题，特别是通过香港转口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以及与避税天堂贸易部分计算的问题；二是价值链上的地位问题，所谓的美国人带走了利润和税收，给中国留下了 GDP 和污染，特别是中国为促进出口，出口退税规模过大，代价沉重，而美国的消费者享受了好处；三是说美国搞技术封锁，我们想要的美国人不给。近几年，促进商品出口的政策面因素如汇率税率等变化不是太大，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到逆差的变化只能是国际市场的萎缩、中国进口的扩大以及服务贸易的逆差增加。

黄繁华：

从理论上讲，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是互补关系，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所折射的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总体格局的变化，所反映的是一国开始从商品输出向产能输出、资本输出的转换。这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规律。不过从我国具体实践看，近期出现的资本项目逆差，可能更主要与我国鼓励对外投资、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国内经济低迷、居民购汇用汇增多等因素直接有关；而经常项目顺差变化，也与目前世界经济格局、我国经济特征以及我国采取的特定贸易措施有关。换言之，我国近期出现的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并不完全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因此，我国一方面应看到其中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应根据经济发展基本规律，从中找出差距和问题，加快有关制度的完善和产业的发展。可以设想，若有关制度安排改进和有关产业发展一直不到位的话，出现国际收支的双逆差，也不是不可能的。比如：

当前因我国服务业改革和发展严重滞后，虽然实施了种种保护政策，但近年来服务贸易逆差依旧大幅上升，从而对经常项目顺差构成较大挑战；国内经济若持续低迷、投资市场不完善，势必也将扩大资本项目的逆差。当然，在国际上若一国国际收支严重恶化，政府往往会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和管制的。

吴福象：

经常项目顺差缩小，与出口收缩有关；资本项目逆差扩大，与对外投资和热钱加速流出有关。尤其是热钱流出方面，改革开放初，外资进入中国大陆，很多是借道，或是通过地下暗道进来的，官方统计口径数据远少于实际流入。当前逆向流动时，原本没统计到的热钱流出，势必会大大超过官方预期和监测值。

崔卫东：

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有两种类型：一是研发设计型，比如，服装和消费电子；二是先进装备型，比如化纤和半导体材料。提高研发设计型产业竞争力，需要大量进口高技术服务。提高高端装备型产业竞争力，需要大量进口先进生产线装备。这两种行为，都会反映到经常项目进口数据上。

张月友：

我认为有内生平衡机制：产业竞争力下降→预期人民币贬值→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资本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逆差→弥补国内技术短板→提升产业竞争力→预期人民币升值→资产外币化、负债本币化→资本项目顺差。

施康：

人民币的贬值实际上就是流动性对美元这个“Safe Asset”的追逐。在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和人民币贬值是同向，但从吸收流动性、规避风险的角度上，两者又是相互替换。这个替换度取决于资本管制和市场预期，是可以管理的。另外，在中国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看到实际汇率升值与经常项目顺差，那是因为贸易部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但不论是顺差还是逆差，其实都所谓，落脚点应该在产业竞争力。

闫浩：

2015年我国对外投资超过引进外资，资本项目出现逆差。外资进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反应中国（东亚）制造业成本优势在弱化。这也是德国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追求的目标。我国对外投资增加，一方面是输出过剩产能的需要，同时也是通过收购西方高科技企业，打破西方技术封锁的需要，这是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一。美国一直阻挠，德国现在也对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收购感到恐惧了，政府在踩刹车。

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鼓励在国内的投资。一方面，我国的服务业领域没有完全对外资开放；另一方面，国内的某些垄断产业没有完全对民资开放。这也是加速资本项目逆差的原因。

顺、逆差变化及其与中国产业竞争力变化的互动关系

刘志彪：

顺差、逆差是我们讨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宏观背景，对它不应有好坏判断。抽象地研究两个项目的顺差、逆差以及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也是没有意义的，需要结合中国特殊的情况才有价值。如：

过去双顺差，是因为吸收FDI进行低端的国际代工，一方面带来生产的低端制造环节，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和出口。

现在资本项目逆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吸收FDI环境的恶化，以及民企对未来国内发展前景不看好。虽然我们无法区别流出去的资本多少属于逃出的，但资本大幅度流出、外资流入减少，确实反映了国内投资回报率在降低，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及风险值得政策制定者深思。

龚晓峰：

过去的顺差不一定是好事，现在的逆差对于我国来说未必是坏事。过去的顺差是因为外资利用了我国的土地、劳动力等低成本的优势以及政策上的优惠，但我们并没有从中掌握核心技术以及控制全产业链，因此过去的顺差未必是一件好事。而现在，例如钢铁行业，现在我们缺的是钢铁深加工，这一块的下游很重要，需要延伸产业链、整合上下游、提高附加值、迈向中高端。用钢大户例如家电、船舶、核电等，都需要高层次的外资引进，尤其是高层次的技术和产品引进，而在转型升级、调结构的过程中，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是非常必要的，由此产生的逆差也未必是坏事。

孙国民：

经常项目及资本项目顺逆差变化与中国产业竞争力变化之间的关系：（1）从外贸出口情况看，占比高的主要是轻纺产品，反映的是我国该类产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和人口红利优势，是一种初级产品优势，而非科技竞争优势；其次是电话、手机等产品的出口，可视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后，出口产品的转型升级，这些产品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可视为中国产业获得了初步的人才红利，但这种人才红利模式依然伴随着中国式的组装模式而形成的，依然缺乏核心竞争力，与美国输入到中国乃至世界的苹果手机有很大差距，启示我国外贸经常项目要想扩大顺差，就必须为世界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

今后很重要的方面是中国企业的国际表现，即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特别是逆差到来的时候，我们的产业（企业）竞争力还没有形成，就可能会产生产业安全甚至经济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的外汇要用在哪里？（1）用于换取或者获得战略资源、战略技术和产业核心技术上，比如航空航天领域的核心—发动机、航母技术、先进的战机、战舰、潜艇、石油等。（2）用于海外并购获取先进技术、海外市场等，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3）基于国际关系、国际安全环境、国际战略稳定上的支出等。（4）用于改革国际金融秩序，比如改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成立亚投行等。（5）用于国际投资，包括实体产业投资、金融投资、基于外汇保值增值的债权投资等。（6）用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即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四大目标。

刘晓昶：

从最新发布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目前造成资本项目逆差两大最重要因素：

一是外汇储备下降，今年前三季度为减少 2992 亿美元；二是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今年前三季度为 780 亿美元。

我国目前经常项目虽然保持顺差，但是经常项目顺差的内涵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从出口企业获得外汇收入端来看（贷方），2005-2014 年的两次主要升值已经打击了众多出口企业，我国依靠商品贸易获得的外汇收入增长有限。而从外汇支出端来看（借方），我国主要进口商品

是大宗商品，按进口金额大小，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商品依次有：

原油(占进口金额比例7.30%)、农产品(7.20%)、铁矿石(3.58%)、初级形状塑料(2.62%)、未锻造铜(1.73%)、飞机(1.34%)、大豆等。其中原油、铁矿石、未锻造铜这些大宗商品进口比例合计为12.61%。在历史最高时期2011年末，这些大宗商品占进口金额比例合计曾达到19.84%。近年来上述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下跌幅度约50%)，节省了许多外汇支出。未来大宗商品价格一旦反转，则中国维持经常项目顺差的难度很大。简单测算，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747亿美元，假设大宗商品价格回归到前几年高位，则前三季度需要增加外汇支出1438亿美元，可以将目前经常账户顺差消解掉82%。

中国对原油、铜是刚需，对国际农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些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有另外的影响因素，比如美元走弱就会造成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等，甚至有些大宗商品价格是被操控的，这些都需要防范。农产品也需特别关注，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进口比例不断增大，从07年末的4.29%，现在已经逐步上升至7.20%，仅次于原油7.30%。农产品进口有进一步上升、成为第一进口商品的趋势，对经常项目账户是顺差还是逆差的影响很大。前面测算的三种大宗商品(原油、铁矿石、铜)价格反转将消解82%经常账户顺差的情况还未考虑农产品呢！我国有着几亿农民，农产品进口却正在逐步成为刚需，值得深思。近几年国际农产品价格较低，我国大规模进口农产品进行充分利用，对国内土地休养生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8亿耕地的红线需要坚持。

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端来看(贷方)，按出口金额大小，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商品依次有：

服装(占出口金额比例6.33%)、自动数据处理设备(5.13%)、无线电话(4.88%)、纺织纱线(4.80%)、电话机(3.40%)、农产品(2.89%)、集成电路(2.69%)、钢材(2.31%)、鞋类(2.30%)、家具(2.23%)等。服装、纺织纱线、鞋帽这三类商品依然是我国最主要的出口板块，这一板块出口金额在2014年达到最高3490.95亿美元，随后开始滑落，2016年前三季度是2063.87亿美元。这一板块占出口金额的比例逐年下滑，在2005年为17.59%，2016年前三季度是13.43%。与之相反，近年来无线电话、电话机、家具的出口比例则在稳步上升，从2005年为4.48%上升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10.50%。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有了明显变化。

对比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现，出口取得的外汇资金流入可能继续维持低速增长，但是进口方面，对于原油、铁矿石、铜等大宗商品的刚需，会使我国外汇支出的不确定性加大。如果出现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等情况，则我国经常项目中的商品贸易可能转为持平或者逆差。

对于经常项目的服务贸易方面，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项目服务贸易逆差183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

旅行逆差1684亿美元、运输逆差292亿美元、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173亿美元、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逆差60亿美元等。旅行逆差、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等短期内很难扭转，未来几年这些服务贸易逆差可能继续存在。通过上述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明细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常项目中商品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虽然经常项目总体保持顺差，但经常项目中的细项内涵

已经发生变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有可能使我国的经常项目转为持平甚或逆差。

核心强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逆差的前提是，要么该国家底厚实、储备资产多（含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特别提款权等），要么其他国家愿意接受其作为全球货币，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目标。一个国家如果家底不厚、又不是全球货币，很难做到持续的双逆差。

史先诚：

个人判断：

商品贸易也会逆差。刘晓昶已经详细的进行了分析，我再补充一点：

以农产品进口看，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存在档次质量差异，除正常进口奶粉、牛羊肉、橄榄油、水果等农产品外，还有大量走私品。因对境内食品质量的担心，中高收入阶层的替代品进口和多元化消费进口会增长迅速。

一带一路鼓励走出去、避险流出、高收入阶层和企业家转移等，使得资本项目流出增加。同时，FDI 投资吸引力下降（流出返程的不算），逆差管理估计会成为常态，这对以技术创新为方向的产业政策实质并无影响，难点应在宏观国际调控。

张慕瀚：

谈一点思路：

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关系理论上一直被认为是互补的，但中国经济改革背景下的加工贸易 + 制度红利带来的资本投资率上升打破了传统关系，造成双顺差。资本流入的目标是获得远期利润和利息收益，在它流入很多的时候必然挤占国内资金对于优质项目的机会，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转型？现在由于各种原因（同意刘晓昶的看法）导致资本流出，而经常项目顺差依旧，如果资本项目逆差是由于进口设备变多，那未来肯定有利于产业转型，说明我们可以摆脱加工贸易为纲了。但刘晓昶的分析数据表明资本外逃是主因，而出口大户依然是那几个行业。这是否说明我们的产业链向高端迈进并未达到效果？只是因为出口份额实在太大目前东南亚等地并未形成有效抗衡。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持续下去，资本外流后国内资本既找不到优质标的（资产荒），又出于各种考虑将资金兑换成美元输出，那么国内的产业升级还怎么完成呢？等其他地区完全取代了中国的制造业地位，再加上资产荒继续蔓延，预计下一步就是双逆差。

我觉得还需要对出口进口的结构、资本流入流出的结构、经常项目净额和资本项目净额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关系做数据分析。关于资本流出，现在确实各行业都在并购国外技术或企业，占比和外逃相比有多少？也是关键。如果逆差是来源于并购和进口设备，那就是产业竞争力提高的前奏啊！结论就完全相反了。

刘根荣：

中国由双顺差演变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之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有历史性的标志意义，它表明中国正经历强劲的对外投资，中国正成为资本输出的主要国家。纵观美日发达经济体不也同样有过这样的发展历程？所以，窃以为，资本项目逆差并非外资悄悄撤离的悲剧，而是中国向外资本扩张的信号！

当中国成为一个比美国更大的消费型国家时，中国国际贸易必然也将出现逆差。资本项目逆差先于经常项目逆差出现，这种时序是正常的、健康的，也是必然的。中国既要成为资本输出大国，又要成为内需驱动型的消费大国，在不远的未来，出现双逆差的现象也不足惊讶！

鲁明泓：

	进口	直接	进口	直接	进口
产业演化阶段	贸易逆差	外资流入	贸易顺差	外资投资	贸易逆差
本国货币	贬值	渐升	升值	渐贬	贬值
本产业投资收益率	很低	转高	很高	转低	很低
国际间接投资	无	进入	大量进入	退出	无

上图是在产业演化的不同阶段，本币、本国产业、国际间接投资的情况。

上面的简图基于如下假设：

某国只有一种产业，该产业的企业已经证券化（已经上市，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可以购买其股票）。该产业的投资收益率决定了国际间接投资的流向。本币的升贬也影响国际间接投资的流向。中国目前处于贸易顺差和对外投资阶段。

上述简图没有考虑本币升贬、产业投资收益率、国际间接投资对产业演化的影响，也没有考虑这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产业处于领先地位，即位于对外投资和进口产品阶段，整个国家就可能出现双逆差。现在的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就是例子。对这些国家而言，它们最需要的是发展新的产业，重走一遍上述过程，会有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来冲抵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出。如果它们长期（不是短期）不能发展出新的产业，就会落入“高收入陷阱”（借鉴中等收入陷阱，我杜撰的一个名词）。意大利、法国、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中国香港等都是例子。韩国、台湾地区等都有可能。

总的来说，产业的演化过程导致了贸易顺（逆）差和资本顺（逆）差。双逆差是领先产业

国家的一种自然状态，甚至是最发达国家的状态。但是，长期不能做到产业创新和升级，以及产生新的产业，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例如英国）都会落入高收入陷阱。因此，产业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和根本所在。

陈建军：

有关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双逆差的事情，我想应该不是大概率事件。中国的外向经济发展，就其内在逻辑来讲，实际上是个大号的日本模式或东亚模式——即通过加入国际产业链，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增长。在国际分工链中中国基本上被定位于制造环节，中国通过大量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和发达国家之间建立了产业分工关系和贸易关系，实现贸易顺差是这种模式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趋近发达国家，中国也像当年的日本那样，从资本进口国转化为资本出口国，从双顺差走向单顺差，只要人民币不是基轴货币，中国依然在国际分工链中的制造业环节中占有优势地位，那么实现贸易的顺差应该不是问题。就像现在的日本，尽管日元一再升值，也没有影响日本的贸易顺差地位，除非发生产业升级的重大挫折，即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可控制的状况，使得我们的制造业向中高端的升级成为不可能、在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优势又被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所替代、在现代服务业领域也没有形成国际竞争优势，但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出现不会是大概率的，一国经济的前景，在无重大历史转折事件出现的情况下，作趋势外推的判断是科学的，尽管我们有很多问题，但实际上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不容易，中国三十年来发展历史使得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今后会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突然遭受重大挫折。

王洪亮：

个人认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应该相对于双顺差是一种更好的状态。经常项目顺差反应出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资本项目逆差可能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外资净流入下降、以及我们一带一路的外向型投资有关。当然如果资本项目逆差过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就会增加。

冉玉红：

中国国际收支从过去的双顺差，到现在的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我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口红利还没有消失（非洲人不但文化低而且懒惰，我们周边的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国相对中国开放较晚，欧美靠创先和科技领先，我们中国人勤劳没有反抗精神，所以存在人口红利），于是能提供成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纺织类等低附加值产品），大量工程类低劳务输出，以及稀缺的铁矿石等稀缺资源。另外：

由于我国税负较重，以及房价奇高等因素，造成国内实体经济越来越差，靠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将逐步减弱，货币不断超发，因此，资本需要保值增值，却没有合适的投向，许多不确定

因素也使得我国大量资本寻求海外投资增值的需要，加上美元升值的预期，以及腐败资金避险等因素，导致资本项目逆差。我认为将来完全有可能演化为双逆差！

叶 蓁：

现在的 OFDI 已经超 FDI 了，从国际历史比较看，这个过程应该是竞争力比较好的时期，如八十年代日本向东南亚的产业转移。那个时期，美、日的对外投资（产业转移）大部分是基于比较优势的。现在我们的 OFDI 是否是基于比较优势，不好说，倒是可以看到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国企），帮别的国家补短板。过去我们承接别人的转移，缺乏产业技术优势方面的积累，倒是积累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现在 OFDI 出去的和当年日本他们的 OFDI 结构可能出现明显的不一致，从这个角度可以观察刘老师说的资本逆差和竞争力关系，个人愚见。

应对策略

孙国民：

经常项目顺差有贸易的支撑，监管起来相对难度要小，看是否存在真实贸易等。资本项目就要复杂多，监管难度也大。目前，我国用中低附加值的产品换取国家经济实力提升的战略机遇期，并通过巨额的外汇储备逐渐升级技术，同时也通过市场换技术这样的战略，来提升产业竞争力，取得一定成效，但目前仅仅获得了国际价值链中的中低端收益，经济体量大而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因此可以从创新入手获得外贸顺差套利，即外贸产品的创新套利。

美国的经常项目老是逆差，美国人经常拿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说事。事实上美元的国际化地位，使得美国不需要通过贸易顺差来获利或者维持发展，而需要在资本项目上有所作为。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跨国公司多，企业具有世界级的竞争力，在世界各国挣钱并不断滚动投资获利，获利以后又伺机流回本国或者他国。（2）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可以通过发行货币获取铸币税的形式获利，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做到的国家，也是中国进入 SDR 以后的终极目标，但目前难以实现，最终还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表现，这种表现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保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发展，估计 5% 的增速至少要维持 10-20 年以上，人民币国际化红利才会逐步显现出来。（3）美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化，比如美元加息会恶化我国资本项目。同时，美国的货币政策也会影响国际汇率，进而影响到我国的外汇储备。（4）美国金融投资行业发达，投资机构众多，国际投行更是了得，投资大亨对世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可以搞垮一个中等体量的经济体。

对照美国资本项目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就清楚了：

一是要通过走出去兼并收购，通过市场竞争构建一批中国国家队级别的跨公司。

二是依托“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

个国际化过程中，切莫完全放开资本项目实现自由兑换，需要管控有度、有力。

三是逐步扩大中国货币政策的世界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同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有关，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进程有关。乐观估计，中国要逐步形成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影响世界的货币金融政策。

四是发展中国的金融投资业，特别是要建立世界级的投行、机构投资者等，要在世界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等有所作为。

孙 军：

长期来看，中国转型升级主要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德日，前者表现为以强大军事为先导，以美元独大为支撑，以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现代化的服务业为基础，表现为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由于中国低端制造业竞争力太强，导致经常项目逆差持续扩大。美国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优势不足以弥补货物贸易的逆差，但美元的强大保证了游戏的顺利进行；后者的典型表现就是制造业立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获取竞争优势，持续贸易顺差，但其货币不足以成为结算货币。

中国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首先，制造业是中国的基础，也是下一步中国能够有强大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能够形成贸易顺差。其次，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鼓励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直接投资，让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

总结而言：

一是要努力驱动制造业升级；二是做强现代服务业，逐步放开对于各类服务业的管制，吸引资本流入，通过这两者提升贸易顺差水平和质量、降低服务业逆差；三是逐步让人民币沿一带一路走出去成为国际结算货币，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推动市场化，其中一个锚，短期应反向盯住房价走势，不能仅盯住货币篮子；四是要大力发展以股票、债券市场为主的资本市场，推进注册制，推动创新。

宋凌炎：

我认为去产能要适度，毕竟中国制造在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迅猛发展时期起到了一定作用，智能制造是目标，但是需要一定时期的过程，就目前中国而言，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很希望中国制造转移去投资，就国内而言，贫困地区还很多，贫困地区也很羡慕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因此可以让一些产业转移到国内欠发达地区。

刘晓昶：

如果出现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双逆差，对外汇储备的消耗将是快速而巨大的，也是我们国家所不能容忍的。未雨绸缪，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应对：

1、人民币汇率问题。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经过1年多的贬值，目前美元

兑人民币汇率在 6.75 附近，大家对于未来人民币汇率是继续干预还是放任自由浮动的问题，争议很大。个人认为，在保持充足外汇储备的前提下，可继续坚持人民币目前盯住一篮子货币的策略，在异常大幅波动时适度干预，保持稳定或相对有利的汇率环境。

2、加快新出口产业竞争力的培育与支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在商品贸易方面继续争取外汇流入。对进口和进口替代产业进行梳理，降低不必要的进口，提高进口替代产业的快速补缺能力。通过进出口两方面的努力，保持商品贸易的顺差格局。

3、资本和金融账户，一方面，管理层可通过“窗口指导”等方式进行隐形资本管制，对进出口企业结汇情况加大申报检查力度，打击地下钱庄等堵住资本外流漏洞。另一方面，继续鼓励放开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金融证券投资，引导国际资金有序流入。

4、国际投资资金的流动，需要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化、利率变化及中外货币利差。减缓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归根结底需要中国经济实质性增长、国力增强、投资环境改善，可在这些方向做出种种努力。

5、利率方面，考虑到欧洲等复苏进展缓慢、美国竞选增加了不确定性，美国的 12 月加息有可能放慢，美元也短期走弱。考虑到目前我国 M2 基数已经很大，但经济增长需要适度货币，我国的货币政策可以坚持中性原则，利率以偏软为佳。

6、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是人民币立足国际的基础，不容有失。人民币在加入 SDR 后，国际化进程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此时此刻，人民币国际化不必急于求成。做实人民币基础，稳扎稳打，选择恰当时机（经济实力上升期）进一步推广人民币是未来较为明智的做法。

谈 镇：

资本外流有资本输出的必然性，但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预期比较悲观，市场化改革推进缓慢，垄断领域开放滞后，制造业实体经济不景气，私有财产安全感等；（2）人民币贬值，美联储加息，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长期低迷；（3）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开放不够，教育、卫生、生态和民主化等引发智力外流和资本外流。

双顺差变为一顺一逆，原因在于外资撤出和收益汇出，以及国内企业和居民全球资产配置，使得资本项目由顺转逆。如果不改善营商环境、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不排除国际收支进一步演化为双逆差。这些变化与我国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创新竞争优势薄弱密切相关，也与人民币汇率和国内通胀预期相关。在政策应对上，一要降成本，二要优环境，三要换动力，四要活汇率，五要稳货币。

吴皆宜：

资本外逃并不是无迹可寻的。资本外逃者一般都是富有的权贵者，由于资金来源不明或税负原因，唯有想方设法通过非正统渠道把资金转移到境外。他们可以通过地下钱庄，或是由海陆空运出现金，前者属于金融监管，后者是关口管制的问题。这是出逃前的第一关卡。第二是

外逃资金必须有一个国外能接纳或转换的资金池，才能完成资本外逃的程序。实际上，可直接定性此类资金池的行为是替外逃资金洗黑钱。一般这类国家都会大力反驳他们的行为并非洗黑钱。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该国在新加坡的外逃资金数量达几百亿美金。在2006年，曾经有位经济学家在其公司以内部电邮诉说新加坡是个洗黑钱的国家。不久，此经济学家就卷铺盖走人。到了2015年初，印度尼西亚总统在国会公开提出给予税收特赦令好让该国资金外逃者在规定时间内把资金汇回印度尼西亚。至此，新加坡接纳非法资金的金融地位也不攻自破了。企业高税负的调整，才是阻止资本外逃又能增加税收的最佳方法。从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企业高税负是促使企业尽量把利润外逃的诱因。高税负让企业不愿如实呈报公司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引入了贪腐因子。降低税负，建立标准会计准则如企业消费使用上限等计算方式与严格审计制度是阻止资本外逃的长期做法。经验了解，在高税负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资本外逃现象。只有在降低高税负前提下，同时建立健全的会计和审计制度和严格的会计与审计专业资格考核，以及对专业人士和税务人员的惩罚制度才能大幅度的阻止资本外逃。国家应该全力培养上述人才。实际上，任何对外投资项目都存在资本外逃因子。有些更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因为国家缺乏跨国审计与税务专业人才来审核这类对外投资项目。

杜运芬：

中国很多中低端产业竞争力确实在下降，而且逆转很难，经常项目顺差虽然已持续一段时间，但压力会越来越大。因此，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更多要在资本与金融账户做文章。除了打击非法资本外逃，我还有以下几个看法：

(1) 调整“走出去”战略，跨国并购主要注重战略性技术，一般的并购要减少；(2) 资本外流反映的是内外形势的变化，要减少国内企业产业转移，关键还是切实降低企业税费；(3) 加入SDR后资本流动会有新情况，境外人民币达到一定量的时候，离岸汇率波动会更大。

沈凯玲：

我国经济的一个特点是体量大，地区发展不平衡。这意味着我国的对外贸易不可能仅仅针对发达经济体，在资本技术密集的高端产品上与发达经济体竞争（这时我们的优势是劳动力成本，劣势是资本密集型技术），也需要针对发展经济体，在适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上有所作为（这时候我们的优势是适用这个市场的技术，而不是劳动力成本）。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大国，我们的策略必然与小经济体不同。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见底？

2016年11月17日

2016年11月3日发布的10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录得51.2，比上月回升1.1，为两年来最大增速，且已经连续四个月录得正增长；同时，10月统计局制造业PMI为51.2，比上月上升0.8个百分点，与财新PMI表现高度一致，制造业似乎明显回暖。

针对这一现象，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指出：“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见底是当下的热点议题。一种观点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划出了一个很好的L型增长轨迹，现在PPI转正，CPI也进入2时代，见底迹象明显；另一种观点认为，短期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经济见底还言之尚早。”群内专家、学者们也就目前国内经济走势进行预测、判断，并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观点

刘志彪（长江产经研究院）：

我对经济形势的主要看法是：经济L型的总体形状已经走出来了，但是L的底在稳增长政策的刺激之后，在四季度后略微翘了一下，之后仍然有继续寻底筑底的趋势。现在：（1）产业下游的房地产、汽车消费等处于高位回落态势；（2）产业链的中游，如发电耗煤量、螺纹钢、水泥、化工原材料、工程机械销量大幅度上升，其价格连续上涨，资本市场对这些产品价格上涨已经有了充分的反映；（3）上游产业，受川普基建计划和中国需求回升的影响，大宗商品尤其是有色金属中的铜、铝、钼、锌的价格大涨，但是美元指数的走强却导致布伦特原油价格下降。

我分析，产业链上游的价格上涨，与前期（10月初房地产调控之前的）的稳增长政策发力有关，基建投资的高增长，带来了对中上游产业链的刺激；但是近期下游的房地产、汽车等销售高位回落的风险，因为传递的时间滞后效应，并没有对目前的中上游产业链产生实质性的压力。因此，今年前三个季度经济的短暂微型复苏，PPI、PMI、CPI虽然有回升趋势，但是随着中央政治局的基调从稳增长转向抑制资产泡沫，以及必然出现的房地产、汽车销量下降，我国经济增长率在明年初中期可能会有所降低，一些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会有所回落，但是物价可能仍然会呈惯性上冲。

因此，我判断，如果经济政策仍然延续抑制资产泡沫、控制社会融资总额和信贷投放，明年的经济将会出现轻度的滞胀格局，即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加上轻度的价格上升。

建议：（1）去产能要有度，这个度就是遵循市场原则，不能下行政指标人为造成价格上涨；（2）做好农产品供应尤其是生猪供应的调控，防止 CPI 明年迅速回升；（3）适当加大稳增长力度，如中国中等以上城市的机场建设力度，特大城市可以建设 2-3 个机场。

伊道科（企业家创新俱乐部）：

我认为，经济并没有实质性的好转。本轮 CPI 和 PPI 指数上涨主要是因为前阶段房地产价格上涨带动，也凸显出投资的窘境，先是房地产，再到中游的大宗商品，尤其是钢材、煤炭，最近涨势凶猛，主要还是资本在炒作。个人判断，如果政府再对大宗商品实施打压、下一轮资本的目标就是股市。所以，实体经济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指数出现回升，必然是资本泡沫引起。

其实，我是做工程的，今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因为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到处在建地铁、高铁、机场，比 08 年的规模还要大，加上上半年房地产投资火热，必然带来生产资料的需求加大，所以，本轮指数上涨还是需求扩大造成。

经济增长的动能还是停留在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只不过三驾马车变成了两驾，新的动能并没有形成，至少今年还看不出来。

易行健（广外金融学院）：

我个人觉得潜在增长率下行还没有见底，经济周期应该在筑底过程中。但是到底是底部的左边还是右边或者就刚好是底部这个需要更详尽的数据分析。

刘东皇（江苏理工学院）：

基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层面，我认为，近年来投资和出口等传统增长动力乏力，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现在不足七个点，但随着新动力成长，寻求企稳迹象明显。

（1）近年来居民消费需求快速成长，无论从居民消费能力、消费倾向、还是消费环境等方面都得到反映，消费成长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内生能力。

（2）现在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尽管其作用趋于下降，但基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改善民生问题的相关设施投资大有可为。

（3）近年来中国制造出口受阻，中国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着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此外，美国大选后川普可能的战略收缩也将有助于中国以更积极心态推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步伐，中国外贸的内外部因素将趋于改善。

刘建森（徐工集团）：

我同意刘老师的看法：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回升，也许还需要震荡整理一年，但是整体向好。挖掘机是最具代表性的生产工具，是与固定资产投资紧密相关的生产工具，可以把挖掘机的销

量作为观察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参考指标。今年以挖掘机为代表的工程机械行业表现出复苏，8、9两月单月销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44.9%、71.4%，1-9月累计销量同比增长12.8%，10月销量仍旧维持高增长。工程机械今年回暖趋势已基本确定，主要原因有四点：下游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去年销量低基数效应、去库存取得效果、国三标准强制实施。其中判断行业回暖的关键在于下游固定资产投资。当然，由于受施工工序的影响，起重机、混凝土机械等其他工程机械的需求与挖掘机相比具有一定滞后性。

另外，我感觉消费是增长的：1、连锁型酒店（如家、锦江之星）的价格在过去三年间已经接近翻番，而且在北京入住率极高；2、中国纺织行业，尤其是衣服鞋帽行业是增长的，价格已经高出欧美品牌在欧美的售价；3、雾霾也挡不住旅游的脚步；4、茅台酒为代表的高档酒销售已经企稳；5、教育、医疗、住房消费更不用说了。因此，感觉中国经济中的消费是增长的。

经济企稳还有一个因素：企业家、政府官员心态逐渐稳定！

何雨（江苏省社科院）：

我的看法是，增长可能在当前水平进入僵持期，波动性大幅收窄，但平静表面下暗流涌动，调结构让中国产业从价值链低端进入中端、甚至高端。理由：1. 消费动能非常健康；2. 进出口难以变得更糟；3. 投资速度与规模可控；4. 迈向中端的动能还是有大量信号显现；5. 美帝加码基建，效果可能类似于08年中国之举，中国应该从中受益；6. 去产能紧迫性有所下降，可以控制节奏，不至于对动能损害过大。

个人倾向于，现阶段不是筑底，而是筑顶，是下一阶段的顶部。现在希望能拉长筑顶时间，维持当前增速5-10年。

速度暂时维稳，但周期恐怕并非底部。英美及西欧政坛巨震，恐怕是其旧经济遭遇瓶颈，要向新经济模式切换的信号。毕竟，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又一定程度滞后于经济基础。巨震，或许才刚刚拉开新周期的帷幕。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经济增长是否见底，我认为，1. 如果是指GDP增长率见底，即中央设定的6.5%，那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如能持续几年就是“筑底”。

2. 如果是传统发展模式的终结，经济转型的成功，那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是去产能等基本完成，二是经济增长不再依赖房地产和投资。

3. 如果认真搞“三去一降一补”，底部就没到，即便是底部，也只能说是阶段性底部。就像股市，熊市不言底，所谓底部往往是走出底部以后回头看才发现的。

赵顺群（丹阳市发改经信委）：

经济是否回升提供一点我的思考和丹阳的数据（可能比较微观）。

1、固定资产抵扣可以较好衡量固定资产投资。丹阳今年 1~9 月固定资产抵扣增长 10.5%，说明企业设备投资增加，企业转型加快、投资欲望增强；

2、今年 1~9 月工业应税销售同比增长 8%，去除 2015 年负增长导致的低基数因素，超过 2014 年同期，并创同期历史新高；

3、今年 1~9 月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7.68%，超过 2014 年同期 0.8 亿千瓦时，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时，工业用电幅度增幅小于工业应税销售增幅，说明经济增长的结构也得到优化。我觉得，从丹阳来看，经济已经处于明显的回升期。

施康（香港中文大学）：

我觉得经济有好转，但是否见底难说。毕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构变化，政治的不确定性依旧在，投资信心缺乏，另外外部需求也不乐观。从国家层面，依旧看不到非常令人振奋、鼓舞人心的重大政策出台，实体经济依旧在挣扎。即使在非常有活力的温州，大多数企业还在底部，在挣扎。

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 10 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 214.60 亿美元，环比下降 5.73%，同比下降 9.28%。其中，纺织品（包括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额为 85.98 亿美元，同比下降 6.64%；服装（包括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额为 128.6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96%。

因此我感觉是短期企稳而已，见底不能说。而且这个企稳，很大程度上是地产的拉动，现在地产降温了，有可能老问题又出来了。你看汇率、股市等前瞻性指标并没有明显起色。明年走势如何，还是看政策取向，当前看，结构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消费上。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从经济（我理解为财富的创造）的几大决定因素的趋势看：劳动生产率（稳定或缓慢上升），实体经济资本投入（负面），技术进步（偏正面），制度整合力（包括：生产关系最重要的是收入分配状况，负面；政策面，积极；所有制主要是国有企业，低效率；反腐造成政府不作为；外部环境，负面；以及不确定因素等）。所以综合来看，经济将会继续下行（模糊的主观判断）。

毛丰付（浙江工商大学）：

从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看，无论是国际环境、突破性技术变革还是国内人口数量和结构、重大制度性改革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某些因素，比如人口，还有持续走差的趋势，所以长期阶梯型下降的可能性大于 L 型。那么本轮指标反弹是下跌中继、刺激政策累积效应的可能性更大。

田志刚（南京财经大学）：

春江水暖鸭先知，经济状况一定程度上与企业的市场活力有关，结合最近调研的几十家企业情况，汇报几点微观感受：

1. 战略新型类企业的销售收入企稳，并呈现增长趋势，传统企业（如纺织服装业）还处于发展中的困境；

2. 创新升级、技术改造与做大规模相比较，企业认为创新升级最重要，做大规模排在最后，未来经济动力还是在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

3. 企业认为经济（企业）发展的桎梏反而来源于国家规范性政策，加大了企业运行成本，如针对医疗企业产品的多重审批制度，劳动法中工资及社会保险的约束等等。

总体而言，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发展向好，依赖型的企业还在困境中徘徊。税费过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成本过大、多重审批制度影响了企业复苏与经济发展。

黄敦平（安徽财经大学）：

谈谈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成功经济体经济发展收敛的规律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仍未见底。例如日本经历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再到低速三个阶段，1950—1972年为高速增长阶段，增速为9.3%；1973—1990年转为中高速阶段，增速为3.7%，下降幅度较大；1991—2012年增速为1%。此外还有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经历前两个阶段，其中，韩国也由1961—1996年期间8.02%降到1997—2012年间的4.07%；中国台湾地区也由1952—1994年间8.62%下降到1995—2013年间4.15%。可以看出这三个经济体在由高速降为中高速增长阶段时，增速都减半或更低。

当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阶段1978—2013年间年均增速为9.8%，按照此规律，在中高速阶段，增速将减半甚至更低，所以本人认为当前增速6.7%仍未见底，不远的将来仍将会持续下滑。但国家制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央将在十三五期间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保速6.5%。

综上所述，本人的观点为按照其它成功经济体发展规律来看，中国当前经济增速仍未见底，在不远的将来仍会下降，但为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增速将保持6.5%左右。

杨锐（苏州大学）：

经济增长的走势判断不了，但是企业对自己的经营状况应该是有信心的。粗糙的理由是，从2015年—2016年，32个主要城市秋季求职平均工资的增长率看，平均增长率15.6%，增长率最高的是厦门达27.19%，最低的是长春为5.3%。

鲁明泓（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

预测经济要看先行指标，如 PMI 指数、股票价格、物价指数、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等。大多数先行指标（包括含多项分指标的 PMI 指数）从 8 月开始持续好转，一些基础型的同步指标（如发电量、铁路运输货运量等）等也改善了 2-3 个月。这些都表明，经济显示出某些企稳、筑底的迹象。

但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先行指标还是持平甚至恶化。一个是 M2，近几个月一直保持在 11.6%，持平尚可；另一个是，银行贷款增加数，10 月大幅下降，原因是 10 月初的房地产降温新政；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是新房开工数，目前手头没有数据，但是 10 月的新政可能导致开工大幅下降。

经济企稳的健康力量是否会被 10 月房产刹车扼杀呢？可能要再看 2-3 个月。对呵护经济企稳的健康力量，有几点建议：

- （1）保持 M2 的平稳供给；
- （2）在执行中适度放松对贷款的限制；
- （3）督促那些刚刚拿地的企业尽快开工。如果政策拿捏得当，那么经济的底部就在当下；如果 10 月的刹车行动过火，经济很可能继续下行。

孙国民（南大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

（1）短期趋势判断：从三季度以来的主要经济指标（如投资、消费、出口、财政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产值、销售收入、利润额、新产品产值）、先行指标（工业用电量、企业家信心指数、经营景气指数、物流业景气指数等）等来研判，三季度的指标比一二季度要好，这样的短期趋势可初步判断为中国经济总体有趋稳缓升的迹象，但筑底企稳的动力不强，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严峻性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经济下行压力依然严峻。

（2）从长期趋势判断：中国经济经历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加上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整体步入下降通道，中国经济很难独善其身，也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外宏观经济背景下，中央核心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其中之一的涵义就包括“经济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发展”。综合目前的内外经济形势，中国经济保持在 7% 左右的增幅依然具有比较大的难度，未来中国经济在推进改革、释放经济红利、培育新动能、发展新业态的同时，具有一定的保增长的诉求，即通过延长经济较快增长的时间，争取改革、发展的主动，从而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为中国的全面崛起赢得必要的战略机遇期。因此，从长周期来看，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速有可能是相对较快的增速，未来超越该增速的空间不大，预计有 0.5 个百分点左右的提升就已相当不错，而具有这样的增幅必须是外需得到较好的改善，或者内需的动力有较大的增强。

（3）对明年的情况判断：一是今年四季度 PPI、CPI 都有望继续小幅上升，明年有望继续小幅延续这种态势；PMI 和企业家经营指数来看，也存在前述类似的情况。二是从外贸情况看，明年外贸的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川普上台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加剧的风险，加之美联储加息预期、人民币加入 SDR 等都会引起汇率波动，影响企业外贸正常报价和结汇。三是从银

行信贷情况来看，房地产信贷将趋向紧缩，个人购房信贷识别更加精准，在房地产新政作用下，政策的滞后效应预计在明年释放出来，该行业业绩及从业人员待遇都将有较大幅度的影响，进而影响到 GDP 的增速；四是国家各种政策导向以及经济新常态下新旧动能转换都在为经济筑底企稳发力，但后续增长的持续动力不强，经济持续缓升的动能有限，明年的经济增速维持今年的增速依然具有极大的挑战，预计国家明年的经济增速依然定在 7.0% 左右（或者给一个区间），但能容忍全年 6.5% 左右的增幅。

周小虎（南京理工大学）：

我的观点是经济已经处于底部，根本逻辑是“利空出尽”。对经济发展的判断不能仅停留在 GDP 指标上，核心是增长的能力和信心。目标中国增速的下降，不是 GDP 在 7、6 的问题，改革 30 年低于 7 的不是第一次，关键对增长能力和信心的缺失。底是信心的底。从目前来看，造成增长信心的几类重大利空的不确定性都已兑现，地方债、房地产、过剩产能等不确定性都大幅度下降，可控性显著增加。我们创新能力提升也为经济底部判断做了保障。

从短期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是影响 GDP 关键，美国、英国等世界的政治变化，都为中国外部机会。从管理角度看，企业家信心是前瞻性指标。

我们看到是中国企业创新意愿和能力大幅度提升，政治不确定性也在下降。中国最大问题是政治不确定性。但是，这个问题也可能已经过去。

张建华（发改委 TIS 规划院）：

为稳增长，政府正在用各种政策发力，因此明年的增速不会低于今年。但有一个政策空白是，政府的研发政策几乎都是国企和事业单位，对民营企业的研发创新支持不够，97% 的民企依靠自有资金。如果大力支持民企技术创新，不仅能加速转型升级，而且能形成新的固定资产，两方面都能促进增长。

邵军（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

补充一个用工角度的分析。我咨询一位做劳动力市场的企业家，他认为：制造业企业总体用工需求减少，但减少比例比去年减少。需求减少主要是外资制造，部分外迁到东南亚地区。通过过去二年的调整，苏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用工趋势趋于平稳。创新型企业（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用工增加。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制造业企业，发展比较平稳。结论：支持“有回暖迹象，但不稳固”。

吴学军（金泉投资）：

个人看法是国内经济现在已经见底，坏不到哪里去了。从生产端看，我认为国内企业只有国有和私有之分，私有部门对经济形势最敏感，不赚钱了或撑不下去了就直接关门，现实情况

就是私有部门早已见底，这个大家在苏南很多工业园区可以见到，而国有部门由于稳增长、维稳需要，僵而不死、大而不倒，现在是去库存筑底这么个过程，还要挣扎一下。从消费端看，新技术、新服务带来的新需求一直在刺激消费，处于良好增长势头。所以，总体就是底部这么一个状况。另外，我关注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创业的 CEO 们普遍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他们还在努力拼搏，我觉得这就是未来的希望。

岳中刚（南京邮电大学）：

经济筑底复苏，必须有新引擎。美国 2000 年的信息技术，我国 2000 年的房地产和入世带动的出口，目前没有新引擎。维持经济增长的房地产也横盘了，明年经济增长可能低于今年。

叶 蓁（人民银行）：

分析宏观数据是反转还是筑底，一定要有可靠的微观事实做支撑，否则只会陷入宏观数据分析游戏。个人觉得需要重点考察的微观事实是企业库存（同样不能看宏观数据），库存高与低并不一定和经济表现相一致，经济好时企业也会增加库存，经济不好时则会被动增加库存，所以还不能完全从宏观库存数据去看，需要仔细考察库存变动特点，尤其是分行业的库存变动。补充一点相关思考（未验证，不一定对）：

现在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已经进入瓶颈期，其对经济产出的拉动效应在减弱，价格效应在增强，由此经济长期很可能陷入“类滞涨”局面（不能完全和历史上的滞涨相比，可以理解为经济下行和价格上涨趋势并存，与菲利普斯曲线规律不一致或是菲利普斯曲线发生变化）。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1）现在是筑底还是形成阶段性顶部暂时还不好说。PPI 只是小幅度的上升 2 个月，经济有回暖趋势。两个月的数据无法做出判断，仅仅根据一揽子的指数也无法判断。

（2）去房产化，制造业未必能重新焕发；但不去房产化，制造业一定爬不起来。是底还是新顶，关键看资金能否重回制造业。

（3）另外，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消费真的有很大潜力，刺激消费仍然应该是未来几年的主旋律。关键是如何刺激，是否可以考虑盘活二级市场促进消费升级？

林学军（暨南大学）：

从长期看，中国持久增长的动力在创新驱动。中国有资本实力和人力资源的能力，应当进行制度创新，让人和资本发挥作用，推动中国经济长久持续发展。

我个人认为政府三个重要职能是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收入再分配。当前，还是要实施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保有压，保是培育新兴产业，加大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环境

保护，污染治理，压是淘汰过剩产能，继续调整产业结构。

孙 军（淮海工学院）：

（1）从短期增长动力来看，汽车和房地产等的生产和销售均已高位回落，去产能、投机等因素使上游行业价格上升，从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下滑而货币仍在高位的情况来看，滞胀局面开始形成。消费增长主要是高房价支撑下的财富效应的释放以及人口红利释放完毕之后收入的快速上升所致。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情况下，这些很难能够持续下去。靠政府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很难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原因在于：根据我的测算，ICOR（可以把它近似看作是投资效率）已经达到了历史最低值，资本收益率（ROIC）（白重恩测算）也是历史最低值，若仅靠政府的投资拉动，不要说基础设施本来效率就低，而且因为政府的无效率，使得收益率会更低。因此，根本就无法得出经济已经见底的结论。另外，从债务和杠杆情况看，中国目前债务总额已经超过 200 万亿，加上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无效率，使我国的债务情况岌岌可危，而且债务还会继续累积，尽早化解是当务之急。

（2）从经济增长的动力上来看，目前来看中央政府和居民可以加杠杆，但是中央政府因为要兜底，所以可能性不大。目前，居民杠杆大概在 45% 左右，仍然具有加杠杆的空间。要注意，居民加杠杆绝不应该是一二线城市加，而应该是三四线城市加，让新型城镇化与三四线去库存相配合加杠杆，可以成为增长的一个驱动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在崛起，以淘宝为代表的销售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销售模式的替代。互联网与农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的融合仍然在路上。在其它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虽然有个别突破，但总体仍然较弱。不过要注意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即使崛起、腾飞，因为创新的特征，也不可能像传统产业潮涌一样，拉动经济的高位增长。

总体来讲，短期来看，经济根本没有见底。从长期来看，经济会再下一个台阶。

另外，还要注意汇率与房价之间的关系问题。假设汇率不变，中国前五大城市的房地产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因此，下一步，或者房价得下调或者汇率得继续贬值才能保持平衡。由于汇率快速大幅度贬值不被允许而且也很危险，因此，房价应该会有下调的要求。对于一、二线房价，要密切关注，防止大幅度波动，但应该允许缓慢下行。

政策建议：一是靠基建稳增长，但是增长率没必要如此高，完全可以再慢一点，要防债务风险；

二是汇率与房价要做好平衡，至少一方有一个要缓慢下调，但要防止过度波动；

三是促改革，这其中的关键是国有企业。并不是说让国有企业不姓国，譬如退出房地产行业是否可行？再例如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去做是否可行？

四是让新型城镇化与三四线城市相配合，强力推进去库存。

冉玉红（慈铭体检）：

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没有筑底。虽然本轮 CPI 和 PPI 指数上涨主要是因为前期实行货币宽松加杠杆，特别是以央企为首的如信达地产、中原地产等有意在一线城市拉高地价来推高房价，以此来解决地方债务，制造恐慌气氛，把大量的资金冻结到房市，防止外汇储备大幅度减少，以及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以此拉动消费价格指数，如今房子限购，过剩的资本没有合适投资去向，利用去产能等题材，在大宗商品，尤其是钢材、煤炭等进行资本炒作拉动 PPI 指数。我个人判断这些都是短期的，如今政府已经对此行为进行了打压，我想下一轮资本的目标就是进入股市，每天都有公司发行上市，把资金吸引到股市来解决实体经济，换一句话说就是解决企业的融资成本。所以，目前实体经济从根本上没有实际改善，虽然指数出现回升，必然是短期资本泡沫引起。例如前期炒作的小米、乐视，以及号称大数据移动医疗的春雨等明星企业，现在都在垂死挣扎！只有真正的科技创新，改变生产模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高额的赋税，房价大幅度下跌（各项成本相应下跌，企业竞争力增强），实体经济才有希望。

崔卫东（蓝鲸咨询）：

经济触底，缓步回升。本轮经济在 2016 年第三季度触底。钢材、煤炭、化学品、纺织品、食品加工整体上扬。钢铁、煤炭、化工、纺织等基础行业利润状况好转。9 月 PPI 有负转正，8 月 CPI 触底，逐步进入 2 区间。

在大家为互联网经济和新兴经济唱赞歌的同时，一批全球化企业运用信息技术、新兴工程技术、新型商业模式得到快速发展，带动了“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比如 ZARA 创始人阿曼西奥·奥特加的财富连续两年超越比尔·盖茨，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连续 8 年力压孙正义。全球企业的示范效应将提振中国传统产业的（特别是传统产业比重较高的江苏和山东）企业家们的信心，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用工紧、加班多，已经在江苏沿江城市开发区的企业出现。

不再加码新的刺激政策，用改革和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是明智的选择。假定决策者按照这一政策路径，工业经济可能缓慢回升。如果增加新的刺激政策，回升可能很快，反复就会很大。

非常赞成刘志彪教授关于两次全球化的论述。在经济回升过程中，江苏经济需要建第一次全球化（先进制造业）高地、补第二次全球化（现代服务业）短板，而不仅仅是增长率的回升，更要趁回升之机，提高区域（包括江苏）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全球化水平。

与 1998-2003 我国经济探底有所区别的是，民营企业竞争性领域的落后产能退出缓慢。当时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比重较高，虽然有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集体企业改制，可当时退出一大批企业，产业升级进展比较快。2016 年的去产能政策，主要适应国有经济。现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这些政策效应有限。现在需要经济学家和决策层，一是研究民营企业退出的“救济”政策，比如破产保护、土地厂房转行等政策。二是遏制原材料价格的过快上涨，因不恰当的去产能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要暂停执行，防止股市、楼市的价格现象在原材料领域重演。三是警惕 CPI 快速回升到 3 以上。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感觉应该现在是底了，现在应该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基本功打得结实，只要整合得好，迅猛发展还是有可能的。

从我所了解的比较有规模的 200 ~ 300 家纺织企业看，纺织行业从 10 月份开始基本生意都好，因此人民币贬值不一定是坏事，目前看应该对经济稳定有好处。不过，有一个现象是：目前上下游整体供应链产品不足，都在抢货，不知道跟去产能有没有关系。

王洪亮（南京审计大学）：

个人认为：经济已经企稳。从用电量上看，2016 年 1-10 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约 4.8%，增速较去年同期回升 4 个百分点。而且用量结构改善，例如高耗能行业用电增速总体偏低信息传输，而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用电增速快。从消费价格指数上看，1-10 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2.0%，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6 个百分点。

政策建议：未来的改革，还在于政府是否敢于放权。

(1) 政府可以放开对教育过多的干预，允许更多的人办大学教育，由谁教？教什么？怎么教？在哪教？都可以放开。就如同放开快递行业一样。快递改变了中国的邮政行业。只要政府敢于放手，同样的故事将发生于教育事业。

(2) 医药行业。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围绕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将有很大发展空间。

(3) 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还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对这些行业和这些创新给予税收减免，以期在中长期中国经济有更大增长潜力。

史先诚（江苏省金融办）：

短期有企稳趋势。用书面语是“稳中向好，但稳的基础不牢”。

(1) 全球经济仍然低迷，但已好转。国际货运波罗的海指数近一年来首次突破 1000 点。同时，人民币策略性贬值。这意味着中国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会逐步企稳。

(2) 消费对经济拉动勿容质疑。消费升级加快。旅游、餐饮等生活性消费动力强大。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消费稳步增长。

(3) 固定资产投资渐稳回升，民企投资意愿回升。

(4) 政府稳增长的基建投资继续发力，各类科技、公共服务投资加强。

整体上看，“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政策落地实施，刨除滞后期应该已经见效。政治环境更加稳定，核心确立、四次全会明确四个全面。可以推断已逐步实现 L 型拐弯。

微观层面，企业间、地区间分化继续加剧，部分企业和地区还未能企稳，会进一步处于水深火热。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国经济前期进入快车道主要在于获得远高于国内水平的要素回报，并获得大量的技术溢出。目前，这种内外“势差”逐渐消失，国内也未在产业和技术上形成新一轮增长动力，长期增长波很难形成。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外需总体上较为疲软，国内需求是牵引中国经济增长，甚至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但是这种增长往往随着社会发展阶段性、局部性需求的满足而结束，波动性比较大，难以作为经济见底的界定标准。我国目前已经成长出很多创新程度较高的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颇具竞争力，但是这类企业在体量上相对较小，难以托底宏观经济。应该立足于对我国经济特征的认识，进行差异化的引导：

（1）严格标准建设，在经济增长中强化环境标准、技术标准建设等，提高企业产品供给的质量，创造国内高端市场，倒逼企业技术升级，形成高质量的生产体系。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改善宏观经济运行效率。

（3）开拓培育国内外中高端市场，为国内企业生产中高端产品提供支持，为企业创新提供支撑。

（4）加强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鼓励这些企业突破技术瓶颈，培育增长动力。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经济仍在反复筑底期，明年势头稳中走弱，但不是下行，不看好，可看弱。

一是外贸没起色。近两年一直疲软，今年全球贸易增长据估计不到2%！我国可能负增长。这意味着市场份额可能下降！这是趋势性转折？产业向其他新兴体转移加快？专家们找点数据论证下。二是消费明年弱于今年。今年名义消费得益于房市、车市和价格（包括大宗商品价格和CPI），这些因素明年趋弱，新兴消费难担大任，支柱消费短期内难转换。三是投资不会有大的改变。市场缺乏投资机会，所以投机骗人的事现在特别多。另外投资的作用在统计核算环节可能夸大了，外贸作用被低估，这两年可以忽略不计。消费的作用增强是此消彼长的结果。

以政策导向看，要强化差别化施策：一是中西部政策以稳增长为主，东部沿海以转型升级为主。又要稳又要调，实质还是稳，结果压指标，结构上没结果。二是调结构政策注重中长期效果，稳增长可以近期政策为主。金融危机以来，调结构的政策摇摆不定，缺乏稳定性和一致性。三是扩大消费上政策少，出台的意见多。在旅游休闲上空间大；大健康方面落实力度加大；互联网+与实体转型政策要协调，不要有失市场公平。

朱新聪（海尔）：

感觉是经济有筑底回暖迹象。（1）我自己所在的家电行业今年一直不错，当然受房地产、农村市场增长、消费升级、天气等因素影响。（2）消费升级带来的市场机会很大，最近很多隐形市场的家电新产品销售颠覆了我对这个行业的看法，以此类推其他行业机会确实很大，我认为这也是消费升级带来的企业转型，进而促进经济转型。（3）身边的实体企业朋友感觉最

坏的已经过去，目前在趋势好转。

陈建军（浙江大学）：

判断我国经济是否见底，还是要从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渐走低的原因开始分析。我认为：第一，从宏观经济视角来看，我国近几年宏观经济指标的下滑，并非是由总需求的萎缩引起，就像一般市场经济危机所显示的那样，而是主要表现为，消费依然坚挺，这表明，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有信心，这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最重要企稳因素。第二，投资也不疲软，有人会说民间投资疲软，但实际上我国的投资向来以国家、政府投资为主要角色，三驾马车中唯一疲软的是出口的下滑，这原因主要在于国际经济环境，以及人民币币值相对上升。我们谈到的经济下行，也就是比以往年间下滑 1—2 个百分点，6.7% 的增长率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速度，并不表示我们遇到了多大的危机。

中国这几年经济增长率的逐年下降，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的人均产出已经达到八千至一万美元，产业结构调整也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这几年，至少在沿海地区，我们看到的经济不景气，主要是制造业的问题，到了这个阶段，服务业的增速超过制造业，或者说现代服务业开始替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一种必然，在我们看到了很多制造业企业陷入困境时，也应该看到更多的服务业企业在兴起，这一点在浙江表现的特别明显。当一个国家（区域）的经济增长动力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是很正常。第二，是体制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各级地方政府的全力推进，近几年，由于体制调整和政策转换，相当部分的地方政府成员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采取观望态度，现实中，高层加油门，中层放空挡，基层踩刹车的现象也多少存在，这也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0.5 至 1 个百分点。第三，就是国际经济的因素，这也会使中国经济下降一个百分点左右。基于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的经济其实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通过从 2008 年到现在，将近八年的调整，沿海开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正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出来，至少如浙江、广东等省，产业结构调整已经过了最困难的阶段，经济发展显现向上走的趋势。一般来说，江、浙、广地区是中国经济走向的风向标，种种趋势都表明，明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状况应该会比今年好。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央政府应该采取稳健和中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妥善处理汇市、楼市、股市三者的关系，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对 2016 年的有关经济政策做部分的调整，如放弃以行政手段去产能的政策，更多的调动地方政府和各类企业的积极性，推动目前已经比较明显的经济发展上行趋势。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从宏观经济量（PMI）和价（PPI/CPI）看，进入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量价几乎同步进入扩张区间；从微观调研情况看，企业家信心回升。因此，应继续看好中国经济。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

我认为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可能还未走出紧缩的压力。当前 PPI 转正并不牢固，而且第三产业发展动力见顶，消费增速持续下滑，微刺激实为强刺激的扭曲负面作用进一步释放，明年紧缩或停滞概率大，可以从最近的贷款增速变化略知一二。

现在的底是政府强刺激托住的，并非经济新动能已经形成托住的，也非市场力量托住的，因此并不牢靠。如果此轮 PPI 有负转正，是由类似某些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要素成本上涨推动的，而非市场供求关系根本性改变造成的，必然难以持续。而且特定原材料价格波动阻碍了去产能工作的推进，会放大明年的负面效应。

沈志强（建信信托）：

贷款增速下降有多方面原因。一是调控的结果。今年上半年表内外贷款投放比较多，一些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其实早就完成投放目标（表内外），进入四季度主要是储备明年项目。二是对急需资金的民营中小企业惜贷。敢放款的政府平台早就完成融资任务（观察江苏省内平台），所以四季度信贷投放放缓很正常。三是监管部门收紧表外融资窗口的结果。今年下半年银监、证监出台多项政策，目的是降杠杆，原先通过券商、基金投放的表外信贷大幅减少。从监管政策、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目标、实体经济现状来看，四季度信贷投放放缓是很正常的结果。关键要看明年一季度的投放。

个人预计明年一季度信贷投放（统计口径）仍会创新高。原因如下：一是金融机构早投放早收益的心理使然，尤其是国有大行，据了解，一些大行已经根据最新监管要求推出了大资管发展要求，目标指向明年的投放。二是政府债务仍需腾挪，43号出台后，政府平台新增债务受到极大限制，但存量债务的置放不受限制，这里有极大的操作空间。三是 PPP 项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经过一年的适应期，面临大发展甚至大爆发。金融机构经过一年的准备，已经有了项目、产品储备，这块的增长可预期。

从建设银行最近的一些动向来看，个人认为经济仍在探底过程中。一是参与国有大企业债转股，近期建行与武钢、云锡等大型国企签署了债转股协议，单笔金额均达到 100 亿左右，目的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帮助企业脱困，以空间换时间。二是对实体经济的投放信心仍显不足。跟审批人沟通，他们仍明显表露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担忧。三是房地产金融受调控后，信贷除了投向基建、政府平台外，仍在寻求方向中。

当下经济如何做到“以进促稳，稳中求好”？

2016年11月23日

编者按：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11月14日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提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有把握较好完成，但当前国际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地区、行业经济走势分化也带来较大挑战。做好经济工作，要落实新发展理念，稳定和完善的宏观政策，着力在巩固“稳”的基础上下功夫，多在积蓄“进”的力量上出实招，适度扩大总需求，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突出提质增效，不断扩大经济向好态势。基于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出了本期线上研讨议题：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问题进行前瞻，继续上一期的讨论，分析我国经济如何“以进促稳，稳中求好”，并引导群内各行业专家、学者就自己熟悉的领域展开讨论、提出建议。

观点

刘志彪（长江产经研究院）：

如我们上期的讨论，大多数群友尤其是群内的企业家们，都认为中国经济正在或已经筑底，有的甚至认为已经进入企稳回升的阶段或轨道。在新的经济运行态势下，如何进一步理解过去中央所提出的“进、稳、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

首先我觉得，中国文字博大精深，为了方便讨论，需要对“进、稳、好”三者的标准进行界定。

“稳”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和状态稳定；

“进”，按照中央权威人士的说法，就是主动用改革的办法去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

“好”的判断标准，就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四大特征，即如果增长速度加快了，结构转型升级明显了，动力机制转换了，经济金融风险降低了，我们就说它“好”了，反之亦然。

过去一些年，由于经济运行急速呈L型下坠，因此如何稳增长、“稳中求进”，一直是中央经济工作的总基调。这里，“稳”字是摆在第一位的，“稳”住增长是一切其他工作的前提，在此前提实现的情况下，才可能去谈“进”的问题。显然，“进”是排在第二位才需要考虑的目标。

在新的经济运行态势下，只有进一步地“进”，才能实现“稳”的目标，“进”是“稳”的根基，因此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应该变为“以进促稳，稳中求好”。这个时候抓经济工作，就像骑自行车，

只有达到一定的速度，才能始终保持平衡、稳定，才谈得上结构调整和取得好的收益。

过去的一段时期中，大家对“稳”的基础有所担忧，认为仍然依靠的是老办法，即基建投资拉动和房地产市场火爆所致，而不全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发力。一些老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如基础的、上中游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过快过猛，实体经济成本降低不多但一些新的成本因素又在增加，如限载令下的物流费用大幅增长，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较大导致进口成本剧烈波动等。因此，实现“进”的任务艰巨，还需要时间。

目前，“进”还处在起步期，新动力、新动能、新业态、新模式还挑不起经济增长的大梁，但是中国经济的希望在此。因此，非常希望大家依据个人经验、体会和认识，重点就如何通过促进经济分化，尽快形成发展新动能问题发表高见。

陈柳（江苏省社科院）：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关于新动能的培育。

（1）从经济增速上看，当前培育新动能并不能使得经济增速回到较高水平，除非重大技术革命。当前新动能从体量上无法替代房地产、政府基建、钢铁等重化工业时代以建筑业为代表的传统动能，并且新商业模式对旧商业模式之间往往是替代关系，所以我们从现象上看到很多新消费，但是从消费数据上看消费增长基本不怎么变化。对经济复苏的判断，W型的上升是可能的，但要服从经济中长期L型走势的大判断；

（2）按季度观察新动能时间太短，官方报道说近一个季度以来新动能造成分化，恐怕不是，现在的分化主要是上游产能收缩不均造成的价格变化不均，新动能培育起码要从二、三年的时间跨度看。

地方政府当前培育新动能的模式，以我的观察，仍以载体建设和培育为主。先进地区以孵化载体培育新产业和孵化创业企业，比如物联网等；县城或中小城市，还是以进一步整合好开发区土地资源吸引工业项目。这种模式也是地方政府为数不多的选择方式，我觉得还是基本有效的：科技创业政府不推一把更难成长，县城一级的工业企业小作坊比重还很高。问题是，与政府大量投入相比，总体上培育成功的科技创新企业比例还很低、开发区工业项目还显得不足、不少政府标准工业厂房还空着。现实中，企业赚不到钱，政府有点推不动。

在“进”上下功夫，培育新动能，如果从一个角度出发：我认为要研究如何提高新动能、实体经济的回报率。目前的情况是，很多领域的确民营资本还进不去，竞争性领域赛道太拥挤，竞争过于激烈，传统行业企业的工艺提升、技术诀窍一般保持不了三个月。

从多个方面提高企业回报预期：

1. 挤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是有道理的，现在都说人力成本贵，房价也是一个因素，人要住房子，工资肯定要跟上；

2. 虽然现在行政体制改革、放管服上进展很大，但是金融体制改革等关键经济领域改革进展不是很大，服务业等需要进一步开放；

3. 竞争性领域的竞争秩序需要进一步规范，企业之间通过相互挖人进行模仿，不尊重知识

产权，这一点需要从法制角度规范，否则大家都赚不到钱。

何 雨（江苏省社科院）：

“进”，可以理解为要主动作为，“稳”说的是旧动能，而“好”说的是新动能，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旧动能，迈向中高端，也属于“好”。“稳”与“好”是主动作为的目标。作为目标，“稳”，意味着基础还不牢；“好”，意味着要的不是低水平的“稳”，而是有较高质量的“稳”。在“稳”与“好”的目标中，暂时是“稳”为先，“好”次之。具体到政策中，“稳增长”，依然是首要的，但是紧迫性有所降低；“调结构”，紧随其后，重要性开始上升。

总体来看，我倾向于增速基本稳住。故，尽管依然稳字当头，但其迫切性大幅下降。这为经济向好创造了一个良好基础。因此，应积极利用这一时机，全力“以进促好”。由于此问题面广量大，我只想到一点，就是建设“民资友好型”社会。通过优化民资环境，提高民资积极性，发挥市场主体在“以进促好”上的能动性与主动性。理由：1. 对外资的依赖度已经下降；2. 国资重要性有国家背书；3. 民资长期处于制度与政策歧视环境中；4. 近年来民资投资意愿下降严重；5. 由于势单力薄，民资更需政策扶持，才能做好“以进促好”；6. 营改增，让民资处于适应期，特别是金三新玩法，很多民资还不适应；7. 国务院七大重点人群增收计划，明显有为资方减负痕迹。

对策：

1. 全面落实负面清单制度，非禁即可；
2. 加大中小微减税力度；
3. 针对性扶持中小微企业技术改造与模式更新；
4. 增加中小微企业用工自主性，尽量让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工资与福利；
5. 减少对中小微企业的非业务干扰。

王洪亮（南京审计大学）：

我理解，“稳”强调社会稳定、政治稳定，“进”强调经济发展、经济改革。

关键技术和共享理念是新动力、新动能的关键所在。

- （1）进一步提升信息高速公路，加快 5G 技术的研发。
- （2）加快大飞机发动机技术研发。
- （3）放开更多空域为民航所用。

（4）只要是公共空间，不管商业中心的商场、大学的教室、政府的办公室、企业的车间全部安装 24 小时摄像，数据实时监控。公众免费查看任何一个地点的实时情况。做到信息尽可能充分。公众可以监督公务员工作，家长可以看到孩子的学习情况和教师的教学。政府可以看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准确了解经济生产变化。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我的理解，“稳”是因为前面遇到了比较严重、不稳定的环境而采取的被动措施，

一是稳总量，试图避免大起大落，因此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要稳；

二是稳需求，在消费、投资、出口等方面试图实现稳定；

三是稳供给，在供给侧也是稳定压倒结构调整。

现在，经济形势略有好转，一些先行指标有向好的趋势，因此，在此阶段，要主动作为，这就是“进”，主动出击，调整结构，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转换。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明年中国经济如何“以进促稳，进中求好”问题：辩证看待进与稳、进与好的关系。

(1) 对“以进促稳”的解读：“稳”是2016年经济趋稳向好迹象的延续，是有基础的稳，也是2016年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稳，避免出现经济基本面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增长的较大波动；“进”是通过稳中求进、进中促稳的方式来维护来之不易的经济稳定增长迹象，既是一种经济发展上的策略，也说明筑底企稳的动力不够强劲，需要进一步夯实经济增长动力，以进促稳、以进带稳，是为上策。

(2) 对“进中求好”的解读：进是追求，稳是基础、是底线，好是目标、是精益求精、力争上游。要在稳中求进、进中促稳、进中求好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而这个经济质量的“好”来源于新动力的加快培育、形成和早出成效，来源于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源于深化改革强化制度供给，来源于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创业创新，来源于开放包容的新增长模式，来源于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持久转型升级。

从“三驾马车”牵引动力看，

一是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稳步增长，特别是设备改造投资、新动能加快形成的产业投资、科技创新补短板投资、重大生产力布局投资、民生改善补短板投资等要发挥作用，继续通过创新公私合营模式及放宽民企投资领域，鼓励、引导和激发民间资本参与社会投资。

二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消费模式，启动和激活社会消费。加强供给侧和需求端管理和衔接，引导供给侧高质量、高标准服务消费需求；创新消费模式、消费业态，引导消费需求升级，通过“旅游+”、生态休闲体验游、大型国际赛事举办、文化动漫创意产品创作、高端高档娱乐节目推陈出新等带动消费增长。

三是全力以赴推动外贸出口增长。要承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充分发挥“后g20”效应，在稳住传统国际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所作为；积极推进跨境电商园区发展，探索采购型贸易试点，确保全年外贸出口保持较好的增长幅度，如在人民币贬值条件下，力争保持外贸增长高于2016年3-5个百分点。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以进促稳，进中求好”就是以改革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改革措施要符合5个理念。除了常常提到的供给侧等改革之外，我强调通过改革可获得3个动力：消费动力，激发民众的消费欲望；激发地方政府追求发展的竞争动力，犹如九十年代争抢FDI那样；激发创新动力，比如把“双创”深入推进。

苏晓东（东源节能环保）：

我认为，一方面去产能，另一方面要增加产能；即淘汰落后产能，增加优质产能。如果10年、20年后往回看，就会发现当前这个阶段正是企业转型升级的绝佳窗口期。企业必须要加大投入，尤其是研发投入。我们已经打算明年在浦口建设研发中心，投资2000万元。

近两年来，中国的央企群体更多的业务部门、一线部门或者新兴产业板块开始“南迁”，而广州成了主要的目的地。究其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客观原因，即广州在地理经济学上的独特战略价值。广州是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珠三角的行政和地理中心，也是中国经济辐射东南亚、南亚以及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央企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产能、技术和资本输出，广州作为支点，理所当然。二是主观因素，即广州通过近两年的结构性改革，创造了优越的营商环境。以南沙自贸区的建设为支点，推动经济领域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让央企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缙毛毯）：

中国经济过去一段时间的L低谷新常态，造成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信心，乃至很多企业本来可以有所作为或者可以抓住机遇的却保持观望，不进则退。据了解大多企业外贸订单已经订到明年的计划。但是价格并不高，制造型企业应该以“稳”为基础，只有稳步发展的时候才有精力考虑产品创新和部分设备改造升级。中国是个制造大国，教育科技有很好功底，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好，对抗危机很容易。

适当做一些调控，鼓励稳中求进，目前缺乏的是信心，增强大家的信心很关键。目前制造企业有回暖现象，但是回暖现象能够持续多久？取决于原材料价格上涨是否可控以及市场需求。

施康（香港中文大学）：

双轨制是中国早期改革成功的法宝，至今有其生命力。昨天在北京开会，看到一个数据：阿里百度和腾讯，总资产规模1万亿，资产收益率8%，这个代表最高水平，与此相比，5大国有行业（煤炭电力铁路等）总资产50万亿，资产收益率0.8%。

产业政策是抗生素，中国是泛滥了，但该用还是要用的，关键是什么时候用，用多少。具体一些比较好。

陈志龙（财经作家）：

当务之急是要加强预期管理，首先要稳住汇率，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面临国内高通胀和外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有限的外汇储备捉襟见肘，出口形势非常困难，许多人建议人民币贬值以刺激出口。当时副总理给多部门行政首长批复或写信，坚持人民币不能贬，他说“外汇储备是政治储备”，中央的改革要求和方向是清晰的、明确的，执行部门在具体操作层面，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和执行，如果再像去年那样在某个市场犯下血流成河的颠覆性错误，用朱总理的话说“将动摇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动摇国本，那将犯下不可饶恕的历史性错误，这个问题上输不起！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响应刘老师号召，稳、进、好的重点：1. “稳”，一是经济增长速度要稳在6.5%之上；二是宏观政策要稳健，但财政政策应更积极一些；三是防风险、稳大局，目前我最担心的是这一条，跟基层干部交流，可发现地方的税收、债务、房地产、过剩产能等方面泡沫极为严重，且相互关联，这方面的数据水分极大，一旦捅破，经济硬着陆难以避免。

2. “进”，一是新旧动力转换，培育创新第一动力，二是国企、财税、金融、农地等重大改革，三是对外开放空间拓展，包括一带一路等。

3. “好”，一是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二是生态环境优化，三是民生方面的优化，如教育、医疗、社保等。

刘东皇（江苏理工学院）：

“以进促稳，进中求好”，稳是基础，进是手段，好是目标。尽管当前中国经济企稳迹象显现，但仍需“稳”字当头。

“稳”首先是速度稳定，应努力保持增长速度在6.5%—7%的运行区间；其次是政策应避免朝令夕改，应着眼于长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然后是经济运行的关键变量要稳，比如汇率、利率、物价水平等密切关系到每一个经济活动的变量，给企业及消费者以良好的预期。

“进”作为促稳和求好手段，意味着我们应以积极心态引领经济新常态。具体可以大致理解为：在稳的预期下，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以大国心态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好”营造良好的外围环境；以创新和互联网+双轮驱动，大力推动创新创业，为“好”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好”是新常态下我们追求的目标，主要表现为速度中高速、经济结构优化、运行风险下降等等。

田伯平（江苏省社科院）：

如果经济稳住了不再下滑，那么主要政策目标应该引导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如果还没有稳住，近期政策目标应该放在促进稳定上。我的观点：当前经济稳得勉强，“进”的条件不足，还是要先稳住，给大家以信心，否则进没有基础。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前经济的深度调整实际上也是产业重构和模式再造的过程，与此相应的管理体制和模式是不是也需要改造？鉴于当前宏观经济深度调整的大背景，政策应着眼于调整的全过程，而不是短期波动，以加快完成调整为目标，对地方的考核也应如此，放松速度指标，重点是转型指标。

孙 军（淮海工学院）：

目前来看，稳的力量愈发薄弱，表现在：（1）人民币贬值加速。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9 个月外汇净流出 2.1 万亿，按照货币乘数为 4 算的话，流出超过 8 万亿，全年 10 万亿不成问题，在 M2 总量 150 万亿多的话，这不是个小数目，若是控不住这个趋势，楼市将会出现剧烈波动；

（2）投资效率已经达到了历史最低值，按照目前通过基建拉经济的增长模式，效率还将继续走低，这对于杠杆的上升和债务的累积是个极大考验；

（3）根据我的粗略测算，在维持经济增长速度不变的情形下，刺激型的经济政策所付出的代价应该至少 2 倍于改革情形下的代价，这种代价显然不可持续；

（4）目前的去产能、汇率贬值以及投机形成的价格上冲看似是好事，但对于下游企业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这种模式仅是周期性的，容易形成滞胀，时间一长必将恢复原样。

因此，靠稳是无法持续的，“以进促稳”是必须的，也是紧急的。个人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需求侧改革。这主要表现为以人为主的新型城镇化加速，这实际上应该也是下一步中国稳的主要力量之一。目前来看，仅居民还有加杠杆的能力，这一重要驱动力一定要运用好。

（2）供给侧改革。这主要应该体现在制度供给上，其中的关键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央地新的激励体制的建设、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

（3）在经济增长模式尚未转型成功的条件下，一味的保增长速度所付出的代价太大。建议适当降低增速，例如 6% 左右，这样刺激型政策所付出的代价略小，债务危机的压力也自然会减少，若经济改革成功，上冲的动力会增强，这叫以退为进。

（4）严格保护私人产权，严格控制泡沫，增强民资动力和希望。

最近所谓的好实际上是去产能之后的一个正常反应。但又赶上了人民币的快速贬值和去产能之后的投机，所以这个正常反应变得有点异常，不同于以往，非常值得重视，这说明常规治理模式已经开始失效。

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过高，制造业乏力，在房地产又被抑制的情况下，大量的资产或者套利流往国外，或者进行去产能之后的投机行为。而货币流失贬值形成的进口价格上升又

进一步推动了投机行为，使得价格猛涨。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要理解“以进促稳，进中求好”，关键在于对“进、稳、好”三字的解读。中国汉语表达的智慧往往在于反话正说，视消极为积极。这恰恰说明当前中国经济格局是在衰退，这种衰退已影响稳定大局，这种衰退影响了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格局。有了这样的基本判断，我们可以寻求破解中国当下经济发展的困局。

首先，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衰退，L型衰退是否已筑底成功？个人判断，中国经济还在探底过程，表现在企业活力不足，开工率低，人民币贬值迅速。

其次，如何“以进防退，以进求稳”？一是继续释放制度红利。要坚定不移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开放行业限制，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制度创新的机遇。如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共享经济模式的兴起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推进相关产业管制制度的改革。以制度改革推进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可靠的持久动力引擎。二是要注重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战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全面产业升级，提升在国际产业竞争中的竞争力，必须实施创新战略，以创新带动经济增长。创新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更需要企业的投入，这就要求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制度化的稳定环境促进创新。

最后，如何“进中求好”。对“好”的判断标准：一是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二是人均收入进一步增长；三是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改善。针对这些标准，可以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王辉龙（南京党校）：

现在“进”的关键点还是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增强整体经济活力。

一是允许和鼓励地方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发展战略。在符合环保条件的前提下，自行确定发展工业1.0、2.0、3.0还是4.0，或者服务业。

二是政府专注于重大专项的发明，创新交给企业和市场。市场主体的错位、缺位、虚位是活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三是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更加灵活一些。只要不是主观故意的寻租和滥权，尽量减少问责；对不同地区，考核指标可分类设置。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经济分化严重，还是应该鼓励因地制宜，一地一策。比如今年对商品房去库存的处理就很好，冒进的十几个大城市就压一压，其他地区依然执行原来的政策，产业政策也应该如此。

另外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少一些“大力推进”、“进一步加强”这样的字眼，改成“支持”或“限制”这样的词语，告诉各地什么会得到扶持，什么会受到打压，让各地自主做出选择。这

样比“大力推进第三产业”、“积极推进城镇化”等必须贯彻的表述要好得多，也能有效防止一哄而上，脱离实际。

周 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好，但分析应该有大有小，大的方面是为了“稳”，小的方面是“进”和“好”。

第一，对于“稳”来讲，这个必须政府出面调控，是为了“进”和“好”保驾护航。现在国家搞自贸区、综合试验区、国家级新区等等经济体制机制创新发展试验区，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阈值相关的“大数据”、“互联网+”等经济增长新手段的鼓励，可以看出是国家努力想找到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的新手段，这些尝试目前来看，还在努力寻找中，但还没有对经济发展带来创新性的变革，而且抓手的“度”还不够大到能够支撑经济未来的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所以“稳”是必须的。我觉得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关键方向：强基础（更多更好更广的各类软性硬性基础资源的建立和壮大）；强人才（这里面不仅仅是教育，而且人才的激活和利用机制，至少大学生的价值要有很好的实现机制，而不能有大学生就业难、高薪难与社会其他行业收入低等问题）；强合作（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对于国家而言，国家应该建立国内外强大的合作体系，应该建立主导的经济共同体，激活各种资源）。

第二“进”：我理解的“进”，就是接地气的“进”，解决各个经济体的各方面的问题，大到区域：比如山西的煤矿问题、目前制造业遇到的盈利不高的问题、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问题、国有企业如何激活壮大问题等，并且不能仅仅是研究，要快速解决。这些必要时国家或政府要拿出资源和魄力解决，并且要有只要不犯法可以适当犯错的宽阔胸怀，同时“进”更重要的就是体现市场经济，能用市场解决的尽量用市场解决，这样才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第三也是最后“好”，这个我理解就是“社会主义”的综合体现，整体不能无序的发展，国家对于“好”能体现的都要加大投入，这方面可能短期对经济没有任何影响，甚至于都是反向作用，但从长期来看，肯定是积极有效的，如环境问题、农民工幸福和谐问题、城镇化与人口就业问题等等，这些是社会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前面有专家讲的短期可能效益少或负向，但长期看会是我们真正的“制度红利”。

杨 锐（苏州大学）：

稳、进抑或好，都是对经济增长状态的现象描述，经济增长才是核心。经济增长终究归为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从产品维度看经济增长，其与三个方面有关：

1. 在于新产品的不断生产。这里的“新”包括对市场来说是全新的产品（如特斯拉、3d 打印、全新服务等）和对企业自身来说是全新产品。

2. 新产品的产业化离不开企业家的努力。企业家比普通人有更强烈的意愿去追求财富、权力和名声，而追求它们都需要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或配置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或配置到创新性的寻租活动。企业家手中的资本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一旦行业间的利润分布差异被非竞争

性力量扩大，企业家的才能无疑会被配置到短期可积累财富的行业。

3. 企业创新活动发生的空间是城市，同时，它也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城市与城市之间需要相互支持，尤其是一个城市与比它还落后的城市之间，需要在人才、市场、技术、资本、产业转移等方面建立实实在在的城市层面的合作框架，如此，城市通过即时创新和城市间联系，实现内部的自我成长。

建议：

1. 国家层面利用体制在资源配置上的最强优势，遏制那些不利于生产领域创新活动发生的高利润产业。很显然，如果行业间是自由竞争的，行业间利润差距不会非常大。反之，就是政策性力量让利润的行业分布畸形。为了让企业家能够把其才能再配置到生产领域，需要政策干预，改变那些立足于体制、政策套利而获得高利润进而吸附社会资本和企业才能的行业发展规则。

2. 省层面启动促进经济增长的城市间合作政策。从国家层面，产业政策可以实现一些举国上下的共同目标，但是产业政策很难通过城市来实现其目标。因为产业政策的效果会被省、市的政治架构给分割，被官员的逐级政治跟随所削弱。其次，经济增长主要是在城市这个空间里发生的，如果脱离这个产业空间去谈增长，不落地。为此，可以从省层面启动城市间（省内、国内、国外）在市场、劳动力、技术、资本、产业转移五个方面的合作机制、方案等。

3. 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经济增长的动能一直是创新，没有别的。如果是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会是哪些行业？从为促进国家经济增长角度，没有人知道哪个新行业会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而那些存在的所谓判断都是事后判断。

总的观点：把产业政策调整向城市间合作政策。扼制高利润行业的非竞争性发展。稳住企业家、聚焦企业家，他们才是创造、生产产品的最终实现者。

何金耿（医创星）：

产业升级、新动能培育中，政府角色还是少不了的。最近，我与医生团队、中科院筹建医疗专利孵化器，整合行业资源，挖掘真正的金子孵化成医疗产品。深入下去，发现政府以培育创新载体方式培育创新还是不错的，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真正有技术、想创新的人。

汪德华（中国社科院财经院）：

1、“以进促稳，进中求好”的目标很好。我的理解是要区分“进”、“稳”、“好”适用的范围不同。“进”应当指的是特定领域、特定部门和产业的“进”；“稳”、“好”应当是结果，稳主要体现为以经济增长速度稳定为代表宏观变量企稳，“好”指的是一些结构类宏观指标向好，企业效益向好，生态环境变好。因此，“以进求稳，进中求好”目标的提出，是在企业家信心略有恢复，若干宏观指标有所好转的大判断之下，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不再是不惜代价采取各种手段求稳，而是强调抓住牛鼻子，解决重点领域、重点部门中的问题，这些领域和部门的进，就能达到宏观上、结果上的“稳”和“好”。这是一种经济政策制定方法论上的

调整。

2、特定领域和特定部门，我想强调五个方面。

一是出口部门，应综合利用各项政策，确保出口增长。中国经济增速超出国际平均水平，从宏观上看必然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两大利器，重庆的案例是很好的说明。中国现在的国情，也有条件利用好这两大利器。

二是一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行业，应着力使相关政策落地，特别是一些审批、监管政策的修正和放松。中央已经出台多项政策促进若干朝阳产业的发展，但从现实情况看其落地不易。以我近期调研的养老产业来看，已有多项政策要求用电、用水、用气享受居民价格，但调研情况看，基层大多无法落地，只是说说而已。社区养老产业还有个怪异的消防前置审批，目前已造成几乎 90% 的养老企业是非法状态。种种状况说明，很多有前景的产业，依然被枷锁拴住，急需解除。

三是产业支持的财政制度要加速改革。产业政策争议很多，但中国产业支持的财政资金已经在那了，短期内也无法削减，因此要在用好上下功夫。近些年来这一领域也有很多改革措施，但体制转换恰恰使得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以近些年来力推的 PPP、政府产业投资基金为例，实际落地率大概都在 10%，提升的空间很大。

四是应使实际财政赤字率不下降，维持一定的力度，促进新型城镇化。大家都说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不能垮，我想现实情况并非是房地产投资支撑作用有多强，而是房地产引致的城市基建支撑作用很强。比较好的方案是要稳住房价，降低企业成本，同时维持财政刺激力度，支持城市基建。

五是国有企业改革应坚持正确方向。

任保全（常州大学商学院）：

针对最近两周本智库所探讨的新热点新问题，我思考了许久。自己思考和总结了一些拙见，请专家们批评指教。

1、针对促进经济分化，发展新动能过程中，要避免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1）推进区域分化，培育适合地区间差异化发展的新动能。

当前，一部分地区经济下滑过快，而另一些地区却异军突起。在促进经济分化，发展新动能过程中，要避免一种误区：即各地区发展新动能，就是各地区都要发展新兴产业。实际上，由于中国地区间在经济发展基础、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结构、市场化进程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针对不同地区的新动能培育应有不同的定位。对于东部发达省市而言，高科技和高端服务业领域的新兴产业是发展新动能的核心，而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那些东部发达省市准备外迁的部分产业，可能恰好是能促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所以应鼓励适宜的产业进行内迁，避免东中西部在发展新动能产业上出现产业同构和恶性竞争，进而导致新动能产业的产能过剩，以及高端产业发展的低端化现象。

（2）推进行业分化，培育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新动能。

当前，新兴行业发展势头良好，而传统行业增长乏力甚至产能过剩严重。在促进行业分化，发展新动能过程中，也要避免一种误区：发展新动能，就是要摒弃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显然，培育新兴产业是“进”，而清理僵尸企业和淘汰过剩产能，实际上也是“进”。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动能过程中，决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重要性。一是，许多传统产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功能和作用；二是，通过兼并重组，以及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等措施，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不但可以使传统产业重新焕发生机，而且也能使传统产业成为新动能的重要载体。

2、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如何促进经济分化和发展新动能。

(1) 培育需求市场环境，促进经济分化和发展新动能。

从消费者需求市场角度看，一方面，要培育更为挑剔的消费者，从而提升消费者对产品档次、质量以及个性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国际经验表明，庞大稳定的中产阶层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应该努力培育中国庞大的中产阶层。但是，当中国逐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要注意避免又陷入“中产收入陷阱”，一定程度上中产阶层需要社会的保护。

从产业（企业）发展需求角度看，一方面，要加大新动能产业所需的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的建设力度，例如，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充电桩的配套建设；另一方面，加快与新动能产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进一步分化和专业化，从而满足不同新动能产业的发展需求。

(2) 创新供给的政策环境，促进经济分化和发展新动能。

一是，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努力实现“产城融合”发展，这不但有利于实现人居环境、社会保障、就业方式以及产业结构等由“乡”到“城”的重大转变，而且为交通、电信、医疗、金融和环境保护等产业带来新的投资和发展机会；

二是，大力推进双创的发展，构建双创平台体系，实现“筑台育种”和“筑台引技”，升级双创人才工程，实现“筑巢育鹰”和“筑巢引凤”，提升双创金融服务，实现“开源蓄资”和“建池引资”；

三是，促进产融结合和产业金融的发展，金融在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创新金融支持服务于产业发展的理念，例如，通过绿色金融、（互联网）普惠金融等金融方式，促进经济分化和发展新动能。

3、对经济有没有见底问题的一些思考

针对经济有没有见底的问题，首先，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经济下行态势，一方面，是中国的国内外大环境所导致的被动调整，另一方面，也包括了政府对经济的主动调整。其中，主动调整就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显然，可能比中国经济有没有见底的问题，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中国经济金融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中国可否长痛不如短痛，以短期所付出的代价，换取长期更好的发展。这也有利于推动“以进促稳，进中求好”目标的实现。

林学军（暨南大学）：

我国今年前三季度 GDP 增速 6.7%，我国经济的问题在哪里，如何保持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认为主要压力有三个：总需求扩张不足、宏观政策空间有限、改革推进有压力。

我个人认为：扩大总需求不能再搞房地产。虽然房地产行业确实能带动许多产业，给政府创造丰厚的财政收入，但是，在当前房地产供给过剩，炒房投机过热的情况下，一定要刹住房价涨势过高的势头。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过度投机，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危害，甚至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那么如何扩大内需，我认为：

一是可以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林毅夫认为投资基础设施，短期可创造就业、增加需求，长期来说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当前，我们应当大力发展西部、老少边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把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攻坚结合起来，重点增加贫困人口的就业和收入，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还可以加强国家的主要经济动脉的建设，为将来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二是我们可以扩大环境保护、污染处理的投资力度。引导绿色投资，绿色就业，治理荒山、沙漠，修筑污水处理设施，增加治污、防污的设备和人员投入。

三是增加新兴产业的投入。例如：扩大太阳能设备的科研、生产、运用，增加电动汽车的研制、生产、市场推广，把电动汽车的基础设施，如充电桩建设好。

四是可以扩大养老产业的投资，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方面的投资可以是政府引导，民间投资，政府扶上马，退出资金，企业自主经营的方式。

国民经济的另一架马车是对外经济。当前国际需求疲软，确实给我国进出口带来困难。但我们可以抓住一带一路的机会，扩大对外投资。当前，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资本优势，应当努力开拓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老旧，我们有投资机会。而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资金约 8 千亿美元，非洲国家约 5 千亿美元，全世界总需求约 2 万亿美元。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每增加 1 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增加 0.7 美元的进口。这为我国资本输出、商品输出提供广阔的市场前景。

当前另一值得关注的的事件是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快速突破 6.7、6.8、6.9 三个重要关口，这个事件必须引起警惕。过去我国一直在吸引资本流入，现在的问题不是说资本流入不够大，而是我们的资本流出面临一个拐点，2014 年开始，我国流出资本与流入资本几乎相等，过去的私人部门从几乎不对外投资，到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资本流出抵消了资本流入，导致了净流出态势，这也许是近来人民币汇率急跌的主要原因。加上人民币加入 SDR 篮子，需要按照 IMF 的规则，汇率由市场自主决定，我国中央银行以前对汇率的干预，现在就要遵守市场规则了。为此，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努力吸引外资，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取决于国内的资本回报率，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另外，发展离岸市场的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扩大人民币投资产品种类，拓宽人民币回流的渠道。以港交所推出的美元兑人民币（香

港) 期货合约为例,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 人民币期货合约持仓量增至 27819 张, 较 2015 年底大幅增长 32%, 名义金额总计 28 亿美元。上半年, 人民币期货合约日均交易名义金额达到 2.19 亿美元。离岸市场金融产品的发展壮大不仅可以解决部分投资需求, 增加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度, 也可给监管主体增加市场化的调控工具。最后, 可以让商业银行代理中央银行进行市场干预, 进行必要的市场操作。当然, 如果人民币汇率突破一定的底线, 例如破 7, 则央行一定要出手维护汇率的稳定。这对我国经济平稳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对稳进好的认识, “进”指新动能, “好”指民生好, 专家们对这两者的大致观点比较统一, 目前分歧大的是“稳”。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各人默认的“稳”的时间纬度不一致。

讨论稳, 第一要讨论时间。按照前期讨论中刘老师的意思, 是讨论中短期企稳, 尤其是短期。那么, 宏观短期有多短? 按照基期长度为 40 个月, 按照中国财政预算长度为一年, 按照农业再生产和二三产业工作合同变动长度大约为 8 个月到 2 年不等。但无论什么纬度, 把预测目标定到 2020 年是没有问题的。

讨论稳, 第二要解决稳的标准问题。是经济增长稳, 还是国内经济稳? 还是稳增长、保就业、控物价、外部平衡等国内外兼顾? 先说国内经济: 何谓经济增长稳? 保住经济新常态 6% 的中高速增长下限可作为标准。何谓保就业? 每年新增就业人员 1 千万的年度目标不变可作为标准。何谓控物价? 守住合理区间上限 3% 可作为标准。

最后就是对照标准做出判断。从中国经济量(PMI 连续两月进入扩张区间)价(PPI 告别连续 54 个月的通缩, 已经连续两月正增长/CPI 已经由通缩发展到有温和通胀的苗头)关系判断, 经济增速在未来 4 年中跌破 6% 的概率不大。随着服务业比重继续提升和城镇化进一步推进, 今年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全年新增就业人员 1000 万的目标, 未来三四年就业也不会出现大问题。而从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走势和国内制造业产能、以及农牧业生产情况和货币政策看, 中国也不具备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供需和宏观政策基础。再说外部平衡: 随着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实施, 中国对外经济已经由“双顺差”的被动全球化过度到“贸易顺差, 资本逆差”的主动全球化时代。客观说, 中国外部经济波动、不确定性和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在加大, 但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 中国经济的世界比重已经由 90 年代的不足 2% 增加到 2015 年超过了 15%,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经超过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很难说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会恶化到不可控的地步。

史先诚(江苏金融办):

进的前提是稳, 进的目标是好。

首先是判断当前经济运行质态所面临的“稳、进、好”之间的关系。目前, 经济有企稳趋势, 但并不稳定, 经济增速是靠政府强力维稳在支撑。对于这一点, 有学者反对政府行政干预, 我

对此持相反立场，不能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听之任之，在经济不稳之时还任由市场力量自由发挥，就如同在飞机下坠过程中，还完全任由飞机无人驾驶。前期，民间投资缺乏信心，急剧下行，没有政府和国企在支撑，目前信心焉存？所以，我的观点是当前依然稳字当头，而且要通过“以进促稳、进中求好”，来替换稳对政府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政策工具的依赖。

第二，“稳”的重点。一是对宏观把控能力的自信，要稳住阵脚，用领导的话讲，就是要“有定力”，对宏观指标短期波动、经济增速即使再降一点，不需要一惊一乍的。二是要稳政策预期，坚定不移地推进四个全面，按五大发展理念培育新动能、新产业。三是要稳金融环境，坚决抑制高杠杆融资，严厉打击洗钱、非法集资、地下金融，加快给予类金融企业合法身份，落实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把类金融真正管起来，通过合法化、纳入监管化解类金融风险，为实体投资的“进”创造条件。坚决稳住汇率。通过“进”来化解银行业风险。四是稳房地产，坚决抑制一线城市房价上涨，防止行政干预后的反弹逾期自我实现，争取逐步降低房价，为年轻人安居乐业创造条件。五是稳社会基层的组织、党建、选举、自我管理，坚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反贪腐，让每个人体会到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严肃性，增进社会公众公平正义可获得感。

第三，“进”的方向和“好”的标准。推进转型升级，加大财政对创新、技术公共基础设施、基础理论研发的投入和引导力度，全面构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加大金融对创新的支持力度及财政对金融的引导力度，围绕创新创业下功夫，打造创业成功者的创新收益机制，大力推进创投风投、资本市场 IPO、再融资、投资基金，规范发展股权和产品众筹。好，除产业结构、动能转换、发展模式等指标外，重点在于形成社会对创新文化、工匠精神、精益求精、优质环保卫生产品的追求，生态环境和制度环境让高收入阶层不愿再急于向境外转移资产，让年轻人乐于创新创业，改变当前急于挣快钱的制度环境。

第四，政府改革和制度红利。从淡化 GDP 考核和全面建设小康的角度，政府应该逐步朝中型政府规模调整，加大政府权力清单和市场主体负面清单执行力度，压缩县级以上政府等各类行政机构财政供养人员，提高县区政府对社会公众基层服务能力。制造业制度红利即将面临天花板，服务业制度红利空间巨大，但服务业制度红利的释放与政府对服务业行政管理能力密切相关，没有后者的提高，前者较难释放。出台实施网络安全法就是政府行政管理能力提供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前产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新对策（一）

2016年11月30日

经历了几个月的线上讨论，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已经形成了数十篇专家推文、专题讨论以及热点问题追踪，受到了政界、学界以及企业家们的广泛关注。应长江产经智库群广大群员的要求，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的带领下，第一期线下研讨会于2016年11月26日在南京金鹰珠江壹号国际酒店顺利召开。在此，我们诚挚地感谢前来赴会的各界专家、学者。

为了促进交流，我们将对本次研讨会的主要成果进行分期推送，同时也欢迎未能参会的各界专家、学者通过留言方式，与我们互通有无。

本期推文内容主要包括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开幕式致辞及主题发言。

刘志彪院长开幕式致辞：

各位老师、朋友：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我们长江产经智库能在今天召开线下会议，过去我们线上的讨论有很多的局限性，总的来讲，线下研讨与线上讨论的关系相当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线上讨论相当于虚拟经济，今天我们的线下研讨会相当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实体经济。

今天，我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长江产经智库的来历。为了响应习总书记“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号召，江苏省委成立了九家第一批省级智库，其中就有我们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为什么我们智库取名“长江”？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通过“国外对中国的了解”相关研究发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最深刻的两个词是“长江”、“长城”，而我们又地处长江边，所以就取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寓意长江边的中国，是立足于东部发达地区，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经济。当下第一批国家智库大多依托于北京的单位，地方智库获批较少，因此我们智库的定位，是希望打造为国家型智库，为世界所熟知。

今天我们线下会议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进行学术研讨，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提供一个大家见面的机会，畅谈友谊、增进了解。

今天的会议上，我主要谈一谈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形成的背景和倾向等问题。

刘志彪院长主题发言：

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取向——权威人士政策倾向解析

对国家宏观经济的分析，需要有合理依据，其中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权威人士发表的三篇文章，包括：

- （1）2015年5月25日：《五问中国经济——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
- （2）2016年1月4日：《七问供给侧结构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
- （3）2016年5月9日：《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

这三篇文章其实代表了当今中国最高层对宏观经济现在和未来的主要看法和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权威人士所表述的内容主要是说：中国经济在下行，这个下行过程不是“U”型，更不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而且它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民间对“L”型走势有如下四种的解读：

第一种属于蒙着眼睛下台阶，仅想一想就很恐怖的感觉；

第二种最为温和，经济增速下降后在一个轨道上滑行，但过程中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依然会有强烈的不适感；

第三种是向下深跌，水平线却很短，基本上是属于向死而生型；

第四种是小写的L型，属于绝望式下跌。

上述的四种“L”型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究竟是哪一种形式的L型目前还不知道。

仔细研读权威人士的三篇文章，我有几个总体的感受：

第一，用词很简洁，语言风格中规中矩，可读性胜过政府文件，很多事情打比喻。例如：

- （1）第一次讲到如何分析经济形势的时候就提到要用不同的眼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 （2）讲调结构时，三篇文章中两次提到：“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 （3）讲产能过剩时，比喻准备了两桌饭，只来了一桌客人，怎么使劲吃也吃不完；
 - （4）讲消灭无效率企业时，说要拔掉呼吸机、输氧管，让僵尸“入土为安”；
 - （5）讲货币政策时，说不要搞“大水漫灌”；
 - （6）讲产业政策时，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说明政府不应胡乱干预企业；
 - （7）讲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时，说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情，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
 - （8）讲改革阵痛和分化时，说“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要壮士断腕”；
 - （9）讲要发展实体经济抑制泡沫时，说“树不能长到天上去”；
- 第二，读权威人士专访，感觉领导人给下属以命令的口吻下达指示。例如：
- （1）2016年5月9日的谈话三处用到第一人称“我”：“我看也不是什么坏事”（谈经济分化）、“我要强调的是”（谈L型走势）、“依我看，还不能匆忙下结论”（谈通胀、通缩风险时）；

(2) 很多地方直接下命令, 要求必须这样做: “十个更加注重, 对得上的要加把劲干, 对不上的坚决不能再干”、“对照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三种情况, 大家都要照照镜子”等;

(3) 更多是教地方政府官员怎么做经济工作, 如: “结构调整是新常态更本质的特征, 等不得也熬不得。早调早转早主动, 晚调晚转必然被动”、“防风险就是稳增长”、“五大政策支柱: 稳、准、活、实、托底”等;

.....

第三, 权威人士是一个坚定的市场取向改革者(后面将详细展开论证)。

第四, 权威人士的影响巨大, 比经济学家重磅多了, 但是从一开始市场就理解错了。最为典型的的就是三篇文章发表时间对应了股票市场的三次巨大波动: 2015年5月25日后发生的股票急剧下跌、2016年1月4日的股市熔断、2016年5月9日A股收盘跌了2.79%。

接下来我就主要挑几个方面, 讲一讲为什么说权威人士是坚定的改革者:

第一, 供给侧改革回归政策重心。

(1) 在权威人士讲话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 供给侧是主要矛盾, 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 而不是主要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必须作为主线和主攻方向。说明未来的经济政策需求侧方面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供给侧方面发力是主要的。未来将主要采取稳健型的货币政策, 未来的经济走势也会进一步证明货币政策是稳健型的。从财政政策方面对整个经济的供给侧发力, 可能是未来的主要方向, 包括各种减税、减费、刺激企业家精神、刺激各种创新对结构的调整等方面。

(2) 投资扩张只能适度, 不能过度, 决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这些是权威人士的原话, 显示出新一届的党中央弃用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传统政策倾向, 更多的是从供给侧发力对经济进行改造。

(3) 对经济问题的总体判断: 不是周期性的, 而是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的原因。如果是周期性的, 我们只要等、熬就行了, 等周期来了, 大水漫灌自然就会好了。因为周期总是有萧条、复苏、繁荣、衰退的过程。但如果经济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 就不可能等来了, 与其苦等、苦熬, 不如苦干。

(4) 强调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主观能动作用, 要主动作为, 而不是消极等待, 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 尤其是用改革的方法来推动结构的调整。

(5) 需求侧走到一个阶段性高点后, 供给侧改革只是其中一个选择。事实上过去需求侧我们只走了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的道路, 为什么不走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的发达国家路子? 原因是虽然消费驱动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但进入消费驱动模式后必然要考虑分配问题, 现阶段这个问题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分配无法一下子调整, 但经济又要持续增长, 因此只能使用供给侧改革, 等未来进入发达序列的时候, 消费驱动才能成为主流。这是经济政策选择方面的一个考虑。

第二，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映了中央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三个阶段的不同认识。

（1）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给以前的政策划一道线，表明是过去的政策，现在不再使用，但以前政策副作用产生的后果仍然需要忍受），这一阶段仅仅通过需求面刺激已经不行了。

（2）“新常态”，也理解为新平庸，包括四个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变成中高速、经济结构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型、经济动力由投资驱动变为创新驱动、经济风险大幅度上升。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了主攻方向、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不是搞需求的大水漫灌，也不是搞需求紧缩，更不是搞新计划经济。

第三，权威人士不是一个新“计划经济”者。

（1）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供给侧 + 结构性 + 改革”的定义看，它是用改革的方法，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家要实现“新计划经济”。

（2）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虽然与西方供给学派不同，但是政策原理是一致的，西方供给学派讲“减税减费、放松管制”，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是为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四，反对用高杠杆硬推经济速度。

（1）既然是新常态，就要彻底抛弃通过宽松货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速度不是经济政策的主要选择，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不是主要问题。

（2）增长速度与经济风险是两难选择，高速增长需要加杠杆，而加杠杆又会提高经济风险。但是考虑到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有较大的人口数量和储蓄率。而加杠杆的金融风险却危害巨大，因此主张选择放开速度、加速去杠杆的政策，两难就会变成一难。

（3）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

（4）去杠杆容易理解错误，比如去年证监会在股市最高点选择将所有杠杆都去掉，这就相当于给一个梯子让人爬到20楼，再把梯子抽走，这是让人跌死的行为。去杠杆并不是说股市去杠杆，而是指的实体经济（地方政府、企业等）去杠杆，股市不可能没有杠杆，股市的平稳可以稳定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很大好处。再比如说现在去杠杆变成了移杠杆，什么是移杠杆呢，就是把一个人的杠杆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是结构性的。事实上移杠杆要把杠杆移到中央政府，让政府适当的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方面虽然余地不大，但可以做一些调节。

第五，否定用房地产加杠杆来去库存。

（1）房地产去库存问题，要区别对待、一市一策。一、二线城市要防泡沫，用限贷、限购、甚至是限价的方式控制房价上涨；三、四线城市要同城化相结合，加速城镇化，让农民进入三、

四线城镇。

(2) 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不应通过加杠杆“去库存”。

(3) 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要通过增加土地供应量来增加房地产供应量从而压低房地产价格。

第六，股市、汇市涨跌不再是政策目标。

(1) 股市要立足于恢复市场融资功能、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其中保护投资者利益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不把投资者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股市是不可能健康的。股市不是经济增长的工具，不要把调控股市作为维持经济增长的手段。

(2) 汇市要立足于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发挥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逐步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有弹性的汇率运行机制。

(3) 著名的蒙代尔不可能定律：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如果想允许资本流动，又要求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就难以保持汇率稳定。现阶段在美元加息的背景下，放弃了汇率稳定，同时对资本流动不进行严格的管制。

第七，“三去一降一补”是一个系统设计，有关联互补作用，不能单独就其中某一点孤立的说。

(1) 去产能，要用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门槛准入和政策标准，加大制度建设和执法力度，不要用行政命令和指标。

(2) 去杠杆，要在宏观上不放水漫灌，在微观上发展直接融资，打破刚性兑付。

(3) 去库存，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农民工进城的财税、土地等配套制度。

(4) 降成本，要降整体税负，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减少行政审批。

(5) 补短板，要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体制。

第八，减少行政干预离不开政府自我革命。

不要一味的、无原则、不加以区分的反对政府干预，政府干预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市场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但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界定权力边界。

(2) 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

(3) “放手”不是“甩手”：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

(4) 解铃还须系铃人。比如，减少对“僵尸企业”的补贴，不靠行政命令、单靠市场行吗？显然这里仍然需要政府的力量来解决就业安置、债务偿还等问题。

第九，通过经济分化，培育新的发展动力、新动能。

(1) 分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在经济分化下，资源开始寻找新去处，这就产生了创新。

(2) 在新常态下，我们最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培育新动力、形成新结构，这意味着分化越快越好。

(3) 强调通过经济分化形成发展新动力，其实是强调市场机制的竞争淘汰作用，单纯依

靠产业政策是无法推动经济分化的，因此“强调经济分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搞新计划经济”具有一致的逻辑。只有旧的不断死亡，新的不断生长，才有可能出现新动能。将来，我们应该重点研究如何实现经济分化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经济分化来实现新动能。

（4）调结构要加减乘除并用。在去无效产能的同时，也要增加有效供给，培育新的发展动力。第十，宏观调控本质上是预期管理。

（1）权威人士的三次讲话都讲到了稳预期问题。

（2）稳预期就是稳政策。包括：大政方针不动摇（比如：中国现阶段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三个坚持：开放不变、民营经济保护不变、国有企业改革不变）、宏观政策不摇摆、善于进行政策沟通、提高舆论引导的可信度。

当前产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新对策（二）

2016年12月1日

经历了几个月的线上讨论，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已经形成了数十篇专家推文、专题讨论以及热点问题追踪，受到了政界、学界以及企业家们的广泛关注。应长江产经智库群广大群员的要求，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的带领下，第一期线下研讨会于2016年11月26日在南京金鹰珠江壹号国际酒店顺利召开。在此，我们诚挚地感谢前来赴会的各界专家、学者。

本期的推文我们对嘉宾们激烈讨论中的精彩发言进行了整理汇总，同时我们也欢迎未能到场的各界专家、学者们针对您感兴趣的主题，通过留言方式，与我们互通有无。

江 静（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秘书长）主持研讨会

【专题研讨（一）】产业理论研究

骆祖春（江苏省社科院）：

从2008年1季度至2016年1季度江苏及全国上市企业的财报分析来看：第一，江苏经济下行的趋势仍在延续，没有看出创新驱动对经济的主导推升作用。第二，ROE仍在下行，表明改革在企业层面的效果并不明显，或许今后几年会逐步显现，前提是政府和企业能够有效地参与到供给侧结构改革中来。第三，江苏新三板挂牌的优质企业数量多，且以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挂牌企业经营状况较好，融资能力不断增强，但与北京的挂牌企业相比较，还有不小的差距。

对策建议有三条：

- （1）破除“要维持中高速增长才能保就业”概念束缚；
- （2）给市县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一个宽松的“窗口期”；
- （3）扶持优质企业，扩大新三板市场企业上市数量。

徐 琴（江苏省社科院）：

江苏的政策对江苏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民生政策等方面。

第一，区域政策。拿江苏和浙江来比较，江苏在运用地方自主权和浙江是完全不同的，江

苏主要用在干活的权,用的是地方政府自己赤膊上阵,冲在一线的权力,而浙江用的是庇护的权,就是庇护企业和社会的创新能力的权。在上意和民意之间,浙江是民利优先而上意兼顾,江苏往往是上意优先而民利兼顾,江苏应该学习浙江地方政府这种行为逻辑。

第二,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应该补需方,而不是补供方。补需方实际上就是在培育市场,补贴终端消费者,还可以促进公平竞争,减少了企业和政府的交易成本和运营成本,防范道德风险问题。

第三,关于民生政策。民生政策现在总的判断是短板,补短板时要明晰,政府要兜底还是全包的问题,政府、市场、社会、资本关系怎么处理的问题以及中央和地方谁买单的问题。江苏要有民利优先、发展优先、民生保底总的原则。

郑江淮（南京大学）：

研究全球价值链,有两个主流的方向:国内的研究侧重中国嵌入低端环节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更多是中国加入价值链,大量的低端产品会冲击其国内的相关产业,造成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问题。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受中国低端商品制造的冲击,会导致国内大量低技能化的劳动力失业。但实际上学者们往往忽视了一个细节,就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高技能劳动力也会重新就业,从事研发、质量提升、新产品创新、新技术转化应用等活动。由于高技能劳动力市场竞争性比较强,随着更多的高技术劳动力的供给和低层劳动力的加入,产品创新和升级速度会加快。反观中国,2008年以后,中国的出口尤其是高端产品的出口始终增长缓慢,这种缓慢的原因并非都是由于低端分工导致。实质上,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机遇期时,西方也同时获得了产品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遇期,从而使得高端产品竞争力更强,成本更低,获利更多。中国目前要发展高端产品投资、要研发、要知识产权,成本都比较高,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实际上中国已经丧失了一个创新发展的机遇期。

陈爱贞（厦门大学）：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决定着中国的自主创新不能走技术引进模仿创新的道路。而应该在与国外企业和机构技术合作的基础上,从以发达国家企业机构为主转向中国企业为主。以汽车行业和高铁行业为例,这两个行业的市场规模需求发展速度非常快,也都是通过技术引进的模式发展起来的,但这两个行业目前技术、自主品牌发展目前是截然不同。这是由于两个行业的市场结构与引进技术的方式不同:汽车行业在全国市场是割裂的,国内竞争性很强,技术引进是以股权的方式,往往被外方掌控,处于劣势地位;而高铁行业是基于全球价值链模式引进,在跟外方谈判时,会处于有利地位,同时,有较好的国内价值链支撑,这种模式更有助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吴福象（南京大学）：

江苏省重化工产业主要在长三角沿江和沿海进行布局，目前，江苏全省有国家级化学工业园4家，省级化学工业园6家，市级化学工业园30多家。

针对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整体偏低、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等问题，江苏重化工业必须：

（1）以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为载体，按照产业链优化项目进行空间布局，形成特色化工产业集群。

（2）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大节能环保技术、工艺、装备研发和技改力度，根据重化工业行业属性和技术生命周期的特点，灵活采取共性的产业扶持政策。

（3）学习和借鉴国外重化工产业发展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强化江苏重化工产业公地的公共投入。

（4）抓住国企分类改革契机，利用资本市场纽带引导企业合理布局，实现规模经营和结构优化。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产业政策的范畴包括从研发到催生产品诞生、企业在市场上竞争到最终退出市场整个的生命周期。有四个窗口，第一个是技术机会窗口，第二是市场机会窗口，第三是环境机会窗口，第四是政策机会窗口。根据这四个窗口，形成三个失灵，一个市场拥挤效应。第一个是产业化机制失灵：有技术无市场，不能形成产业化。第二个是技术市场失灵：有市场无技术。第三个是环境供给失灵：环境问题形成的供给悲剧。一个市场拥挤效应，是指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制定，形成一种信号鼓励，通过信号给企业一种明确的指向，可能导致企业一拥而起，导致产能过剩，形成市场拥挤效应。政府要针对这三个失灵和一个拥挤效应，来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要抓住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发挥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巫强（南京大学）：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制造业去产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劳动力资源的转移问题。过去是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转移。但当前更加强调制造业劳动力要更好的向服务业转移，也就是劳动力要素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问题。

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可能是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推力，就是制造业要去产能，要安置下岗职工，要进行再就业培训等。另一个就是吸力，吸力就是一个行业发展空间要足够的大，要能够去吸纳新增的劳动力，包括过程中间转移过来的劳动力。而第二种力量对于劳动力从服务业吸纳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来说更重要，因为如果吸力很好发挥作用的话，推力也可以更好的发挥作用了。从服务业总体的投资总量上看，目前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上涨空间。

【专题研讨（二）】企业与产业发展

沈志强（建信信托）：

建信信托参与地方政府债务化解途径的实践与思考：（1） $1=1$ 。目前国家的地方政府债务还不是很高，通过地方政府债务的腾挪，一方面向平台下财政转移，另一方面以时间换空间，通过这种方法，总量没有变，但比较好的解决了政府的债务问题。

（2） $1+N>1$ 。这个主要做增量，我们建信信托在地方政府债务增量上做了一些尝试。①目前跟8个省国资委签订了国有企业改革基金的协议，通过对国有企业增资和管理模式改革的尝试来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提高资本化率，解决政府债务问题。②在十八大以后做了很多的PPP项目，PPP项目主要跟央企做了合作、并成立了产业基金，通过PPP项目的推进实际上也是缓解地方政府债务的一种模式。③最近我们也发现，随着汇率的上升和国家资本的外流，现在我国园区特别是江苏省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还有很大的欠缺，现在我们在香港设立了子公司，后续还会在海外设立基金以吸引海外资金投到江苏或者园区里面，投过来的资金主要做股权。 $1+N$ 做法通过提高企业的资本化率来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

（3） $1-N>1$ 。这个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债转股。建信信托和建行一起启动了“春雨计划”，通过债转股模式来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地方债务问题。

为什么建信信托在建行体系里能够这么做呢？①信托是一种投融资平台，银行是做投资、我们是直接融资；②作为建行的子公司，我们现在有一万亿规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③未来我们发展的方向是配合国家大的战略实现国民经济增长。

经过半年多，我也有点思考：①从江苏来讲，总体江苏债务化解压力不大，从全国来看仍存在债务化解难题，特别是有些地方又爆出来新的债务增长趋势，比如地方政府购买服务的过程中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②明年是PPP和政府债务爆发的一年；③市场化是未来政府化解债务的方向。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如何看待民营中国制造？

（1）很多人觉得民营企业就像是野草，通常情况下国家不会去种植野草，但是经常会在需要的时候去收割，甚至有时候是直接拔；因为是野生的，所以有时候听说可以治病就会连根拔起，更不会考虑在生产期或是幼苗期。

（2）成本方面民营企业除了工资，每个月需要额外承担社保及可能出现的过分保护的劳动者工伤赔偿，不仅与国际竞争的压力大，同时造成道德风险。

（3）民营制造业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他们不仅为国家交税，也为社会基层人员创造了就业机会，应该对民营企业给予肯定。

（4）民营制造业的生存能力很强，没有贷款会有民间融资；没有高科技资源但是会通过

不断实践自主研发；没有很高的文化知识，但是会很用心地经营。

(5) 除了几个发达的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其他地方的民营制造企业并不多，我国贫穷的地方还很多。我觉得稳住实体企业就是稳定社会、稳定老百姓。

(6) 去产能还是希望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在发展较好较稳定的企业中升级创新开发新产品，通过案例分享让落后的企业向发展较好的企业学习，同时检测并淘汰真正意义上的僵尸企业，把资源充分让出来给有需要的创业者。

宋文阁（江苏省国资委）：

研究中国经济，从哪个角度都不能忘记国有经济，但现有研究中对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研究较少。

(1) 国有企业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有企业“三去一降一补”任重道远。

(2) 国有企业的法人制结构，如何把法人制结构与党的领导融合起来、嵌入。

针对格力事件，我谈几点看法：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资委是管工资总额的，发工资不是随便发的；②在国有企业中到底是原则第一还是股东第一的问题。③关于混合制改革，现在这个混合制改革喊得很热，但没有多少成功的案例。④业绩考核薪酬体系，关于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薪酬体系到底多少是合适的。⑥国资运行平台，变化最大的是从过去的管人、管资产、管事到现在的管资本。

代中强（集美大学）：

我国企业出口中遭遇的知识产权壁垒：

(1) 2003年，华为公司被思科公司起诉，起诉最主要的原因是华为路由器产品的瑕疵跟思科公司的一样。

(2) 为什么2003年是一个节点呢？在美国的国际贸易当中，所有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一旦侵犯他的知识产权他就会起诉你，这个起诉是从1972年开始的，不过从1972年开始中间经历了3个阶段，其中1972年到1990年主要针对的是日本，从1990年到2000年主要针对的是台湾，从2000年以后主要针对的是中国。

(3)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中国的很多企业最喜欢做的就是模仿，所以美国抓住这个弱点，通过这个办法起诉你。

(4) 整个案件的特点我们发现，首先是涉案的种类非常广，我们查过HS编码的23类产品中有21类产品涉案，主要是机械产品；其次，报复措施非常缺乏；此外，主要涉案的是专利。

任保全（常州大学）：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质量及演变趋势分析：

(1) 很多人用定性的观点发现我国很多产业存在低端化的趋势，我以初始500家上市公

司的样本为研究，数据研究发现这种趋势实际上还是非常明显的。

（2）发现政策后 1 期（2009–2011 年）相对于政策前的生产率大幅下滑，是由技术进步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大幅降低导致的；而政策后 2 期（2012–2014 年）相对于政策后 1 期的生产率大幅下滑，却是由规模效率下降所带来的技术效率大幅降低导致的。显然，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明显的生产率下滑趋势。

（3）这种低端化发展趋势，将导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容易被国际大买家所掌控的 GVC 治理结构所俘获于 GVC 低端，这会使得所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沦为“两头在外”、技术设备依赖国外进口的“新瓶装旧酒”的高新技术产业低端环节制造商，又走进了中国传统制造业低端化发展的怪圈。

崔卫东（蓝鲸咨询）：

“传统产业”全球化机遇与战略路径：

（1）江苏与深圳的对比，深圳市委书记说 2020 年他本土企业有 8–10 家世界五百强，我说 2025 年江苏省大概有 15–20 家世界五百强，从哪里产出呢？我研究的江苏省 120 家企业当中 1000 亿以上的 8 家，其中达标的 4 家，申报的一家，这一家去年是后退的，退了 34 位。还有 110 家百亿企业，其中有 20 家左右的苏州、无锡企业，他们在 300–400 亿之间徘徊，这些企业在最近的 6–8 年时间完全可以过千亿的。

（2）我觉得全球化是一个很好的道路，可以从以下方面做工作：打开企业家的天灵盖（全球视野）、跟上国家战略、制造体系走向高端。

（3）官员如何做：把 GNP 与 GDP 作为评判官员的基本政策；地方政府合作；退出资金再投资的优惠政策。

杨 锐（苏州大学）：

企业创新与城市合作：

（1）重视城市的产业政策，通过城市经济实现供给侧的结构改革。支出法的 GDP 放入到城市的维度去理解，更加具有增长含义；产业政策有国家、省、市层面，但产业政策最后的落脚点和执行层面一定是城市；产业政策是为了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大多数企业集聚在城市，且生产行为受到城市空间约束。

（2）立足于城市的产业政策，促进城市的及时创新和城市间贸易，调整城市产品供给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支出法 GDP 放到城市包括两大维度，一种是城市内部三大主体（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支出，另一种是城市间的纯贸易，这一部分可以刻画城市供给侧的产业结构特征，城市产业政策可以改变这个产业结构特征。

（3）通过产业政策实现城市的及时创新，把进口的产品本地化，满足当地消费者需求特征和支付能力。此外，由于本地化后的生产产品和进口产品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本地化产品要

通过城市产业政策实现城市间特别是发展水平相似的城市之间相互贸易，为本地化产品提供市场。通过及时创新和城市间相互贸易，逐渐实现进口产品的本地替代，形成城市的自我内生增长过程。

周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将人口集聚作为南京都市圈提升的核心问题。（1）为什么要考察人口问题对都市圈的影响呢？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是新常态中的一个问题，新常态是顺应经济规律、应对长期性与根本性经济增长条件变化的举措，在其中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其次，在之前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研究中很少将人口问题考虑当中，特别是人口对企业影响研究甚少，但实际上人口对这些问题存在较大影响。

（2）我们的研究发现：人口对当地企业的效率有很显著的影响，传导机制主要是由于中间产品的专业化导致的，对南京发展先进制造业来说，由于存在中间产品需要高度的分工，这种分工特别依赖于人口的集聚。

王世文（苏州科技大学）：

影响产业转移关键因素的新趋势。

（1）为何研究这个内容：从 1.0 到 4.0，从美国的再工业化，特别是特朗普当选之后的政策变化，微观机理特别是从经济学的利益角度和资源配置角度如何分析？

（2）宝马持续了 25 个月盈利增长 8%；增长最快的不是在德国、而是在美国；宝马的 EBT 在汽车行业能够达到 10%，这个是很高的，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情况呢？

（3）宝马的生产被媒体称为德国最接近 4.0 的样本。其中最典型的是在莱比锡的投资；其 2005 年就开始投资生产，自动化程度高达 98%，实现了设计环节的智能化以及生产环节、供应链环节全自动化，他的特点是在 4.0 环节中代替了平台，带来了流水线的重新分工，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等等。

（4）宝马有较强的洞察力。推动了机制创新和风险投资。4.0 之后，微笑曲线并不适用于宝马的生产模式，其协同模式不再是链状模式。

（5）没有信息化就不会开启信息全球化，现在的模式下，未来的产业转移、要素和比较利益在哪里？决定因素在哪里？

李刚（南京大学）：

产业发展呼唤一流产业智库：

（1）在高端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咨询业是整个服务业当中最高端的产业；智库是咨询业中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很重要，可以带动很多的就业机会。我国的智库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江苏省要高度重视智库产业，不仅要高端智库，还要发展社会智库。

（2）智库发展问题：①很难发展成市场产业，相对比较保守，特别注意政治性，思想不解放很难做智库；②江苏省总是比深圳慢一拍，深圳现在在搞智库产业园，很重要的一个措施是放开“民非”组织的注册，在江苏注册一个民非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智库供给方面的问题。

（3）对江苏而言，虽然智库不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但是非常重要。江苏省应该以智库的名义发展一批成规模的咨询业，高度重视咨询业特别是相对弱小的智库产业。

【专题研讨（三）】具体产业的问题与对策

蒋乃华（南通大学）：

目前沿海三市发展中没有统一的政策，因为各级政府不是简单的政府，而是竞争主体，有时是沿着行政边界发挥作用，而有时又是替代了整个市场。特别是公共产品的产业政策，它实际上是为产业当中的企业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产品会因产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呈现非线性的演变。如果公共产品的边界与行政边界重合，就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当不重合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强的竞争性，造成公共产品供给出现过剩。要实现有效的政策目标，就必须协调好各级政府要素供给手段的运用。

唐启国（南京社科院）：

养老产业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主要在于规模小、发展水平低、不规范。目前养老产业的供给严重滞后于需求，无论从投入还是从市场盈利来说，都远远比不上婴幼儿产业。出现这种情况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公益性与趋利性之间的矛盾。因此，相应的对策就在于：一要正确处理养老产业的公益性与趋利性的矛盾，构建有利于养老产业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二要推进养老产业的融合和集聚发展，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三要提高社会支持力度，促进养老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周 斌（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仍需依靠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的持续扩大，这些部门是投资的主要方向，但不能因此认为就不需要互联网+、大数据、特色小镇等一系列新型经济模式。实际上，互联网+、大数据等这些智慧产业已经开启并引领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谋求经济新发展必须要抓住这一有利契机。智慧产业对城市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依城促产、以产促城、智慧兴企、智慧兴业。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我国新能源汽车主要依靠大研究项目、各类补贴推动研发和生产，缺乏健全的创新机制，

以及激励创新的机制，要素效率很低，冗余严重。新能源汽车属于耐用消费品，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绿色消费意识的兴起，国内消费能力提升迅速。但是新能源汽车激励机制缺陷很大，比如政府以整车补贴为主，不仅扭曲了价格机制，还容易诱致“骗补”等不良现象。随着现有补贴不断退出，利用本土市场升级驱动新能源汽车创新具有现实意义。如何链接新能源汽车研发和市场需求？不仅要靠政府采购，而且要对消费者进行激励，通过市场竞争效应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

冉玉红（慈铭体检）：

大健康医疗产业从大的方面来进行分类，主要包括健康体检产业、健康保健产业和养老产业。从国内外发展差距来看，大健康产业在我国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至今为止更多地仍然停留在炒概念、搞虚拟经济方面，发展得并不是很理想。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个行业缺乏“操盘手”，即缺乏高质量的人才；二是社会对这个行业的定位不足。只有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大健康产业才能发展壮大。但在这当中，也面临着市场化竞争和资源整合的难点。此外，专业的医疗设备研发和制造能力也是制约我国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黄繁华（南京大学）：

中国经济的产业发展正在面临重大的外部环境改变。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着持续低迷，而这种低增长态势并不是由周期性因素所造成，而是由结构性问题所引起。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各国间所引发的利益冲突问题，目前几乎难以看到可以解决的方案，这实际上反映出，不仅结构调整的力量不足，而且引起世界经济震荡的力量正在积聚。比较典型的例子，如英国脱欧。此外，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两种新趋势，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贸易增长速度在下跌，但国际直接投资（FDI）快速增长）和逆产业化。因此，我国未来的产业发展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改变过去那种参与全球化的传统模式，从开发战略向全球战略过渡。

史先诚（江苏省金融办）：

“三去一降一补”是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在这当中，降成本的一个重要着力方向就是将小微企业的税收给降下来。但是这样一来，有人会担心税源问题。实际上，如果能够解决目前的众多偷税漏税问题，给小微企业减税基本上不会对财政收入造成太大影响。那么，这就需要搞清楚这些税都漏到哪里去了，都是怎么漏的。这里面涉及到税务机关的选择性执法问题，严重影响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因此，要真正实现企业税负负担的减轻，从而实现降成本，必须要进行政府税收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

刘晓昶（华泰证券）：

随着人口结构拐点的到来，人口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2008

年以来，政府“四万亿”公共投资导致许多产业的产能过剩状况更加严重。那么，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动力在哪里？我认为，除了依靠制造业高端化之外，其实更多地还可以依靠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在整个市场中重点配置的流向，来研究经济增长动力问题。

据个人观察，觉得有可能出现新动力的领域：

一是传统产业再生，如钢铁、机械等传统产业通过更加精细化，寻找到市场的生存缝隙，从而实现再生；

二是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比如互联网+、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方面；

三是消费升级，如旅游、教育培训、游戏传媒等；

四是健康养老产业等。

【自由讨论】智库建设与发展方向的建议

丁荣余（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我认为现阶段政府对产业的支持以及如何发挥政策效用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有两个感觉：第一，财政的钱怎么合理的分配是一个问题；第二，想要找到一个好的企业项目很难，资金投放到企业之后效果如何无法监督。因此我认为，智库可以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相关的深入研究。另外我认为智库的研究应该更具针对性、专题性、实感性，例如通过小型专业研讨会的方式，或者现场调研、探讨的方式，打通思想部门和决策部门。

刘剑（金橙投资）：

我认为产业政策也好、产业方向也好，到最后项目落地以及价值体现的过程中，缺少操盘手。各级政府的领导层和部门的决策意见如何在企业层面和实操层面落地，应该是未来智库的一个研究方向，因为智库的研究不应等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或者是政府工作报告，所以我认为智库可以更多的站在微观企业层面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从智库的功能拓展角度看，我认为未来智库可以向咨询发展，通过咨询可以听到大量一线企业、政府部门内部真实的声音。

毛丰付（浙江工商大学）：

我提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专业化。从我自身的感受我觉得我们智库现在谈论的话题比较多，但是长远来看，我建议形成几个有竞争优势的方向，进行长期的、系列的深入研究。第二，前瞻性。通过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一些头脑风暴，提供一些未来短、中、长期的前瞻性报告。第三，

积累突发性储备。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进行研究，并储备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冉玉红（慈铭体检）：

我有两个方面的建议：第一，以后的研讨主题可以相对聚焦，提高专业性、思想性；第二，我认为可以纳入一些大型企业里有热情的企业家，将企业家和学者的优势结合起来。

崔卫东（蓝鲸咨询）：

我建议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能够出一个持续的研究报告，主要向社会发布对未来3-6个月世界经济形式、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地区经济的判断。

沈志强（建信信托）：

第一，我觉得智库需要有一个实体化的运营模式，包括人员规划、办公地点等方面，这样有利于我们智库发展成为一个真正高端的智库；第二，我觉得智库在刚开始运行时，可以选择一些金融、投行、产业领域中的大机构进行合作；第三，我觉得长远来看，智库需要建立自己的品牌，以建成国际知名智库品牌为目标。

最后，刘志彪院长总结道：

结合我们长江产经智库建设初期的定位，加之我们的研究精力有限，因此我们希望学习国外智库先进经验，给高层提供政策建议，而不是为了咨询。另外，智库建设最重要的是人才建设，人才不在于多，而在于真正能为智库所用，我们希望更多有家国情怀的人加入我们智库的研究团队。

产城融合创新：江苏版特色小镇的建设方略

2016年12月12日

编者按：江苏省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提出聚焦特色小镇培育发展，要将该项工作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途径，作为改善镇村人居环境、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培育打造出100个左右产业、文化、旅游、风貌特征鲜明且多元发展的特色小镇。

江苏省委研究室储胜金处长提出“研究江苏版特色小镇的方略，需要的是从产业与城镇创新发展融合发展的角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据此引导群内各行业专家、学者展开讨论、提出建议。

产城融合创新江苏版特色小镇的建设方略

刘志彪（长江产经研究院）：

浙江版的特色小镇，是相对独立于市区，有明确的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色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规划面积一般在3万平方公里，建筑面积控制在1万平方公里。

浙版的特色小镇出现的基本背景，主要有4点，跟我们要创新发展的江苏版的特色小镇对比来说，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同。认识这些异同，是研究江苏版特色小镇的前提：

1、浙江空间资源严重瓶颈。浙江土地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为全国的1.10%，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而且是七山一水两分田。江苏国土面积10.72万平方公里，占中国的1.12%，人均国土面积在中国各省区中最少。但是江苏地形以平原为主，平原面积占江苏面积的70%以上，比例居中国各省首位。因此，如果说浙江所有的政策无不是试图利用最小的空间资源达到生产力最优化布局，那么江苏省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但是应该看到，因为拥有更为辽阔的平原和优良的交通运输条件，所以江苏省发展大规模的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区、科技城等标准化的制造业，更具有良好的条件。

2、浙江利用特色小镇对供给结构进行转型升级。浙江把特色小镇的产业特色，定位为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以及某些茶叶、丝绸、黄酒、中药等历史经典产业，江苏大规模工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在于广大的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区、科技城等产业集聚区，特色小镇不是不可以搞，而是应该主要对原有产业集聚区进行特色化升级改造，如在开发区对

产业进行改造，增加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

3、浙江搞特色小镇是为了破解高端要素聚合度不够的弊端。他们通过特色小镇聚集创业者、风投资本、孵化器的高端要素，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等耦合，而我觉得江苏集聚高端要素必须通过扬子江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来实现。一些后发展的特色小镇，在江苏可以作为旅游文化小镇、历史经典产业小镇来打造，它们承担不起率先在全国建成创新驱动省份的重大任务。

4、浙江搞特色小镇是为了加快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改善人居环境。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建设特色小镇，实现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建成“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新空间、新兴社区。江苏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搞乡镇工业，其实已经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开始破解二元经济结构，但是那时候的乡镇工业只有生产功能，没有生活和生态功能。二十世纪90年代搞的各种高新区、开发区，也还是只重视生产功能。现在必须补上生态和生活功能，但是形式不一定非要采取特色小镇的方法，而是再城市化。

浙江特色小镇的几个特点必须明确：1、不在偏远的农村，也不在城区中心，而在靠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郊区；2、不是国企也不是外企，而是民营企业、企业家、民间资本集聚；3、产业特色是特色小镇的主体内容，不是大规模、标准化的制造业，而是主要涉及新兴产业和时尚产业；4、主要吸引年轻人，年轻的技术人员、技能、技艺人员；5、特色小镇不是高楼大厦建筑，建设密度低，适合年轻人口味，走时尚路线，适合创业者生活口味。

王世文（苏州科技大学）：

观点一：特色小镇可以发展，但不能向浙江省学习，一纸命令，镇镇特色，量化考核。这是典型的大水漫灌思维。观点二：特色小镇成功的比例及规律并无研究，事实上浙江很多小镇为完成指标，苦不堪言。观点三：江苏和浙江发展基础与环境相去甚远。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要大肆追求地方利益和地方政绩的特色小镇。一些地方发展特色小镇，是为特色而特色，是为特色小镇拿下后的财政补贴、融资需求、土地要素保障等利益驱动。当然，这些确实是激励因素，但不能为了取得这些，而去编离奇的故事。

二是试点推广的时候要坚持刚性执行，避免特色小镇的主要标准执行走样。一些特色小镇无中生有，盲目拼凑，没有特色的主导性，没有主导性的特色载体，硬是要上特色小镇。同时也要看到，确实有部分不那么具备特色的小镇却拿到了特色小镇，这必然会带来特色不再，必然会使特色小镇的美誉度和可信度下降。

三是处理好小城市、中心镇和特色小镇的关系。在经济发达地区，早期的一般建制镇后来升格为中心镇，包括市级中心镇、省级中心镇，这些中心镇本身就是坚持“一镇一品”的产物，确实具有一定的特色，之后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中心镇又成为省级重点培育的小城市试点镇。但

在中心镇布局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那就是部分具有明显产业特色和旅游功能的建制镇没有入选中心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开辟特色小镇建设试验区，是对以往政策失灵的一个有益补充。同时，对中心镇、小城市的培育置之何种位置呢？是取消？是用特色小镇取代中心镇和小城市培育么？个人觉得可以共存，互促并进，交相辉映。

四是因地制宜，真正把有特色的小镇选出来、包装好、建设好，并切切实实的发挥特效小镇的示范带动效应，特别是在镇域经济转型升级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今后，在全国旅游版图中，建议增加特色小镇旅游线路，大力发展“旅游+”经济。

特色小镇建设：一是有特色的“特”，就是具有比较优势的，甚至是绝对优势的资源禀赋、主导产业和人文环境。二是特色小镇的“色”，就是要绘声绘色地发展，要有消费者和游客可看的看点，要有吸引游客的人文景观、历史文化。三是把“特”和“色”结合起来，形成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发展及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特色区块。

拓宽思路，特色小镇只要有特色，有内涵，有社会消费需求，就有一定的生命力。比如某地建成了特色小镇，能把上海、北京、南京和杭州人吸引过去，每年过去休养几个月，能做到就可以是特色小镇了。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发展具有创新活力的小城镇，可能更适合。

建设江苏版特色小镇的关键环节离不开以下两点：其一，是特色创新人才的集聚；其二，是迎合对特色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只有满足以上两点才能保证特色小镇活力，实现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按照这个逻辑，那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两个要点的实现机制。

首先，在创新人才的集聚方面，应重点考虑特色小镇的特色人才需求，为特色人才提供相应的创新生态环境。如特色小镇不能离核心城市较远，交通便利，保证子女教育，消费娱乐配套措施健全等。

其次，在特色市场需求方面，应该特在细分市场。如果市场重叠就会造成同质化竞争，一窝蜂而上的问题。在划分市场时也应注重市场的虚实结合。以线下为主的实的市场应加强特色小镇的绿色生态建设和传统文化、传统产业特色的挖掘。而以线上市场为主的虚拟市场则应避免和浙江互联网小镇的正面竞争，在建设这类特色小镇时，应加大政府的支持和宣传力度，注重培育和建设。

何雨（江苏省社科院）：

在特色小镇上，存在专家的知识供给与地方政府的实践需求严重脱节的问题。专家感兴趣的是抽象出共性的东西，然，共性对地方并没有用，地方需要的是个性方案。真正有价值的是个性，专家们却无法定位与解决。

特色小镇，绝不能搞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典型的计划思维。在实践中，就是简单的复

制移植，南橘北枳，是必然的。

搞特色小镇，我认为，就是放权与容错。放权，让地方政府自主干；容错，让地方政府大胆干。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是未来的技术趋势，特色小镇可借助这些新兴技术找特色，江苏一些村镇在发展电子商务上已有特色了。

小镇不仅需要基础设施，还要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就是要建成智慧小镇。小镇还要有助于服务和提升三农。

江苏的城市已被制造业锁定，创新转型难度大。可通过培育一些创业创新型特色小镇，发展新兴技术产业。现在国家鼓励城乡民众创新创业，小镇可作载体。

如果建设的好，传统和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发达，加上环境优美和低房价，这种仙境能够吸引人口和人才。

吴继冈（常州市发改委）：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研究的话，那么特色小镇的发展方略与城市的发展方略还有什么区别呢？

从江苏各区域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等方面来看，虽然各区域间有所差异，但基本是雷同的。一定要冠以特色小镇的名义来发展，有点勉为其难。其实任何地区的发展，只要遵循因地制宜、资源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的原则来发展就可以了。现在的关键是各级政府管理和考核机制就是一刀切，根本无法实现区域内自身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所以要避免区域间的同质竞争。特别要防止省政府在特色小镇发展方面下指标，搞评比。可以引导，严防死揪！

浙江的特色小镇建设得有所成就，也是长期以来不断研究、实践，再研究、再实践，不断总结积累，不断完善提升而发展起来的。江苏建设特色小镇，要发挥后发优势，是要从加强研究起步的。不过研究的再好，没有实践活动的支撑，最后还是没有成果的。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特色小镇刚刚兴起，要防止刮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认为，江苏版特色小镇建设要从供给侧结构改革视角来讨论，其着力点是“补短板”：

1. 补新型城镇化建设短板。江苏是省级试点，承担 800 万“转户”指标，特色小镇应当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将“转户”与城镇建设、住房、就业、社保、生态保护等统筹考虑，打造新的中心区。

2. 补产业发展短板。江苏三次产业发展，一是深化，二是提升，三是融合，特色小镇应当整合本地资源，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特色产业为基础，创区域品牌，培育核心竞争力，实现集约化发展，打造新的产业集聚地。

3. 补民生短板。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脱贫是江苏更高水平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难点，特色小镇应当以“聚焦富民”为目标，推进市场开发开放，提高居民工资、经营、财产等收入，打造新的收入增长点。

4. 补区域发展洼地的短板。江苏苏北发展必须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特色小镇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点，应当以此为载体，加大引进资金、人才、技术、智力等的力度，优化区域空间布局，打造新的要素聚集地。

蒋青云（复旦大学）：

浙江特色小镇 1.0 版是市场自发形成的，比如义乌，柳市等；2.0 版是产业转型与互联网的时代的机遇带来的，有政府规划之功，更有资本推动之力，如云栖小镇等。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特色小镇建设的关键在怎么样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说要有造血功能，很多特色小镇建好没几年就衰落了。有几个建议：

一是特色小镇需要打造核心竞争。从目前成功案例来看，围绕旅游和特色新兴产业做文章是重要突破。旅游可以带动配套商业，增加造血功能；特色新兴产业有利于实现良性循环。

二是提高特色小镇与当地其他资源的协同效应。由于特色小镇自身集聚效应有限，必须要依托当地其他优势资源，形成协同效应，否则很难持续发展。

三是特色小镇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结合。特色小镇不仅自身要有特色，可持续发展还在于人口集聚能力的提高。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在新型城镇化方面给予更多配套支持。

毛丰付（浙江工商大学）：

江苏适合搞大兵团作战，浙江适合搞各种突击小分队。先进制造业是江苏产业的主攻方向。浙江的特色小镇说穿了还是走专业化经济的道路，加上了生态的外衣。

司增绰（江苏师范大学）：

特色小镇并不是城镇建设有特色，而应是文化、历史、人文、产业有特色，要有特色城镇的核心内容。这些特色内容是小镇发展的基础，无论是农村特色旅游服务业、一村一品的手工业，还是富有特色的农产品加工业，都要立足本地人力禀赋、技术禀赋、自然资源禀赋。

特色城镇建设可以与当前国务院提出的鼓励返乡农民创新创业结合起来，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特色城镇建设是当前江苏经济工作的新抓手，浙江经验肯定需借鉴，但不可复制、照搬，也不可标准化，以统一指标考核。

特色城镇建设的核心是产镇融合，一定要有产业，要有就业，以特色支撑产业。

姜彩楼（南信大）：

与自然的分散村落相比较，小镇具有一定的集聚性优势，比如提供邮政、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承担周边地区交易的功能等，具备了相对完善的生产生活体系。特色小镇的形成，往往是历史、文化、科技和产业共同刻画的结果，具有鲜明的特征。从历史的维度看，早期的河津渡口，车马驿站，以及一些传统手工业小镇等，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历史韵味浓郁，是还原历史生活场景的理想场所。有些小镇依托于文化名人，或者历史文化名街，打造旅游文化小镇，比如英国的莎翁故居，牛顿故居的苹果树等，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旅游热点。科技小镇主要是依托高科技打造的引领未来发展的特色产业，这类小镇可以独立存在，也会嵌入到都市区中，比如最近兴起的互联网小镇、各类创业园、创意园等，能够诱发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或者直接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各级政府较为重视。目前存在比较多的是产业型小镇，大多依托本地资源、市场和传统工艺，涵盖传统工业、休闲养老、现代农业等，在本地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建设特色小镇要深刻领会工业经济与新经济的区别。工业经济是规模型经济，需要大投资、大市场，新经济更加灵活、网络化和多样化，二者的运行机理差别较大。在江苏的特色小镇建设中，应该识别、区分不同小镇的特色和资源，发现增长潜力，具有前瞻性展开建设。应该做到：

第一，在小镇的规划、设计中体现技术含量，与自身的品牌、底蕴和资源要匹配，应该多考虑国内、国际较为成熟经验，避免千篇一律、简单堆砌。

第二，小镇的建设开发要遵循经济效益原则，除了少部分要体现历史文化和科技创新的项目以外，要考虑投入和产出的效益，采用经济手段避免形象工程。

第三，小镇的建设要面向未来的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灵活运用现代科技，对本地产业要融合引领，对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要有所促进。

刘晓昶（华泰证券）：

对于产业集聚、产业升级的平台，形式可以多样，可以是特色小镇，也可以是特色创新城市、特色产业区、特色小城等。打造特色小镇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创新的主题，有主打的特色产业，如金融、信息、影视、游戏、旅游、机器人、高端制造等。

2、有符合产业需求的基础设施条件，如美国格林威治小镇吸引对冲基金所必备的地理位置、电力、信息网络条件；同时最好有一定的资源禀赋，可以结合当地有特点的自然、人文资源并进行充分利用；

3、有高效灵活的机制、宽松优惠的政策，吸引创新、创业者聚集而来；

4、提供生活、生态环境条件，满足居住生活工作所需。

5、综合考虑特色小镇与附近特色创新城市之间的关联及功能定位，如科研、创新、教育、

医疗等服务如何安排。

可以先以优惠政策吸引创意人才过来，再为其量身定制各项基础设施和服务。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从就业而言，一地过于单一的行业不仅不利于吸引人才，还容易造成过大起伏。不要清一色都是男性主导产业，要有合理的产业组合。如果是在乡镇，还有考虑职位与农民农村生产之间有效衔接。

孙军（淮海工学院）：

从时间、空间两个层面上看特色小镇建设：从时间层面看，必须与经济历史特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转型升级方向相结合，尊重路径依赖特征，尽量避免另辟蹊径，最好就是锦上添花，做支撑。另外，有些产业只有在当地经济水平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才具有比较优势，不可跨越去选择；从空间上看，既要区域的地理特征，也要看与中心城之间的关系。平原多的地方显然适合大规模化经营模式，与中心城越近的区域越适合分担中心区域的特定功能，越远的地区适合发展具有当地特色产业，例如各色旅游等。据此，江苏下一步特色小镇建设：

一是尊重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越高，特色越明显，市场化的作用就会越大，就越应尊重市场的力量，政府要自身定好位，做好配套服务，机制要活；

二是发展中心城区配套产业，例如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养老产业等；

三是在具有独特资源禀赋的地区打造旅游、温泉等特色产业。

刘根荣（厦门大学）：

理解与把握特色小镇建设的内容与机制，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考虑：

首先，要明确特色小镇建设在推进江苏城镇化建设中的性质与定位。本人认为，特色小镇建设是全面推进江苏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以长江沿岸为核心的城市群建设是江苏最重要城市化建设工程，但广大的小城镇如何发展，形成比较均衡的城乡发展格局？显然，特色小镇建设可以提供一种可行的发展模式。通过政府部门的筛选，由财政资金重点支持一批特色小镇建设，在广大的江苏非中心城市区域形成优质要素、特色产业的聚集区域，实现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

其次，特色小镇建设的重点要明确。特色小镇建设的重点是建立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特色小镇的建设一般理解在于“特色”二字，从字面意义而言似乎没有问题。其实，特色小镇的建设关键不在于“特色”二字，而恰恰在于一般市场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必须明确，特色小镇建设的主要机制是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吸引优质生产要素在特定区域的聚集，形成特色产业的聚集。这里必须强调特色小镇建设的一般机制，在制度层面形成可以复制的模式，这样特色小镇建设才具有普遍意义与可复制性。

最后，特色小镇建设要因地制宜。各地区要根据自己的优势要素、优势产业、历史文化等因素来选择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不要将特色小镇建设看成地方取得财政资金的钓鱼工程。

江苏是否适宜推进特色小镇建设？本人认为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江苏城镇化建设步骤。江苏虽然地理区域优势不同于浙江，有自己的大城市发展战略，但这并不能成为江苏拒绝特色小镇建设的理由。江苏还有大规模的城郊与小规模城镇，它们的发展也应纳入江苏省政府的规划。讨论的重点应该是在于特色小镇建设模式，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从客观角度而言，在政府推行特色小镇建设计划之前，各地小城镇的发展就已经具有自己的特色。政府所做的只是将选定的小镇的特色进一步提炼优化，并从机制上促进优质要素集聚，发展特色产业，形成独特的“产、城、人、文”的融合。政府可为的是优化小城镇建设的制度环境，提供制度激励与必要的公共产品，但不可以大包大揽。尊重市场规律，健全市场环境是政府建设特色小镇的重点。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特色小镇的政策背景：“特色小（城）镇”的灵感来自于国外小镇，其概念在2015年的浙江省两会上率先被描绘。但“特色小（城）镇”并非浙江首创，其在中国的历史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开始的小城镇建设实践。“特色小（城）镇”得以在全国层面推广，源于在2012年底的十八大报告中，本届中央政府将“新型城镇化”作为打造经济新格局的中心任务之一，和今年3月国务院将打造“特色小镇”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伴随今年7月《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和10月《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两份文件的相继出台，“特色小（城）镇”建设已然成为2016年下半年中国区域经济实践最炙手可热的一道风景线。

特色小镇要解决三个问题：为什么特的问题，特什么的问题，怎么特的问题。

一、为什么要搞特色小镇

1、作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特色小（城）镇”有城市的一面，实际上是乡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不能仅有大中小城市，而没有乡村的中心：“特色镇”。

2、随着中国农民“离乡不背井”外出务工群体的日益壮大，不仅中国农村正日益凋敝，中国小城镇也正日益衰落。不仅是产业和人口正日益向中国大城市集聚，疏解中国大城市病和缩小城乡差距扩大问题也正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头等需要解决的重要难题。因为小城镇比城市低一层次，比农村高一层次，但是又与农村和城市紧密相关，是由农村向城市过渡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农村越是凋敝，小城镇就越是衰落，小城镇越是衰落，农村也就越是凋敝。另一方面，农村和小城镇越是衰败，大城市病就越是严重，大城市病越是严重，农村和小城镇也就越是衰败。从这个意义上，也需要在中国发展这一过渡形式的社会实体：“特色小镇”。

3、中国的小城镇集聚是一种内源式发展导致，费孝通将其叫做“离土不离乡”，也就是农业人口就近被城镇工业/小手工业/服务业发展所吸纳。这其实就是所谓乡镇的企业、特色

农业、旅游业等的兴起，由于各地政府发展理念和资源禀赋不一样，其乡镇发展模式自然也就不一样，因此自然形成“特色小（城）镇”。

4、现在重新提出建设中国区域各具地方特色的小（城）镇问题，是为了满足政治需要，还是经济需要？是为了带动农村发展，还是消解大城市病？是为了争取资金，还是解决人的城市化？是为了稳增长，还是为了产业转型升级？“特色小（城）镇”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语，分为两个部分：“特色”和“小（城）镇”。先有“小（城）镇”，再有“特色”。只有先解决了“小（城）镇”的问题，才能解决“特色小（城）镇”的问题。只有先解决了“特色小（城）镇”的“为何特”的问题，才能再解决“特什么”和“怎么特”的问题。按照《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特色的“小（城）镇”包括特色小镇和小城镇两种形态，既可以是创新创业平台也可以是建制镇。结合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实践困境。个人认为，“小（城）镇”的发展急需发挥消解中国大城市病的人口密集、土地贵、重污染和交通堵塞等社会经济难题，“小（城）镇”的发展也理应被赋予担负实现中国三产互助、产城融合、农村人口城市化、城乡和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乃至创新驱动省域经济重大任务的期望。

二、特什么问题

“特”是指“差异”，是指“创新”。小（城）镇的“特”主要体现在“产业特”，包括“产业强”、“产业活”、“产业差异”和“产业创新”。无论是打造创新创业发展平台，还是打造新型城镇化有效载体，特色小（城）镇产业核心特色都指向一点：“新”。因此，特色小（城）镇要坚持“产业建镇”，可以发展农业，也可以发展工业，还可以发展服务业，但重要的是发展新型农业、农业新业态，新型制造业、工业经济新业态，新型服务业、服务业新业态。考虑到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又考虑到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江苏的特色小（城）镇要以发展新型农业和服务业、农业和服务业的新业态为主，比如发掘、培育和发展当地各具地方特点的民俗文化、休闲旅游业等。

三、怎么特的问题

1、江苏建设特色小（城）镇，首要的问题是要解决农村和小城镇衰败问题。只剩留守老人和小孩的农村和小城镇，无论如何是谈不上特色小镇建设的。因此，在江苏特色小（城）镇重点培育对象上，政府要把培育的重点放到完善城镇功能，补齐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短板上。尤其是要破除阻碍江苏服务业发展的制度因素，围绕“人的城镇化”和“花钱的城镇化”，以解决异地农民工市民化 / 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和城乡公共福利均等化为内容的新一轮城市化有必要尽快展开。

2、“产业特”要求重视地方差异，重视地方历史和文化。因此，在发展江苏版特色小镇上，江苏的强政府特点要体现在强引导、强宣传、强公共设施、强生态和强服务上，行政力量不能过多介入小城镇的内源式发展，否则，任何的故意打压和拔高，都容易导致一刀切，伤害城镇发展的差异性，消灭城镇发展的特色。

3、“产业特”要避免对特色小城镇进行事前规划，更要避免将特色小镇与政治和官员晋升级挂钩，而要改为设立培育期，进行事前引导、事中鼓励地方自主发展、事后进行评价以

及提供资金和优惠政策奖励。

4、“产业特”既取决于市场需求，更取决于空间位置和要素供给。特别是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在哪里布局以及如何布局，不可能由政府来决定，而是企业的事。因此，发展主体不能是政府主导，而应该是以市场运作为主，以对市场敏感的民营企业为主。发展的特色产业不能是背离本地历史文化遗产和与本地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无关的创新型业态和产业。

5、打造特色小（城）镇也要重视舆论宣传。比如，扬州的“湾头镇”，靠近城区，其本身是古镇，地临运河，历史气息浓厚，那边的玉器很有名，很多人家做玉器，是玉器小镇。但很少人知道；靖江的机电和船舶产业集中，尤其是船舶产业，自古发达，靖江的汤包因为上过“舌尖上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小镇，但也是很少人知道；相反，徐州的大沙河镇，把发展特色农业和旅游开发结合起来，用特色农业来带动小城镇的经济发展，然后小镇发展的好又反哺农业。比如他们通过举办梨花节、农家乐、水果采摘、农产品展销会等，不仅吸引游客加速经济发展而且还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农业发展的好，小镇居民也得到实惠，奔小康。那个镇就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优势和适宜果树生长的地质条件优势，但重要的是通过镇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宣传和组织，大沙河镇已经发展成为江苏现在远近闻名的苏北特色小镇。

陈琛（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就我们的调研提出一点看法，特色小镇，是不是特点在产业和生活功能的融合形式上，传统的单调枯燥的工业园区难以满足年轻人工作生活娱乐的多元需求，我们在珠海的一个园区看到，园区距离城市十几公里，生活娱乐设施匮乏，依靠班车接送，最后是大量年轻人流失。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我也谈谈支持特色小镇建设的体会。早在“一带一路”提出前，我们支持苏州吴江的震泽镇建设丝绸文化创意产业园，连续三年的支持和发展，该镇被评为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且是唯一的中国丝绸小镇。浙江的丝绸产业也不错，为什么震泽能脱颖而出呢？

一是产业特色明显。有一批重点企业支撑，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本地经济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产业特色的基础。非遗产品，缂丝、刺绣等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创新等构成了震泽丝绸产业的核心力。特色小镇特在产业和文化上！

二是做好丝绸产业的融合和延伸文章。丝绸产业是文化底蕴深厚的产业，当地政府结合茧丝古镇的文化挖掘和保护，形成了一批文化亮点。每年开展“蚕花”节，蚕丝文化的影响力扩大。开发以茧丝绸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延伸蚕丝绸产业链，开发生产品。通过融合发展和延长产业链强化了特色。

三是顺应了“一带一路”的提出。没有“一带一路”的提出，可能震泽的特色小镇建设没有这么顺利！特色小镇建设要顺应大势！

周 斌（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1、首先理解特色小镇：

1) 小镇的理解，分农村的小镇、城乡结合的小镇、还有城市里面的新城等，这个根据不同的类型，首先大类就决定了特色小镇的总体定位，一是新型现代农村的特色小镇，考虑到新型现代农业、农村休闲旅游和农村城镇的融合；二是城市周围卫星镇或城乡结合部镇的特色小镇，一定程度是产业的结构集中转移和城区人口再集中的新型农业、服务业、高新产业、甚至金融业等结合的特色小镇；

2) 特色的理解，特色首先从整个大的区域去理解，就是在尽可能保证产业集聚的基础上区域及区域之间的和谐发展，也可以从产业链内部进行有效分工而不是恶性竞争角度去考虑产业的政策扶持和鼓励发展。

2、特色小镇发展要点：

1) 特色小镇首先考虑的是“普通”或“不特”，在于现在符合我们真正特色小镇发展的基础还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先要重视打造基础，如大的方面交通、环保等，小的方面就不仅仅是“七通一平”，可能是“n通m平”，高标准、高要求，而且这些以政府投资为主，基础不牢，其他都是浮云；

2) 特色小镇关键在于产业培育，这是根本，是可持续的最大依仗，所以产业的特色就是在对小镇的找准关键资源点的基础上找到差异化，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放大产业能够在其中的集聚的可能性，无论是传统的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无论是农业、还是旅游业，甚至于什么工艺、新材料等产业，这个现在农村其实问题比较大，农村土地流转就是养鱼养蟹，重复没有任何特色，对当地的经济促进作用微乎其微，在城市的发展其实很多是发达地区不需要或不看好产业的集中和存放，也是有问题的，需要聚焦自身优势的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本身+产业应用+产业服务”的相关产业集群机构，同时考虑的应该是产业组合拳，否则不足以支撑小镇的“小”的深层次的发展，如新兴产业或传统经典产业，诸如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茶叶、丝绸、石刻、文房、青瓷等传统产业。泛旅游产业主要是“旅游+农业”、“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健康”、“旅游+体育运动”、“旅游+科技”、“旅游+教育”等方面内容；

3) 人气、人群、居民、市民等等是基础，特色小镇需要人的数量和质量的支撑，需要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持续去打造，需要精细化的管理和用运营的眼光去有规划推进相关建设，所以这些是特色小镇考虑的基础，没有人，只是空城、空镇，或者地不广人太稀，也是无法推进的，人口聚集的变迁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现，人口聚集是城市化的基础。需要有长期居留型聚集与中短期流动性聚集两种人口聚集模式的结合，同时新型城镇化架构人口聚集，需要系统考虑城市居住及配套服务的发展，进而形成城镇化架构；

4) 一体化、产城融合，以产城一体化综合开发为手段主要表现为产业的综合发展、功能的综合配置、土地的综合开发、配套的综合建设、目标的综合打造等方面。特色打造，规划得

先行；

5) 多方考虑现有产业、新兴产业、政府、市场、资本等多角色多方面的综合作用，以坚定的政府政策及投融资支持为依托以产业为引领，实现“产业+文化+旅游+社区+…”的多重功能；各功能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大糅合，而是相互之间有机的整合与融合，但要有个核心。

理解江苏特色小镇，首先得理解它的共性，再进行大的划分；然后在共性中细化区域的特色；再次在区域不同特色中再深化；而推进之也首先需要解决特色小镇建设的起飞、起步、孵化的基础，从基础设施、政策、资本等多角度考虑方可，其他就是找到一点，星星之火，深耕细挖，就能燎原。

巫 强（南京大学）：

就今晚的讨论题目，我提几个想法，“两要一不要”，供大家批评。

1、江苏版特色小镇建设要和工业园区的产城融合结合在一起。江苏经济的重要特色就是工业园区，依托工业园区为平台，在其实现产城融合的过程中建设特色小镇，这是一个可关注的思路。产城融合现在也已经成为当前江苏各地部分工业园区的目标，他们也有积极性向特色小镇转型，实现产业留下来的同时，将人引进来，住下来。这可能也是对今晚讨论题目的直接解读。

2、江苏版特色小镇建设要和县域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特色小镇虽然是看起来是“镇”，但应该是在江苏县域经济层面上，实现县域经济再次转型的重要契机。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也是江苏经济的重要特色，县域经济也面临着转型发展的迫切压力，特色小镇建设能为县域经济从强制造业弱服务业向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转变提供一种思路。这也意味着，特色小镇起码应该是县域层面上规划建设的小镇，而不仅仅是镇级层面规划建设的小镇。

3、江苏版特色小镇建设不要搞运动式的撒种子，铺摊子。江苏各地虽然有很多特色历史文化和传统，具备打造特色小镇的产业基础，但是特色小镇的建设需要汇集的资源量大，层次高，不是简单的制造业，也不是简单的服务业，而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新融合。这对各地政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省级层面上看，成熟一个、建设一个，更加切合实际地推行特色小镇会效果更好。

施 康（香港中文大学）：

特色小镇我的理解是产业的聚集，和以往的因历史文化因素而成的旅游小镇有区别。产业的聚集，如果以依赖市场而成，是有比较长的过程。因此，这需要政府或者企业的主导和规划。如何定位和区别其他，是个难点。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什么是特色？我理解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就是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的区域分工优势

的发挥。特色小镇与邻近区域相比，特色在哪里？历史？文化？风景？自然资源产业？工业基础？

比如：泰州医药城。它就在我老家门口，我几年前曾经专门去调研，每次回老家都去看一看，感觉年年有进步。可以说是特色小镇的一个典型案例吧！那里起始条件是附近有一个扬子江药业公司，后来在省里的扶持下市政府集中投资打造了医药研发－小试－中试－生产－医药教育的产业集群，似乎取得了一些成效，当地面貌也焕然一新。

随着医药城医药产业的积聚，就有了大量的外来医药研发、生产、营销的从业人员积聚，相应地在它的生产区旁边就有了银行、旅馆、餐饮、咖啡、茶馆、洗理等生产生活服务设施，逐步地也有了派出所、消防队等机构，房地产也开发出来，加上当地的原住民，就是一个典型的特色小镇啊！这恰恰证明了产城融合的特色小镇建设方向。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泰州医药城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工业开发区，根本没有镇的特征。特色小镇不是筐，不能因为领导有想法，上面有文件，就什么都往筐里装。特色小镇固然离不开特色，但归根结底更离不开小镇这个基础形态。小镇是什么？是有一定规模的人口休养生息的具有城镇而不是农村也不是大城市特点的小地方。如果工作时间车水马龙，关门打烊之后就空无一人，没有居民居住，没有“万家灯火”，那叫什么特色小镇？那是风景区，是工厂，是单位。

上海的朱家角，昆山的周庄，我觉得都是名副其实的特色小镇。它们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建筑，小桥流水的生活场景，有长期生活在那里的原住民，以及属于那里的文化气息。朱家角的现代街区是紧靠传统街巷打造出来的，是对原有风貌和服务功能的拓展。

总之，我的观点是，特色小镇的关键是改，而不是造。改是有基础的，造是凭空的。特色小镇应该是改镇工程，而不是造镇运动。

黄志军（南京大学）：

我觉得特色小镇还是要整和产业链，要集聚人才，单纯的特色小镇自身是不具备很高的投入产出值的，据内部测算，基本都是不经济的，必须进行产业链整合，特色产业的培育。而特色产业的培育关键是人，怎么把优秀的人吸引过来？为什么人家不选择上海杭州，而来南京或江苏，我想这也是当前南京缺乏高端产业的根源，没有顶尖的人过来，只能沦为上海杭州高端产业的低端模块，产业升级自然难以实现。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小城镇具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要素和资源么，比如：有哪个人才愿意去小城镇生活？中国现阶段走大国大城（城市群），可能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实地调研过，看到当前不少传统特色镇的急剧衰弱，我老家中国不锈钢城——戴南镇就是一个

极好的案例。

我的判断是，江苏当前的发展思路是，利用核心城市的创新、技术和人才优势，重塑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坚持传统制造业，生产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并重的发展思路，加快核心城市群的转型升级和发展壮大。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特色小镇的“特”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1）在某个产业上有优势；（2）有某种特定资源。特色小镇未来应该成为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

浙江原本就有特色的基础，浙江人模仿能力强。看到邻居家、朋友家干什么，很多都会模仿。所有，做特色小镇有基础，无论是农副产品还是工业产品。江苏这方面稍稍差一点，区域专业化分工不够明显。建特色小镇有基础，但不够明显。江苏的产业在县级特色存在，但一县之内镇与镇的差异不够明显。所以，江苏的特色小镇可能需要打破建制镇的范畴。

其实，农副产品也可以做特色小镇，不要局限于工业和服务业。对于偏远地区，农业特色小镇应该大力提倡。比如，大丰裕华大蒜特色。而这些农业特色地区的特色小镇可以以特色的农副产品为基础，发展相关产品的加工业、服务业和物流业。

建议：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不勉强。不应成为江苏发展的重心。其实，从江苏这次只有 7 个特色小镇也可以看出，江苏和其他省份比，特色优势不明显。在江苏这个高度发展的地区没有形成专业化和特色化，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除了专业化生产，多样化生产也是有空间的，何必拘泥于一种形式呢？

刘建森（徐工集团）：

江苏将更加注重智能制造，促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赋予传统制造业的新动能，提升新型制造业的竞争力，做出江苏制造业的特色！

闫浩（江苏省经信委）：

北京一位专家曾经说对中国制造业的“强基工程”信心不足，因为基础太差。后来，到苏南看了一批企业，说现在有信心了。我对江苏的制造业发展有信心，因此，对中国也有信心。

特色小镇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产业的特色上，或者种植业，或者旅游业，或者制造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或者混合产业。至于名称是小镇还是小城还是小区，都是无所谓的。剥掉特色小镇的华丽外衣，最后剩下的内核是：产业，最后还是归结到产业发展问题。

我赞成“特色”，所谓特，就是错位发展，避免产业同构，避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

陈 柳（江苏省社科院）：

从省级层面出发打造特色小镇，我认为主要还是转型升级、生态文明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目前打造的小镇主要是服务业、农业延伸产业为主要产业的，没有听说打造汽车、装备工业、机械等行业的小镇或小城。所以，特色小镇与其说是打造怎样的小镇，不如说在乡镇一级应该是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的问题。潜台词就是要放弃过去画地招工业项目的开发区模式，而是要打造具有产业特色、环境优美的小镇，这个时候产业规模大不大、甚至强不强都是相对次要的。

所以特色小镇的重点是产业，这个提法可能有问题。产业发展应该是高度集聚在城市带。搞生态旅游，包括搞养老，首要的就是大量的土地，不靠政府规划怎么可能呢？美国搞迪斯尼也是政府规划。

黄繁华（南京大学）：

我家乡是此次江苏首批入批特色小镇建设的宜兴市丁蜀镇，所以这里我以每年都要回去几次的丁蜀镇为例，谈点看法：

（1）特色小镇关键在“特”，这个“特”可以体现在特有的自然资源或区位上，也可以表现在当地特殊文化习俗或人力资源上。宜兴丁蜀镇这次能入选，我想主要是因为它是国内外著名的陶都。

（2）特色小镇发展离不开特色产业支撑，没有特色产业支撑，特色小镇难以持续发展。我亲眼目睹了丁蜀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宜兴市最富裕小镇，尔后逐步衰落的历程，这其中最重要原因，是当地陶瓷产业的明显衰落，包括连当地最大的陶瓷企业即宜兴陶瓷公司，最后也都关门歇业了。作为高能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传统产业，丁蜀镇陶瓷产业没能成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3）特色小镇建设需要配套的发展环境和体制机制建设。丁蜀镇陶瓷产业的衰落，不仅有当地陶土资源逐步耗尽的因素，而且与当地特有的制作工艺、产品造型等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有关，当地传统特有的工艺和文化日趋淡化，不少当地高水平制作艺人（包括我一些中学同学）甚至迁至他处（如一线城市）居住。可以说，当地陶土用完丁蜀镇还可以用运进其他产区陶土来补救，但若本地工艺大师们都不在丁蜀镇了，丁蜀镇这个特色小镇建设，就难以名符其实了。

另外还需说明的一点是，此次江苏公布的特色小镇建设名单，我观察主要是从传统特色产业考察的，这与浙江主要立足现代新兴产业不一样。这是由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具体省情不同决定的。换言之，江苏的特色小镇建设，不能照搬浙江模式。

崔卫东（蓝鲸咨询）：

江苏的特色小镇建设至少有两种类型。一是具有文化底蕴或传统产业的建制镇。二是大中

城市周边的新兴产业亮点的非建制镇。要杜绝把房地产概念包装成为镇。

在具有文化底蕴或传统产业的建制镇，建设特色小镇，要挖掘文化内涵，嵌入现代元素，找到传统产业现代化的亮点，通过文化和现代技术的注入，焕发产业青春。与生活、生态融合。

一些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具有大众创业特点的产业，可以在大中城市周边的非建制镇建设。

特色小镇的生命力在生产（产业）、生活（含养老、健康）和生态（包括恢复性生态）的“三生融合”。

王宇（南京大学）：

在各位的启发下，我谈几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大家都说到“特”，这点我很同意，但是我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何要强调“小镇”。我很认同刘老师提到的城市群概念，如果浙江的特色小镇强调的是“打造”，我个人觉得江苏的重点就是“改造”。原有的苏锡常等发展领先的模范城市的活力丧失和转型迷茫，才是江苏真正应该关注的重点。与其胡乱的重起炉灶，不如想想如何在这些城市周边，打造一些卫星城，帮助这些核心城市完成转型升级，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连绵不断的城市群。根据江苏的地理特点，不应该是到处布点，而是连线成面。当然，某些自然风景和人文历史特别优秀的小镇，也可以完全复制浙江的经验，不过绝大部分地方，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按照基于产业集群的城市群方式来进行改造。

杜宇玮（江苏省社科院）：

关于特色小镇，我根据个人体会谈两点，跟大家商榷。

（1）很多专家学者都主张，特色小镇的建设需要以本地优势资源禀赋为基础，其实不然。以我的老家浙江横店为例，其“特色产业”影视文化旅游业，家喻户晓，现有“东方好莱坞”之称。但是横店起初并无任何影视文化资源基础，甚至旅游景点也是屈指可数。横店镇的发展最初也是工业——磁材工业起家，素有“中国磁都”之称，后来才逐渐往影视娱乐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这可能跟集团创始人徐文荣大胆突破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分不开的。

（2）近期，浙江的特色小镇建设在不少场合都被当做是一种样板示范。实际上，浙江的特色小镇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照搬和复制的。以横店镇为例，横店镇的发展可以说完全是由民营企业——横店集团一手撑起来的。横店集团不仅是一个企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政府的角色，实际上横店集团执行了“市场+政府”的双重功能。很多在其他地方由政府做的事情，在横店都是由横店集团来进行决策、设计和规划的。

其实，我们横店（我国127个首批中国特色小镇之一）的交通不是很便利，不通铁路，唯一一条高速（诸永高速）限速80，离杭州这个大城市也蛮远。浙江“块状经济”注重专业化发展，更适合发展特色小镇；江苏地理空间大，省内各区域间产业同构程度相对较高，应当注重融合发展，如跨江融合、沿边融合，发展若干个相互融合的城市群可能是江苏能够做出成绩的一个方向。

当然，这个地方首先有个“特色小镇”的概念和范围界定问题。浙江的有些特色小镇，其本身是一个行政区，如横店镇；有些则不是，如转塘的云栖小镇，实际上是特色产业集聚区。后者，江苏完全可以效仿。

李湛（苏州发规院）：

江南原来是鱼米之乡，改革开放后快速城市化，种粮的任务已交给东北，许多镇都已到了中心城区，高楼树起工厂林立，哪还有什么特色小镇。随着通苏嘉、沿江等高铁建成，现有的中心镇也会快速城市化成为至少中等城市。苏南与浙江不同，浙江多山，城镇不易扩张，有形成特色小镇的基础。

徐宁（南京大学）：

特色小镇要不要建的问题是个伪命题，核心问题是能否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人文特点打造出独特的发展模式，即如何建的问题。其关键在于操盘手。这个操盘手不是规划公司，也不是具体的建设工程公司，我认为应该是该小镇的地方政府，尤其是一把手书记。具体来说，一把手领导除了要有本地化+产业化的思维，结合小镇的定位和特色对其发展进行深入、长远的谋划之外；还要有魄力和能力来操刀，付诸实施，例如对当地居民的拆迁、转移、统筹等等。因此，特色小镇能否建得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镇书记及领导班子。另外，我还认为某个小镇成功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必须因地制宜。

张宸（南京大学）：

制定江苏版特色小镇发展战略可以借鉴生物学中的生态位概念思考。

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是一个生物物种所处的环境总称，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态位。生态位重叠越多，生活在其中的物种竞争越激烈。

浙江的经验表明在当前存在着一种叫做“特色小镇”的经济生态位：一些民企可以在城市近郊的小镇上，利用生活成本低的优势，通过吸引年轻的技术、技能、技艺人员，发展小规模、非标准化的特色产业，取得成功。

而在江苏存在着大量依托核心城市群，发展大规模、标准化制造业的企业，它们适应着江苏特色的“工业园”经济生态位，并且拥有较高的经济效率。

这两类企业存在着生态位重叠竞争，争夺有限的人力、消费市场、研发技术等资源，而且当前人力资源的争夺最为激烈，这点大家都有提及。

对于重叠生态位的企业而言，最佳的结果就是生态位分离，各自占据自己的有利的区域高效发展，也就是江苏发展大规模标准化制造业，浙江发展小规模非标准化特色产业。如果把两类企业强行集合在一起，高效率的企业必须发动没有必要的竞争淘汰低效率企业，造成资源浪费。如果政府采用行政手段扶持低效率的企业，则雪上加霜，必将既浪费大量的财政资源，又

影响高效率企业的发展。

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需要有生态位意识，尊重一山不容二虎的规律，不无中生有，引二虎无谓相争。

史先诚（江苏金融办）：

以产业升级为载体，积极推动新型城市化。

1. 特色小镇可以搞，但不能运动化。江苏早就提倡过一镇一品，有些特色镇以县以下的乡镇为主。如海门叠石桥已与隔壁的通州川港连成一片，成为事实上的镇。大家对小镇的讨论，受“小”所限，似乎只有规划的3平方公里是目标，这与历史和现实都有偏差。我不反对规划小镇，但反对一哄而上。

2. 江苏产业园区发展有成功经验和空间基础，空间集聚性强，适合在现有产业园区基础上提高附加值率，以提高每平方公里产值为目标，适度控制产业园区空间边界。腾笼换鸟迭代升级，本质要通过创新培育新动能。

3. 江苏适合大力推进现代化城市带建设，附带发展一些有江苏文化底蕴特征的特色小镇、特色景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改变当前旅游景区千篇一律的低水平重复。常州本是旅游资源匮乏之地，但恐龙园作为人为主题公园，已是常州城市名片，是华东地区十一黄金周旅游收入第一名（虽然旅游品味和质量急需改进）。盱眙县通过几年宣传已成龙虾特色县城。所以，特色（小）镇、县级市或南京的仙林大学城紫金特别社区，都可以实现产城融合。当然，要区分到底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为主导特色，建设模式差异很大。

4. 现代化中小城市（设区的市和县级市），特别是有发达产业基础的县级市，市民生活质量高，交通很便利，产业视野也是国际化的，对解决农民市民化、全面建设高水平小康也有很好的融合和支撑。

江苏聚焦富民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途径

2016年12月14日

编者按：李强书记在省委第二期县委书记工作讲坛上指出，要盯牢重点，突破见效，善于抓第一要务中的“要事”，特别是要让居民收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三个口袋”更加充实。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紧扣“创新”、“富民”两大主题，而“富民”即让“三个口袋”更加充实。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认为，“富民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概念。不仅包括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至少还包括提升生活水平、福利保障水平等方面的内容。跟全国其他省市比较，江苏居民收入水平并不低，但是长期以来，江苏的城乡居民收入与GDP的比例之间不够协调。因此这里我们对富民的讨论，主要应该把问题集中在如何提升江苏省GDP中居民收入含量上，以及精准扶贫上”。近日，群内各行业专家、学者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纷纷提出建议。

江苏聚焦富民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途径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就“江苏聚焦富民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途径”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讨论范围的界定。

一是我们仅仅讨论“富民”问题，不是讨论居民过上美好生活的问题。后者最起码包括居民富裕程度、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公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等等。按照江苏省第13次党代会报告表述，居民过上美好生活，就是要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有更满意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基本形成设区市城市到南京1.5小时的高铁交通圈，城镇社区形成15分钟的医疗、文化、健身、养老等服务圈，城乡居民逐步享受到标准化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享受到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是考虑到江苏城乡居民目前人均收入水平始终处于京沪、浙后面，位于全国第四位，与江苏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但是GDP中居民收入含量处于全国中等偏下位置的事实，江苏聚焦富民问题的症结其实就是如何提升GDP中居民收入含量的问题，即经济增长如何与居民收入协调。正如党代会报告所说的“现在我省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相称，有些地方老百姓收入还不高。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江苏这个时候提富民，可能的原因：一是过去发展模式下，发展富了政府，富了企业尤其

是外资企业，没有真正实现“富民”；二是江苏居民的平均收入并不低，但是与发展不同步，GDP中居民收入含量低；三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富民目标的短板在农民尤其是苏北农民的问题上。

因此，我们要讨论的“富民”问题，其实就可以仅仅局限于两个问题：一是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化和对称化；二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人均收入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富民可能就是“富”农。

江苏过去因GDP中居民收入含量一直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因此有强烈提升居民收入的要求。这个衡量发展程度的指标水平低，我觉得主要原因一是1992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江苏依靠吸收FDI取得了巨大的增长业绩，但是外资经济的特点是GDP留下了，税收优惠了或给国家拿走了，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拿走了，但江苏居民主要只获得了廉价的打工收入；二是江苏是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工业经济，居民打工多创业少，不像浙江的老板经济，因此居民平均的收入相对较低；三是历史上江苏历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江苏财政上缴国家的基数高比例大，自己留下的相对少；四是二元地域经济结构，广大苏北地区还处于发展的较低级阶段，城乡居民收入都较低，从而拉低了江苏的平均数。

富民的问题，政府不仅应该是营造环境，还应有更多的战略功能。简单谈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考：

一是要积极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吸收外资的水平，提升外资经济的发展层次，主要吸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外资，减少或不吸收对一般的低技术、有污染的产业的外资，以增加对高知识和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增加其平均收入；

二是江苏未来主要应该发展民有、民营和民享型经济，把过去过度让渡给外资的资源，尽量转移到民营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身上来；

三是依托于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凡是服务业发达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也高，如京沪。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是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经验证明，发展它除了要依托制造业基础，还必须依托于大城市区域，即世界级城市群。只有城市化才能有较高的服务化。

四是江苏要克服长期的单一的制造业偏好，大力发展金融经济。金融与制造业发展不匹配，一直是江苏人心头之痛。由于金融是现代服务业的主体部门之一，因此金融不发达极大地影响了江苏的人均收入水平提升。

五是大力发展股权经济。根据江苏人的个性特征，要求他们个个像浙江人那样去创业，也勉为其难。但是如果利用江苏人才多、教育水平高的优势，大力发展股权经济，就可以实现江苏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

六是发展苏北要有大胆的改革思维和特殊的政策。

我的想法是，政府不要主要想在收入和分配上做文章，那是你多我少的零和游戏。战略上主要应该着眼于增加生产性努力，尽量减少分配性努力。

职工收入属于增值税纳税事项，所以如果增值税率长期处于17%的水平，经济不是高速增

长，企业肯定不愿主动提高员工收入，而且，企业会选择机器换人的办法尽量减少员工数量。这一方面，企业会多用机器、减少用工；另一方面，由于机器设备还可以作为进项抵扣税款，所以必然鼓励机器替代劳动力。除此之外，还有劳动法对企业员工在某些方面的过度保护，如伤残、辞退等方面，都会影响企业用工积极性，从而制约富民战略实现。但是由于劳动法、税法都是地方政府可以提意见但根本无法自改的外在因素，企业用机器而非更多地用人，就是必然的应对措施。企业这种选择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不仅无可挑剔和指责，还是技术进步应该鼓励。但是肯定会在中短期中造成严重失业，从而影响富民目标。这要求政府在宏观上发展服务业，发展培训业，吸收人员就业。

孙 军（淮海工学院）：

经济能够持续良性增长就是富民。富民的大前提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关键：一是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二是重视教育，尊重人才，三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江苏下一步可能的策略有：

一是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只有升级了，巨大的势差才能够为其它产业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更有利于各种财富的创造；

二是要让利于民，只有农民收入更多了，才可能配合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收入提升，防止烧火棍一头热，最后两头冷；

三是继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将各种战略理顺，协同推进；

四是南京、苏州等城市要逐步增加土地供应，稳定房价，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

五是充分尊重市场，推进教育公平，让江苏的教育相对更多的服务于江苏人民，推动医疗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建设！

张月友（南京财经大学）：

作为阶层词语，富民的症结在于害怕政策不确定，没有安全感，想移民。作为动宾词组，富民的症结在富农，在服务业落后。

富民的问题不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是如何富农的问题，是城乡一体化的问题，是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服务业供给不足的问题。

周 斌（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现在富民的压力太大，尤其中产阶级及以下：（1）小孩教育、生病医疗、房子、婚嫁等，再多钱一场难可能就一无所有或回到解放前；（2）江苏地区经济发展民没有完全享受到发展的红利，高税收、低补贴，有时候反而成了压力，比如城市的高房价、农村土地流转失去了土地仅拿少许收入的农民；（3）大多数人富裕起来的体质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是少数人凭着读书、继承富裕。

政府做环境，各方面的环境，成体系的去做：物理环境、政策环境、金融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等等，省、市、区、县各有分工，而且是长期，同时要分类考核；现在偏实体的环境其实已经很好了，就是缺少让大家大力创新创业的环境，积极创业的也很少。

如何让大家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共享成果？

- (1) 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如基础设施建设免费或低价给予使用；
- (2) 通过减免税收、补贴、政策扶持等予以返还；
- (3) 在不同领域成立基金，逐步解决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问题；
- (4) 政府的税收来自于超高收入者或企业者，他们多交一些影响不大，还是富裕者，但低收入少交或不交，就充分调动了他们积极性。

另外：第一，创造环境降低打工者的生活成本，吸引企业投资；第二，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尤其在新一轮城镇化发展中，让打工者变成共有者，或部分所有者，享受发展的红利；第三，对于政府利用本市民所拥有的资源，如土地、河流、矿产等，不是政府简单补偿，而且必须给予老百姓共有的权利，这样在整体发展时，老百姓才能一起享受发展。

藏富于民还有一个建议，多种体制机制创新和尝试：新的城镇化下的家庭联产责任制；民间小额多种资本与实体相互集合的集体所有制；国企与民营混合所有制；……

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

(1) 发展经济当为基础，着力改善江苏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形成高质量高利润率产业群，企业须富、有能力支付更高薪资于劳动者；

(2) 政府压缩开支，尤其是减少政府无效 GDP 与浪费，地方财政节省用于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医疗、教育、公共服务问题，让民众的钱包不因以上重大开支瘪下去，当然不是简单福利分配、而是省域政府以公共财政直接支持普惠民生；

(3) 制订地方政策、补贴就业培训、引导就业方向，呼应本省产业结构升级，为民众通过升级的就业结构获取更高收入；

(4) 优化创业创新环境，满足、支持民众的创富愿望与创业行为，以法律许可的低税、低费与完善的服务与营业环境创造一个低营商成本省域；

(5) 力求减少本省财力外流，聚集财富于兹，民众享有于斯。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江苏聚焦富民这个题目很大，也是老问题，症结主要有以下四个：1. 从区域层面看，江苏苏南情结深厚，苏北民生是短板，四种收入都很低，其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探讨把现有的发展战略，诸如沿海开发、东中西合作等国家和省的战略，融入、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否则就是自拉自唱。2. 从产业层面看，江苏制造业情结深厚，历史上重工轻商，三产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发展不足，科教优

势墙内开花墙外香，美国金融危机后又把网络经济当作虚拟经济来批判，过分强调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支撑，错失良机，江苏城镇居民收入在全国长期列第五、六位，服务业比重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数、低于北上广浙是一个重要原因。3. 从企业层面看，江苏公有制情结深厚，官本位突出，民企地位低、经营制约多，江苏民企基本上追随国家大环境兴衰，逆势发展非常困难，在新兴行业很难出现巨人、龙头企业，企业结构“多小散弱”、产品结构缺乏高端品牌、产业链处于中低端、企业职工收入低等等状况长期难以扭转。4. 从制度层面看，江苏 GDP 情结深厚，各级干部要面子不要里子，只管锅里的不管碗里的，富民政策很难落实，而当前基层政府财政、税收、产能、债务等泡沫很大，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来消化，老百姓还要继续过苦日子。几年前省委省政府公开宣布 2017 年城乡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比 2010 年翻一番，现在好像不提了。

解决途径：聚焦富民，必须全方位聚焦民本经济，坚持民有、民营、民享，藏富于民。

提升江苏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必须确保居民收入增长持续跑赢 GDP，这比中央要求的同步要高，这很不容易，因为江苏做分母的动力比做分子的动力足。在生产性努力中，增加工资性收入靠扩大就业、提升人力资本含量；增加经营性收入靠发展创业、创新；增加财产性收入靠稳定房价、股市。而转移性收入应属分配性努力。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如果说江苏的经济特点是资本技术密集，那与之相配的人力资本的回报应该更高才对。如果打工者收入不高，或许是江苏的人力资本也很丰富，供给充分？那么，人力资源丰富又廉价，这应该是一个对资本非常有吸引力的地区啊？为什么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来江苏投资，来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呢？

我理解，江苏毕竟是一个省，如何界定再分配的目标群体，对于人口流入和流出的影响都需要考虑。另一方面，生产性努力的受益群体也未必就一定是江苏人，但水涨船高，如果真正成为“好”工作的聚集高地，对各层次人群或许会都有益？

田伯平（江苏省社科院）：

讨论江苏居民收入必须注意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背景，不具备大幅提高的可能性，同时增加收入的内涵要相应调整。

对过去江苏居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途径进行分析，江苏居民收入增长比较快（指比全国和周边省市）的是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特别是农民收入，来源于乡镇企业。90 年代后期以来基本是与全国同步，在全国地位基本没有提升。

华建强（江苏省发改委）：

李强书记这次党代会上将三个口袋的次序调整为“居民收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三个口袋更加充实”，三者之间的次序调整是有很深用意的，应该说居民收入增加是目的，企业收入

增加是源泉，政府收入增加只是手段。与浙江相比，江苏是强势政府，所以，要提高居民收入，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

刘晓昶（华泰证券）：

因为江苏居民更加保守稳健，闯劲不足，因此更需要政府大力推动和鼓励创业。鼓励居民多渠道拓展收入来源，从单一的工资收入转变为工资、股份分红、利息、房租、兼职收入等，转变收入结构。

江苏不能只定位为制造业，金融行业同样重要，而且要打造金融行业良性生态圈，形成错落有致的金融生态系统。不能因为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江苏就放弃打造金融生态圈，江苏完全可以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后花园，提供更加完善的金融生态系统。

施康（香港中文大学）：

江苏要在全中国有一席之地，必须有大城市，没有大城市就没有人才和金融业。当城市的优势体现出来的时候，人才就会聚集，各种资源才会汇集，我强就是邻弱。现在为了分流一线北上，呼吁一线城市或者次一线城市的声浪很大，江苏要主动做大，否则杭州一旦形成规模和优势，江苏发展后劲就尴尬了。江苏要在全中国突出，必然要有些大动作，合并是最直接粗暴见效的。现在外部的环境不利于江苏安静的内生发展，要抵御上海杭州的虹吸效应，所以我建议搞个适合人才生活工作的大城市。

刘浩（江苏省委办公厅）：

我不这样认为，发展不能老是强调地方合并，我觉得合并是条错误的路，那又是再走追求量的老路，地方发展还是要靠内生的动力和质量，创造内生发展的环境和生态，合并不仅不能持续，反而把地方特色消除了。

孙国民（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富民的途径：

一是创业层面，创业的成功，使得人能够实现财务自由，在财务自由的情况下，人才有可能实现无障碍的生存、发展和生活，甚至可能会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极大富有，即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江苏。

二是创新层面，通过企业创新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升产品附加值，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而改善人民群众的工资性、奖励性收入等。

三是通过财产性收入改善来实现富民，比如储蓄、股票、债券、保险、理财产品等收益增加，比如通过天使投资的获利来改善个人财产收入等。

四是企业竞争力提升获取财富的总量增加，进而通过企业职工收入的稳步增长实现居民收

人的改善。要大力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专、精、特、优、新”企业，包括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单打冠军企业、冠军品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和跨国公司，代表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国家队（特别是要培育出类似华为这样民营企业，进入这类企业工作的人员，基本上具有极大可能成为中产阶级）；同时也要培育一批能够深度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和国际金融投资的金融机构、金融集团。此外，对国有企业来讲，要做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要让国有企业职工的富有转化为大众能够通过公平机制进入国有企业，从而也有机会通过在国有企业工作而实现个人生活富裕。

五是从制度层面消除富民的各种阻碍因素，构筑富民惠民、以人为本、人民共建共享的体制机制，即改善富民的环境，包括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如一次分配解决效率问题，二次分配解决公平问题，还包括改革个人所得税调节（如一套房者可通过个人所得税抵扣房贷利息等）等。同时，降低中小企业税负，并将降低的税负部分主要用于改善职工的工资收入等。

总的来说，一个地区要实现富民，宏观层面上最根本的是要增强内生增长机制，中观层面上是要实现产业竞争力提升，微观层面上是要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制度层面上就要在实现财富总量攀升的同时，将这种财富增量更多更好地转移到老百姓的钱袋子里，实现“富脑袋”和“鼓口袋”。

王辉龙（南京市委党校）：

能不能换个思路评价“富民”呢？收入是一个方面的指标。除了收入之外，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可得性，生活成本等是否也应考虑进去？如果政府财政多占了居民的收入，又把这些占去的收入以公共服务的形式提供给居民，那还是增加了居民的财富（财富 = 私人财富 + 公共财富）。所以，聚焦富民在增加居民私人财富的同时，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财富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当然，私人财富偏低确实是我们的短板。

江苏还是要做优服务、做优产品，以应对高铁时代和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竞争。

吴继冈（常州市发改委）：

富民不同于惠民。江苏靠产业发展发家，富民还得靠产业转型发展支撑。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所谓富民，本质在于 GDP 分配中居民收入份额的提升，过去是经济发展富了政府，未来要藏富于民。然而，从微观现实看，居民收入的提升不能寄希望于本职工作的薪酬，而在于薪酬之外的财产收入、股权收入、实业收入，浙江人的富，不是一般的薪酬高，而是家家有产业、人人当老板。江苏富民的根本出路不是一般的提高工资，而在于鼓励民间创业，让普通的百姓在正常的工作之外有一份自己的产业经营的收入。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现在阶段，首先保障资产性收入，其次提升保障性收入。

缪放嵘（南京中诚石化集团）：

我祖籍浙江义乌，生长工作在南京，谈富民的差异我感觉还是观念，浙江培养子女目的是参与市场竞争，江苏培养子女目的是进体制占位子。但三十年改革下来，从富民的百姓民间财富积累看，我觉得可能江苏强于浙江，一是百姓主要都是打工收入，江苏大工业比浙江小手工还是有优势的；二是江苏土地房价可能整体高于浙江，资产增值收入至少差不多；三是差距拉大的更重要的原因，浙江人不厌恶风险。

刘根荣（厦门大学）：

现在还谈如何促进先富问题就不合时宜了，这次讨论重点应该是如何促进江苏整体共富的实现方式。

江苏促进民富，关键是要稳定中产阶层的收入，在保证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的基础上，重点保障其财产性收入的稳步增长。

要富民，其根本路径：一是要提高劳动效率，从而提高实际工资水平，扩大劳动力要素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提高劳动效率，就要发展智力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智力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如软件服务业、金融业、工业设计服务业、各类专业事务所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业，如智能制造。提高劳动效率，要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制度创新。二是要拓展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以及其他工资外收入。如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为居民提供安全的投资渠道；发展共享经济模式，如开放网约车服务。

要富民必须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应降低行业壁垒，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某些垄断性行业；对新的商业模式要有包容性，政府不应动则干预，应该允许其存在，法无禁止即可。

改变创富模式，更要改变财富分配模式。像华为依靠人才科技的投入，在创新中创富，同时又通过员工持有虚拟股份取得分红收益，这种分配模式就是民富的长久之道！

民富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发展。股市、债市以及基金等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为广大民众带来投资性收益，这是富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缁毛毯）：

一个地方的人民是不是富有，应该看收入和支出是否平衡，江苏民均收入在全国应该属比较高的，但是不算富有，原因在于消费更高，把赚的钱都花出去了，怎么谈富裕？首先，用于医疗花在医院的钱，其次国有教育补课或者私立学校昂贵学费，房地产价格过高，使得即使赚了钱还是逃不过房奴的局面。

从企业角度看，员工工资 5000 元，增值税就要交 $5000 \times 17\% = 850$ ，社保再 1300，民营企业需要承担每个月 2000 多的无偿费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转移海外，资金流向海外的根本原因。对于办企业我们首先会想到社会责任感，交税与尽可能为社会分担更多责任。某些问题的提出不代表着要个人或者企业要得益多少、而是在走国际化道路上与各国不脱节，希望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前两个月去蒙牛公司，蒙牛公司目前已经机器人改造代替人工超过 70%。机器坏了，修好就可以；人受伤了治疗好要按伤残等级作高额赔偿，有时候一些企业老总面对伤比较重的就直接放弃治疗，医生也建议不治疗赔偿少。因此我觉得劳动合同法必须修改，很多人都知道劳动合同法是早产儿，不健全。但是一直没修改，导致劳动者在企业里不是想要做好事情，而是钻空子敲诈企业，一方面导致更多劳动者仿效，阻碍经济发展，一方面造成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道德缺失；另外从企业角度来说，企业主也不傻，面对利益的时候，由于怕承担过重的劳动赔偿损失，有时候会放弃对劳动者的救治，也同样会造成道德缺失。

关于江苏富民我认为：一是不要强制性地将有市场需求的中低端制造业关停并转，二是通过职业培训将相关劳动力转移到服务业去。此外，设法增加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这一方面，我认为可以学习浙江的温州和福建的晋江：工作之余去承揽一些企业的手工活在家中做，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打麻将打牌上，当然这个需要企业配合和信任。

单豪杰（中投证券）：

富民三条：减税放权、教育培训、以法治精神建设美式资本市场。

减税放权解决机制与动力；教育培训为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建解决新知识背景下的人力资本和效率问题；美式资本市场解决财富增值与创业问题。其他交给运行主体，技术效率、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均为内生或者说是结果。

赵进（江苏省商务厅）：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江苏如何富民。减税当然是富民的一个重要措施，但在省的层面是实现不了的。在省级层面能做的，在制造业往高端走的同时，要解决好低技能劳动力的去向问题。一是不要强制性地将有市场需求的中低端制造业关停并转，二是通过职业培训将相关劳动力转移到服务业去。此外，设法增加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这一方面，十七大报告中就提出来了，但似乎还没落到实处。

让农民富起来，首先要减少农民，城镇化可以创造农民非农就业的机会。第二农业要逐步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经营，这个需要制度创新。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感觉这次省党代会讲的富民不同于以往的战略导向是植入富民基因，可能更多的是民富，

民是主角，要改造靠打“洋工”的富民基因！这种新的富民基因怎么构造，就是鼓励创业创新，让创业创新者先富，带动大众致富！创业创新者要先富必须让资本和知识拥有者得到充分回报，江苏这方面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尊重知识要体现在市场价值上，可以制定有突破性的政策措施，特别要让知识在参股、所得税、知识产权保护、再学习、休假等方面有重大举措。农村电商的发展使许多乡村致富，如沙棘，徐州的苹果村、玻璃瓶村，都是几个回乡的年轻人搞起来，形成示范效应，商业模式创新空间也很大！

王洪亮（南京审计大学）：

从富农角度看：一、积极引导农民非农就业，加强对其职业培训，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二、鼓励农民创业，利用市场机会，提高其收入。三、引导农民进城，通过参与城市复杂的劳动分工提高收入。四、鼓励有条件的农民跟随子女进城，更深入的参与家庭内部分工，提高整个微观家庭的效率，从而提高家庭人均收入。

储胜金（江苏省委研究室）：

刘老师讲，富民的短板是富裕农民，富裕农民，要有改革思维和特殊政策，我很赞同。现在很多农民已经非农化，但有的不愿进入城镇，因为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村集体经济股权；有的无力进入城镇，因为农村三权无助于减轻其进城入镇的成本。现在不少地方在探索“三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但有不少自我设限。我个人的想法是，在保留农民三权的前提下，放松对三权经营权转让范围的限制。目前农村承包地的转租，已经不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难点在宅基地。要对宅基地进行权能的分离，宅基地的使用权仍然归原来的农户，但宅基地（含其上物业）的经营权（居住权）可以向全社会转让，而不应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老实说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户不太会再去获取第二块宅基地、第二栋房屋）。地方政府可以设定转让的期限，一般不超过多少年限，到期后，由拥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户与现在的经营户（租户）商量，是续约还是由农户收回。农户和租户也可以约定是否同意对原有房屋进行改造。当然目前看这种权能分离还有很多未尽事宜，属于不完全契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种制度安排，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利益，减轻政府对农民失地失居的担心，又可以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源，使之成为助推农民城镇化的资本和资金，还有利于在农村发展农业综合观光、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农村养生养老等新型业态。

任保全（常州大学）：

分析江苏富民的症结所在：

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提到，实物资本、一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这三种要素的不同增长状况可以解释国家间人均GDP差异中的80%，然而通过对三要素的深入分析，有助于发现富民问题的症结的缘由。（1）江苏在以往经济发展中，可能更偏向于实物资本和一般劳动力

的贡献，而容易忽视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2）而在实物资本中，又更多的依赖外资的作用；（3）以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素质不高的低成本的一般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承接国际外包从事加工贸易。显然，三大要素分配和结构中的失衡现象，可能是导致江苏省 GDP 中收入含量低，以及与 GDP 增长不协调的重要原因。

江苏富民的解决途径：

在促进江苏民富的过程中，应努力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提升江苏富民的（平均）数值水平，二是要注重富民内在结构的平衡性。对于前者来说，可通过补短板进行转换，对于后者来说，要通过主动性的调整加以实现。具体来说：

（1）补民营经济的短板。将以往更多注重外资发展，转到注重民营经济发展上来；

（2）补服务业的短板。要大力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相配套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加大相应的服务业人才的培养和积累；

（3）补人力资本的短板。在未来加大投资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投资的分配，要将投资引向科研与开发的部门，而且尤其要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4）调整匹配性问题。在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换的过程中，要注重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结构调整协调性；

（5）调整三个口袋的排序。用居民收入、企业利润、政府收入这“三个口袋”反观 GDP 构成，要将居民收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并且要通过大力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和技能水平来增加居民收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土地流转问题

2016年12月21日

编者按：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到了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或将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展开详细的农业工作部署，其中农村金融创新改革有望在明年取得突破，农村金融创新的最大看点在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再度成为热点。

据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针对农村土地流转、保障农民权利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刘根荣（厦门大学）：

农村发展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现在城市化进程对农村发展的破坏性影响。农村优质生产要素的流失严重，面临的挑战与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最突出的就是人员的枯竭、资本的稀缺、以及土地抛荒。目前即使政府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投入，也无法阻止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现阶段政府在试图建立农民的保障体系，但保障水平极低，农村基本还是家庭自我保障为主。农村经济的发展估计要在城市化进程进入稳定期以后，才可能重新吸收优质要素进行发展。

我认为三农问题解决思路要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需要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视角来深入研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改造也需要多个层面的探索与实践：即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组织层面的三位一体共同推进。分田到户后，村民开荒种地积极性空前高涨，当时的效率提升是有目共睹的。现在我觉得可以考虑在一些地区通过创新制度，给予农民自由选择权是重要的改革方向。农村发展的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金融化水平低，经营资金投入不足，当前通过土地确权，主要解决土地经营权的可抵押，提高农村经济的金融发展水平。例如确权后的土地进行整合入股，发展现代农业，实现规模化生产和经营，也许会更好。现在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除非重新进行土地使用权分配，否则还可以继承，只有土地对农民保障功能彻底弱化以后，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才有可能。

但私有化后可能导致农民作为弱势的土地所有者很可能无法与垄断的土地资本家进行竞争，在中国产权保护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弱势一方的个人更难维护自身利益，最终绝大多数土地被少数人垄断，使农民成为无地农民，只能做传统意义的佃农，失去了土地的保障功能。

刘志彪（长江产经研究院）：

中国 7 千多万贫困人口主要是农民，他们贫困的原因有千万条，其中最根本的是这些贫困的农民缺乏自己应有的权利和机会选择权。也就是说，农民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权利贫困、选择机会的贫困，如：土地财产权利的贫困，迁徙权利和就业机会的贫困，享受公共福利如教育、养老、住宅和医疗权利和机会的贫困，等等，因此改善贫困人口权利和机会选择权，才是最重要的“精准扶贫”。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

从土地所有制角度看，中国的农地制度和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非常类似：农民只拥有使用权，国家或者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从非洲土地改革看，明确产有很高成本，世界银行在非洲搞土地确权 30 多年，希望借此增加农地生产力和可持续发展，然而现实是推进最厉害的坦桑尼亚也就推进了 55%，主要的困难是农民的坚决反对。中国农业是最高效的生产体系，处于半集中化状态——播种收割和施用农药等环节基本集中机械化，只是分散管理而已。中国的农业问题是由人多地少的制度因素决定的，等现存的农民自然死亡，城市化彻底完成，土地就可以自然集中。

出现农村土地撂荒是正常的，和企业停产厂房空置是一样的道理，并且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高，导致只能家庭经营，美国、欧洲、日本等 95% 以上都是家庭经营。农村土地只是保险手段不是致富工具，因此“确权”根本保障不了农民利益，反而会给未来城市化和土地集中带来麻烦，还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农村土地私有化对农民不是最好的选择：（1）农民失去了保险；（2）巨大的交易成本导致农业成本高昂；（3）土地私有化后强权面对农民个人。

当然我不反对土地私有化，只是现在私有化还太早。农业的目标是保障粮食安全、农民收入、农村环境、农业竞争力和社会稳定，脱离了目标的土地政策没有意义。

何雨（江苏省社科院）：

确权，需要明确其对象与内容。农村土地权能有三个：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就是要明确三权各自的主体。现有的格局是：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可以由农户流转向公司和大户，这也是当前确权的主要内容。现在土地权能安排，已经是集体所有与私有化的混合。经营权已经私有化并确权了，且也能自由流转与变现，基本上达到了所有权私有化的目的。

另外我认为现有的三权分置可能是对农民的过度保护，会损害农业公司与大户利益，影响其经营持续性与稳定性，原因：（1）经营权流转不是一次性的，当市场价格不理想时可以拒绝流转；（2）随着农村人口持续减少，留守农村的人，可以在土地再分配调整时获得更多土地。

张立冬（江苏省社科院）：

当前国家实行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私有的承包权以及经营者私有的经营权，是一种非常好的制度。农户私人流转的，不确定性的存在会影响到流入方的土地长期投资决策。目前江苏很多地方是通过村集体建立土地合作社然后再出租给流入方，并且通过建立以实物等价补偿和自然租金增长机制来和流入方签订相对长期的流转合同。

王洪亮（南京审计大学）：

农地私有化后，土地流转的成本会下降，农村的经济效率一定会提高，但可能带来的问题有：土地会快速集中，有大量农民转让土地，这些农民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不强，失去土地这一保障后，如果有大量失业，社会风险也加大；同时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扩大，阶层流动更加困难。

曾楚宏（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明晰的产权在西方法制观念浓厚的国家非常有效，但是模糊的产权在中国这种人治色彩浓厚的国家未必不行。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有一些东西是你知、我知，但不会明确写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契约，缔约成本低且更具灵活性。如果辅以惯例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协调，收益可能远超正式契约。目前更适合我国农民和农地现实情况的可能是这样一种产权情况，但并不是说明确产权不好和不对，只是超出了现阶段我们的国情，可能得不偿失。

张 晔（南京大学）：

我认为田地的保障功能很低，而且很大程度上要跟资本、劳动相结合，现在新农保的保障水平太低，应该把农民纳入社保。另外土地确权的本质是为了地权稳定，限制土地调整，在我们调研的地方，地权不稳定的地方，资本不敢大规模投入，会落后一些，确权的村庄农民明显要富一些。只有地权稳定，技术和资本才敢大规模投入，并且确权以后，村干部的权力就会受到限制，对农民的剥削会减少。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98%的农场由个人或家庭所有和运营。为避免出现大公司或外国生产者垄断农业生产的情况，艾奥瓦州规定只有美国农民才能购买和拥有土地，从根本上保证了农田只能在美国农民手中流转。农业生产的盈利性从根本上保证了农业的吸引力，必须要土地上能挣出钱来，土地才不会抛荒。现在地都不种了，18亿亩红线就变成了守着荒地拿补贴而已，因此农业生产方式必须要发生转变，同时还要做好社保安全网。

孙 军（淮海工学院）：

现阶段看，城里人最重要的财富是房子，农民最重要的是土地。如果农民要进城，土地换钱买房子是根本，而土地能换钱是建立在确权和土地规模化经营之上的。

李湛（苏州发规院）：

确权之后也存在较大风险。比如：在云贵川林地确权，出了很多事情。在确定了更长期的使用权承包权后，早就不在当地住的农民争先恐后将林权卖给一些资本皮包公司，然后这些公司用股权去银行抵押贷款，最后宣布破产，搞掉了银行的钱却并没有违反规定。

翟太煌（山西证券）：

土地兼并不一定带来失业，资金集中（富豪）或许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在中国农业效率还不高的背景下，土地兼并要么造成失业（机器替代人），要么驱赶农民进城。虽说中国工业和服务业吸纳能力很强，但失业时有发生，而且以农民工失业为代价。

蒋青云（复旦大学）：

农民对土地价值判断是动态的。就江苏农村而言，就是征地的拆迁收益和转租收益，其中前者是不可预期的可讨价还价的大头，后者是可预期的平均收益。所以实际上就是级差地租的索取权是否能部分或全部还给农民，如果可以，农村会安定许多。

陈爱贞（厦门大学）：

我觉得农地问题由于其特殊功能交易不能完全市场化，还需要考虑代际问题。如果私有化，不少农民随着子女到城市去，会把土地卖掉而不是转租，那大量新生农业人口可能就无地。城市化发展稳定后再考虑私有化应该更合适。

刘浩（江苏省委办公厅）：

城市集聚农民成为市民，农民经营权流转，土地或出租或参股，然后工商资本（限定为农业领域）进入，可能是个办法。

徐琴（江苏省社科院）：

中国当年通过革命手段把地主的私有变成全体农民的私有，再通过运动把农民的私有变成公有，再通过改革变成现在的集体所有承包经营。第一次的革命死了很多人；第二次的公社化也有无数生命的代价；只有第三次承包制是平和的、增益的，这其中城市化帮了不少忙。今后，不排除私有化，但前提是，大多数现今的农家后代已经成为比较稳定的产业工人或白领工人甚至中上产。

全球化逆境中的开放战略与建设制造强国

2016年12月30日

编者按：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最新一期《世界贸易展望》报告中指出今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是连续第五年放缓，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时期。基于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各种贸易力量再重组趋势愈演愈烈，尤其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日渐提升，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理应争取更多的国际贸易主动权。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2017年经济工作时，提出“要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明确了“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作为强国之本、富民之基的实体经济在全球化逆境中如何振兴？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提出“全球化逆境中的开放战略与建设制造强国”这一议题，并据此引导群内各行业专家、学者展开讨论、提出建议。

观点

刘志彪（长江产经院）：

我理解的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指贸易和投资，我觉得它是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市场经济。

中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有今天的地位，与过去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特点和内容有直接相关关系：一是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消化了国内丰富的有竞争力的产能；二是中国企业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外包订单，在被俘获的GVC中成功地实现了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三是通过国际代工的技术外溢和竞争驱动，中国本地制造企业不仅学到了技术，也学到管理技能，为创造自己的独立品牌奠定了微观基础。

现在中国面临的逆全球化趋势，并不是中国与全球价值链脱钩了，也并不是开放国家都变成了回归封闭的国家，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形式可能发生了变化了，我国通过吸收FDI进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也走到尽头了。在未来新的全球化进程中，至少会有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

（1）出口商品为主可能变为输出资本带动商品就地销售；（2）吸收外资可能变为主要吸收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3）利用别人的市场扩张经济可能变为利用自己的市场扩张经济；（4）以科技园区优惠政策吸收FDI，可能变为向技术人员提供先进的制度平台和硬件载体。

这就是我前几年一直倡导的中国要以自己强大的内需为依托，及时启动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战略。这种新型的全球化战略下，实现制造强国的路径有本质的不同。要点有：一是努力摆脱

中等收入陷阱，提升收入和消费的基本现代化水平，大力发展消费的终端市场；二是以中国巨大的内需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发展创新经济，包括走出去利用当地人才开发国内制造业需要的技术和技能；三是以此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包括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在沿线主要城市建设全球价值链的节点关系，把一些发展中国家纳入我们的制造业价值链体系；四是除了发展消费驱动的 GVC 外，还要加入全球创新链发展生产者驱动的 GVC。其中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一个是面向制造强国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何雨（江苏省社科院）：

目前，逆境主要体现在各经济体的对外政策上。从全球贸易角度，我个人认为现在我们处于逆境中期，断崖式跳水阶段应该暂告一段落。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归纳当前问题时，指出的首要问题就是生产过剩与需求升级不匹配的矛盾，责任主要在生产端。制造强国，不应为高端而高端，特别是随着人均 GDP 达到 8000 美金左右，几乎处于中上等国家发展阶段。制造业应紧扣社会结构中产业化引发的需求变革，以国内需求全面升级为导向。庞大而高端化的内需，应成为中国制造强国最大的筹码。

杨大威（江苏省政府办公厅）：

（1）当前的全球化曲折深化阶段，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对经济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不少经济体内部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和福利恶化，进而掀起逆全球化浪潮。

（2）逆全球化不完全是经济的自发调节，通常伴随着民族和民粹两大主义和政府对经济特别是国际经济活动的干预。

（3）逆全球化可能导致部分国家发展战略根本转向。例如上世纪拉美由初级产品导向进口替代的转变。

（4）逆全球化应是全球化不断深化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

马野青（南京大学）：

近年来全球化确有放慢甚至逆转的迹象，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复苏、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乏力、投资机会减少有关。

华建强（江苏省发改委）：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为制造业供应链服务的开发商、集成商、渠道商，由中国代工、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让富士康这种类型的国际型大企业在中国的土地里开放化、平台化、智能化。

司增绰（江苏师大）：

这些年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省市层面都呼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但目前江苏省制造业结构及发展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强度较低，制造业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有限。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

制造强国需要具体细分：

（1）我国制造业不仅是高端制造，包括传统制造，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是有巨大差距的。针对高端制造和传统制造，具体落实的调结构和转变方式路径是不同的。

（2）《中国制造 2025》，提及 10 大重点领域其中 8 个都是装备制造领域。因此需要区分侧重的是高端制造转型突破还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

（3）工业品制造（如侧重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如传统消费品制造）两者的建设路径、方式、政策，以及实施主体、转变方式、重塑品牌的路径也是不同的。

刘建森（徐工集团）：

逆全球化挑战下建设制造强国的建议：

1、立足本国市场，在满足本国需求升级换代的进程中，激励并保护科技创新，尤其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中国制造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

2、鼓励中国制造业走出去，贴近当地市场，避免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比如 SKD、CKD 组装模式，演变为当地研发、当地生产、当地销售。

3、继续支持中国制造业在海外收购兼并，尤其是对关键零部件企业的收购，提高制造业企业的价值链条的竞争力。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我对开放战略的理解是：以我为主，以内需和一带一路为基础，建立对我们有利的全球产业价值链。

建设制造强国方面：

1、美国次贷危机表明只有制造业才是强国之本，只有制造业才能立国，才能解决就业和吃饭问题。

2、国际产业链被发达国家把持的情况下，搞产业转型升级应该有所选择。

3、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品牌和质量的问题。

4、目前制造业一方面面临用工成本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面临着用工短缺的困境。大量本该投资到制造业的转移支付，流到股市和楼市，企业融资成本较高，无心发展制造业。

邵军（长江产经智库特约研究员）：

基于自由贸易理论，全球化成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主流趋势。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所谓机遇，主要是全球化的机遇。另一个最大的受益者是资本，全球价值链配置给资本带来了更大的获利空间。事实上，全球化并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失，开始出现反全球化运动。我们应正视反全球化的诉求，也应看到全球化的大趋势并未改变，面对目前的态势，称为全球化逆境比较合适。中国应有积极的应对，继续推进开放战略。

（1）积极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修订，建立以我为主的局部秩序。

（2）积极发展大中华经济圈。华人在世界各地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华裔群体的自我认同，使其具有超越政治的凝聚力。在封锁的年代，华侨为中国经济开了一扇门。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是华侨最先投资中国。江苏分别就华侨、港澳、台资立法，本意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华商圈的作用。目前大中华经济圈的政治矛盾尖锐，是反华势力乐见的局面，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努力以经济联系来破局。

（3）外商投资政策调整要稳定大多数。从优惠到国民待遇是必然趋势，贸易战的反制措施也是需要的。但是要注意稳定大多数，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外资赶走。

杨平宇（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全球化逆境不一定是坏事：首先，全球化可以倒逼外贸出口企业从事研发活动。全球化逆境可以逼迫企业破釜沉舟转型升级，也顺势淘汰一批廉价代工厂。其次，全球化逆境也迫使国内一些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具有强大制造能力、管理能力，并积累了大量生产数据的制造企业和国内价值链进行合作，带动国内价值链的发展。第三，全球化逆境也为我国一些产业的贸易保护提供了挡箭牌。通过有效产业政策，推动企业研发，满足释放出来的高端需求市场。总体来说，我们应该有大国自信。从供给侧，相信我们已经具备了世界级的技术研发能力，重要的是如何建立完备创新生态系统，最大限度释放创新能力。从需求侧，相信我国的需求市场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的需求都能撑起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对全球化逆境和制造业强国的几个观点：1. 全球化逆境是金融危机、数字经济和新工业革命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条件。2. 国家要有一个全面的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规划。3. 利用中国人口、空间、需求复杂多样的优势，能够发展所有的制造业。4. 政府的研发经费要资助民企的技术创新。5. 建立主导型的技术创新机制，克服创新散户的不足。6. 用新兴技术和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7. 制造业集中的地区要向新兴、高端制造业迈进。

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区和城市群是重合的，人口密集，基础设施齐全，可以以这些城市群为抓手，全力以赴地打造一批世界级的制造业城市群基地。建制造业强国关键还是内因，包括如下方面：一是产品及其服务的国家标准要显著提高；二是厂家从一开始就要把制造看作服务；

三是消费者对产品及其服务质量要挑剔和苛刻。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全球化逆境和制造业强国：1. 国民素质与国际的差异。2. 信心与信誉的等级差异。3. 中国如何成为制造强国，我认为不仅仅只是靠发展高科技企业和高科技产品，而应该让所有企业界人士从意识上认清形势并加以改变。4. 对于中国制造与国际品牌的距离，我们应该更多考虑产品品质问题。政府要做的就是鼓励企业生产优质产品，对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给予政策审批简化和贸易支持。

刘根荣（厦门大学）：

如何在全球化的逆境中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强国，是中国掌握全球经济主导权，深度参与世界产业价值链的分配与控制权的重大课题。1. 我们必须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存在的困难与挑战要有清醒的认识。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对制造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利润与生存压力。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迅速上升，一方面，说明中国国内资本发展壮大有了对外投资的能力，另一方面更说明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逐渐散失。2. 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要有清醒认识。现代制造业不仅仅是价值链环节的竞争，更是整体价值链体系的竞争。3. 对中国今后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要有战略规划和措施。首先，从整体上优化国内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其次，要加大技术工人的培训，提高其职业技能。再者，要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企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积极开展国内外的并购工作。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化的逆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脱离原有的以低人权成本与生态成本为特点的低成本优势，这就要求：1.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一方面制造业必须升级，传统高能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转型；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承接传统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2. 通过技术创新战略，引导新型高端制造业的发展。3. 要发展资本市场，引导风险资金对高端制造业的投入。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首先我们遭遇的全球化逆境是什么？逆境，既有不利的意思，也有逆全球化的意思。全球化环境目前是最糟糕的，概括起来四个方面：一是国际贸易低迷。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三是再工业化力度会加大。四是脱欧产生国际经济发展中最大的不确定性。

逆境中制造业转型：一是要确定从引进到引领的新方位。我国制造业总体竞争力不强，引进的目的是增强引领发展的能力，不能再不加选择的引进！二是在稳的基础上把握走出去的节奏。三是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中注重两边贸易便利化。

孙 军（淮海工学院）：

下一步，我国的开放战略必须以制造业提升为基础，以人民币不断放出去为辅助。具体说来：一是以庞大的消费市场为导向，以互联网等技术为支撑，以市场为主导运用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制造业升级；二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优秀人才和资源，打造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在此过程中将人民币坚实地放出去；三是通过稳定的预期控制住房价，通过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为制造业提供血液；四是各区域要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像江苏这样的制造业主导的地区，所有的发展战略都应围绕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制定；五是去产能的过程要一视同仁，完全运用市场化手段去实现。

踪家峰（南开大学）：

制造业发展关键是与之相匹配的教育结构，而现行教育体制很难与之匹配。可能的措施是：第一，15年免费职业教育，即9年义务教育再加5年职业教育，全部免费；第二，现有3本院校一律转为职业技术学院，地方性的学校均改为职业技术学院；第三，鼓励企业办技术学院，与其他院校享有同样的权利；第四，对外开放，吸引国外学院办学；第五，设立国家技术创新奖，专门奖励技术工人。

孙月平（江苏省委党校）：

经济全球化逆转，将给中国制造业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对外开放带来的影响要用进一步对外开放来应对：

1.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加快制造业进出口、引进外资、对外投资、外包等方面的发展模式的转型。
2. 利用全球资源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转型提供支持。
3. 以开放促改革，清除外贸转型、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
4.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争取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有利的国际环境。

巫 强（南京大学）：

我理解的全球化逆境是指全球化将进入一个低迷期，主要体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可能改变积极推动并参与全球化的原先政策导向。虽然这不一定是全球化的根本逆转，但必然要求我国及时调整开放战略。调整的大方向应该是从“重出口重引进来”转变为“重进口重走出去”。

吴继冈（常州市发改委）：

中国发展至今，夸张的说，现在不缺技术、不缺资金、不缺项目，那缺什么呢？只缺制度，

缺科学的制度，有法可依的制度！

曹玉平（河南大学）：

纵观经济全球化的历程，开放与保护也呈现出交替出现的周期特征。中国如何在这一全球化逆境中发展，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 （1）全球全方位挖掘国际、区际经济合作的潜能，尽力发挥现有比较优势；
- （2）在全球化逆境中，要善于借助全球资源和利用 GVC 思维提升我国要素禀赋结构。

张远鹏（江苏省社科院）：

一、按照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投资理论引导企业走出去，不要一窝蜂，不要整产业链外移防止国内产业空洞化；二、推动加紧在欧美并购优质企业，不要只看最新科技的，凡是有影响力的品牌、适用技术、先进技术、营销网络即可；三、省级层面努力争取在苏州工业园区开放改革综合试验框架下的进一步开放试点；四、国家层面，主动在 WTO 框架下的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开放。

毛丰付（浙江工商大学）：

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跨国扩张，目前的逆全球化是技术长周期里资本回报率下降带来的资本收缩。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在资本收缩大背景下，权力对资本话语的压制，这是政治因素抬头的原因，走出去经济固然重要，政治风险可能要放在第一位。二是无论进口出口，大致包括价值观、规则标准、技术、资本品、消费品和原材料几类，以前是以后两类为主，目前希望跃升到中间两类，未来瞄准的目标应该是前两类。

刘 勇（天津大学）：

如果把补贴给劳动力，降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修建先租后售的房屋，这样可以促进制造业成本的降低，并且稳定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吸引和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蒋青云（复旦大学）：

全球化逆境下，中国应该更有机会拉动和改善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从而重塑经济发展区域格局，改变产业发展的同构现象，变国际分工为一定程度上的国内分工。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全球化逆境阶段也会倒逼中国练好内功。供给侧改革推进到目前阶段，两方面需要加快：一是制度改革，制度供给在很多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而这是培养和留住优秀企业的关键；二是

降低税费，减轻企业负担。川普上台后，美国降税，其他很多国家可能会跟进，不利于中国引进和留着优秀企业。此外，美元加息，资本外流，在不断压缩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空间，采取措施应对逆全球化宜早不宜迟。

张少军（厦门大学）：

第一，基于本国市场的技术创新与品牌培育，可以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第二，品牌的强势，来自于文化的强势，文化的强势又来自经济的强势。在技术创新与品牌培育过程中形成的收入持续增加，可以帮助中国文化成为强势文化，进而推动本国品牌成为全球品牌。第三，逆全球化，只是再全球化的小插曲，中国参与下一轮全球化不能再忽视本国市场。

郑江淮（南京大学）：

我们关于 GVC 下各国收入分配和创新差距变化的研究发现，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在一定条件下，造成发达国家创新增长率比中国高。当前逆全球化发生的基础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成本降低，能够吸引制造业回归，而是创新能力在上个时期得到快于中国的积累，更有底气和更需要利用制造业回归来实现其新增创新的产能。中国应当迫切加强对国外先进技术和人员的渗透，收购和吸引人才是少不了的，而且要利用国内创新投资增速来弥补不足，缩短高端制造业差距。在这个判断下，中国更应该和西方发达国家保持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冲突，至少不要把地缘政治不和谐转变成阻碍创新吸收和扩散的因素。

岳中刚（南京邮电大学）：

逆全球化背景下必须依托内需发展制造业。中国制造能力也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因为大量海淘都是中国 OEM。为何需求与制造在国内市场不匹配，这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一是建议降低流通环节税费，一方面解决国内外价差，另一方面缓解企业营销成本压力；二是解决假冒伪劣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或机构将假冒伪劣作为财源。

陈柳（江苏省社科院）：

逆全球化的本质，是发达国家也要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这是发达国家从 08 年金融危机及其以后复苏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从欧洲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德国和英国就能看出来，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英国经济总量至今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而德国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

谈镇（江苏省委党校）：

1、逆全球化也是机遇。降低中国对全球化依附性（资源依附、资本依附、技术依附和市

场依附)和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发挥逆全球化背景下有利因素的“瀑布效应”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2、当下最重要的就是扎实推进供给侧改革,以此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就宏观层面而言,要变过去的以政府为主角、以层层递进的官员为导演的老增长模式为企业为主角、富有创新意识企业家为主角的新增长模式,改变对官员软约束为企业家的硬约束。

3、就微观层面来说,是工匠精神落实和有效供给的增加。企业要从技术、市场、品牌、标准和服务上下功夫,提高市场占有率和资金回报率。

4、同时,利用逆全球化机遇更好更高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内功当然是更加坚定对内改革深入。

王宇(南京大学):

全球化逆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极大地挑战了以欧美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规则,这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被削弱,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均,底层劳动者受到了较大冲击,从而反对全球化的深入。从根本上来说,在全球化逆境下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本质上就是要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这个过程我认为不可避免地要和现有的很多发达国家产生冲突,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我认为有两种途径:面对发达国家,可以借助对方强调再工业化的契机,让我们的制造业企业大规模的出海,利用资本大规模的收购技术;同时,也可以积极引进人才来华工作。对待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用我们的市场优势,构建地区价值链,形成以我为主的区域小循环,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引导高端要素向我们本地市场的集聚。

陈建军(浙江大学):

说全球化逆境或者反全球化潮流的兴起,是值得商榷的,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今天要阻止全球化进程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英国的退欧和美国特朗普的当选,并不能证明是全球化的倒行,而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西方主要国家维护和争夺全球化话语权的一种表现。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1979年以来的中国,得益于自身的对外开放与全球化浪潮的匹配;如今,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对中国的下一步发展肯定是新的挑战。中国在继续争取全球规则贸易话语权的基础上拓展出口市场的同时,以国内需求为引导发展适合国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才是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

赵进（江苏省商务厅）：

如果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称为全球化 1.0，把 1979 年中国改革开放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称为全球化 2.0 的话，我更倾向于把现在的全球化逆境称为全球化 3.0。各国都在竞相争取在新的阶段更多的话语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外资引进工作，发挥外资企业促进实体经济作用，也表明了我们必须坚持以开放的方式走制造强国之路。

任保全（常州大学）：

针对逆全球化现象、欧美再工业化冲击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三因素叠加背景下，如何避免中国出现产业空心化？1. 要警惕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欧美再工业化步伐和力度；2. 提防欧美再工业化与欧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配合所引发的欧美制造业的强势回归；3. 要注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位列世界第二，并超过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与国外的逆全球化同时并存，这一出一逆所可能出现的资本外流是否抑制中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值得警惕。

如何在全球化逆境中推进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以及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提出以下对策：

1. 在鼓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要建立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心化的风险预警和管控机制；
2. 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腾笼换鸟的过程中，要加强产业间的配套和国内价值链构建；
3. 培育中国强大的链主企业，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凝聚力和争取国际话语权；
4. 通过扩大内需和商务成本优化，为将来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及国内价值链构建，提供制造业的基础环境。



扫一扫
关注“长江产经智库”

